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日] 太宰治 著

杨伟 张嘉林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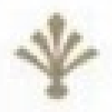
斜阳

THE SETTING SUN

重现经典 MODERN CLASSICS

THE SETTING SUN

本书收录太宰治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斜阳》、《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太宰治的文学以耀眼的光芒照射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上。他原先悲歌"人世恐怖"，而在1947年发表的《维庸之妻》中，那种悲歌进而发展为一种对虚无的叹息和幻灭感。小说借妻子之口，讲述了一个生来容易受到伤害的心灵为莫名的不安所攫住，以致终日借酒浇愁的诗人的故事。《斜阳》这部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被誉为日本的《樱桃园》，为他赢得了如潮的赞美。他临终前写成的《人间失格》；可以说是他整个一生的自画像，从中可以看到他从多愁善感的少年一步步丧失为人资格的过程，被誉为日本文坛"不朽的杰作"，是"太宰文学的总清算"。



太宰文学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地位正变得越来越稳固。

——日本著名评论家　鸟居邦朗

我对太宰治文学所抱有的厌恶情绪是异常强烈的。第一，我讨厌这个人的脸。第二，讨厌这个乡下人"洋气十足"的趣味。第三，讨厌这个人扮演了一个与自己不合适的角色。一个想和女人"情死"的小说家，总得多少有点严肃的风貌才行啊！

——三岛由纪夫

虽然三岛由纪夫讨厌太宰治，可我觉得三岛由纪夫的文章本身就很像太宰治的文章。我觉得这两个人的作品里都有很多警句，有的地方是用警句替代描写。尽管我觉得很滑稽，但是不得不说，三岛由纪夫是用太宰治的文体来写东西的。

——大江健三郎

太宰治曾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叼烟的英俊恶魔》，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电影名字。我很喜欢太宰治，而梁朝伟总让我想起他。

——王家卫

只要是经典，就不会被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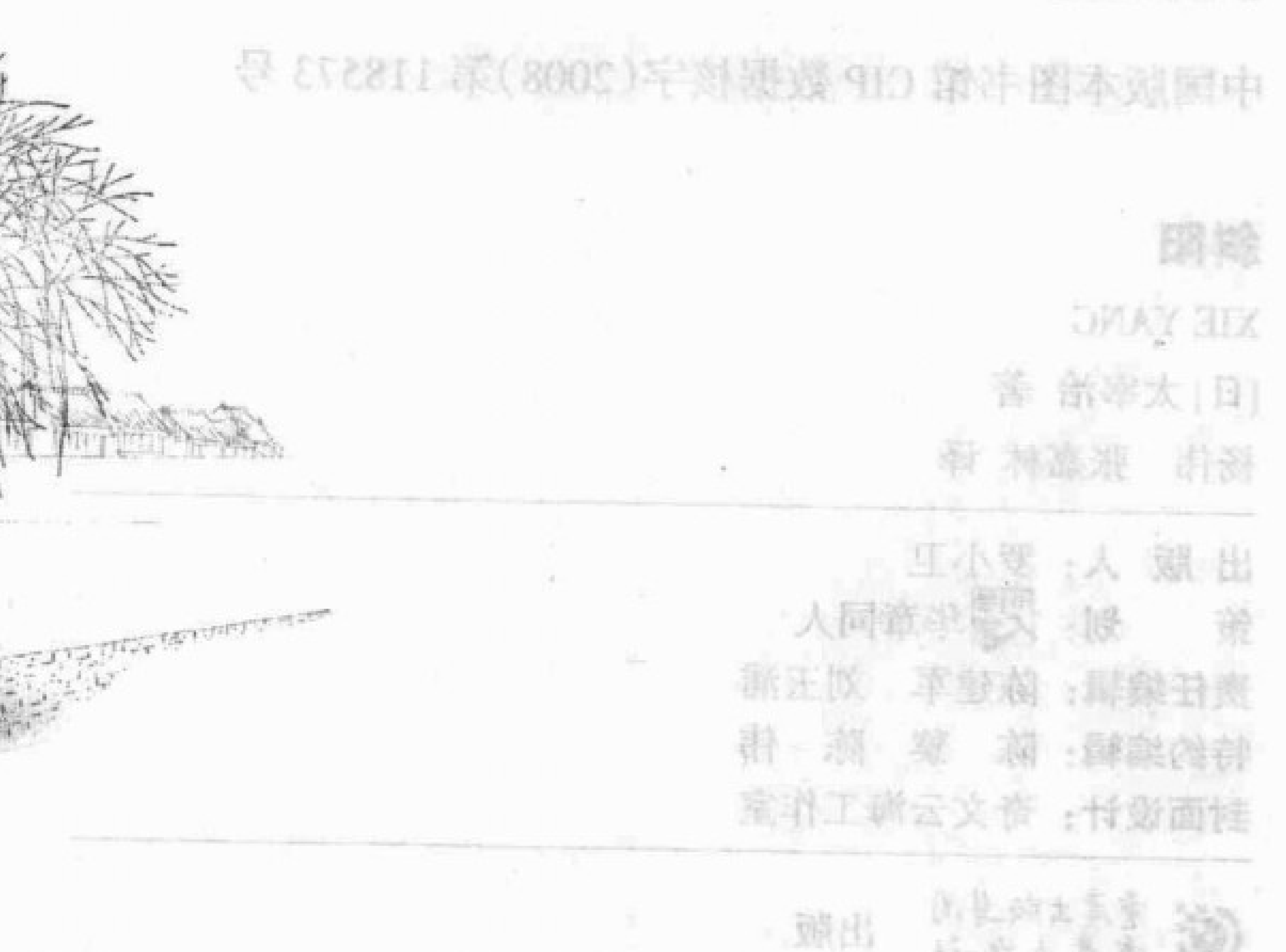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66-9982
9 787536 699823 >
定价：23.80元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日] 太宰治 著

杨伟 张嘉林 译

斜阳



THE SETTING SU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斜阳 / [日] 太宰治 著；杨伟　张嘉林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2008.9
（重现经典）
ISBN 978-7-5366-9982-3

Ⅰ.斜… Ⅱ.①太…②杨…③张… Ⅲ.长篇小说 – 作品
集 – 日本 – 现代
Ⅳ.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8573 号

斜阳
XIE YANG
[日] 太宰治 著
杨伟　张嘉林 译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刘玉浦
特约编辑： 陈　黎　陈　伟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sales@alphabook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925mm×1280mm　1/32　印张：7.75　字数：180千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价：23.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809955转8005

编委会荐语

自林纾翻译外国文学开始，已逾百年。其间，进入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蔚为大观，已难以计数。无疑，就翻译文学来说，中国读者是幸运的。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的熏陶，其中的许多人走上了文学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深度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但在浩如烟海的外国文学世界里，也有许多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被我们忽略了。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显露出瑰宝般的价值，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除此之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阴差阳错的历史契机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本里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

因此，本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

典的作品。对于这些经典，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

1.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

2.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受到重视的作家的作品；

3.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作家的作品。

以如此标准甄选纳入本书系的作品，当不会愧对中国读者。

至于作品的经典性这里就不做赘述。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文人墨客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交相辉映。

从书编委会

2005年4月于北京

“永远的少年”太宰治及其文学的心理轨迹（译者序）

太宰治的小说第一次进入中国内地读者的视野，大约是在1981年。张嘉林先生翻译的《斜阳》出现在“文革”结束后不久的中国文坛，掀起了一股不小的太宰文学热。尽管它似乎被淹没在了罩着诺贝尔文学奖光环的川端康成文学的翻译热浪里，但却悄无声息地形成了一股虽不张扬但却持续涌动的“暗流”，造就了一批痴迷得近于“狂热信徒”的读者群体。与川端文学和后来的大江文学不同，太宰文学不是以轰轰烈烈的方式，而是以更加个体和隐秘的、甚至是“同谋犯”的方式闯入读者心中某一片或许是被刻意掩饰的一隅，搅动了人们内心深处最柔弱而又最执拗的乡愁。

太宰文学被誉为永恒的“青春文学”，被年轻的少年们（包括另一种心理状态上的少年们）视为神明一般地尊奉，其中漂漾着的“清澄的感受性”和绝不妥协的纯粹性堪称世界上青春文学的最好范本。与此同时，太宰文学又被誉为“弱者的文学”，正如他在《蓄犬谈》一文中所说的那样：“艺术家本来就应该是弱者的伙伴——弱者的朋友。在艺术家来说，这就是出发点，就是最高的目的。”太宰治似乎是把懦弱作为一种出发点，甚至是一种武器，以退为进地向所谓的“强者”、向伪善的人生和社会公开宣战，从而彰显出一种别样的强大、别样的高贵和骄傲的激情。

太宰治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拥有大量可以炒作的题材。他出身豪门，一生立志文学，师从井伏鳟二等小说名家；大学时代曾积极投身左翼运动，却中途脱逃；生活放荡不羁，却热心于阅读《圣经》；五度自杀，四度殉情未遂，39岁时与最

后一位情人投水自尽。以至于他说“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人间失格》)，“我生来就对不起你们”(《二十世纪旗手》)，但与此同时，“上帝选民的不安与恍惚俱存于吾身”(《叶》)。而这些格言式的短语恰好成了太宰治人生和文学的最好注脚，也从某个角度勾勒出了他一生的心理轨迹。

太宰治于1906年6月19日出生在日本青森县北津郡金木町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一个多额纳税的贵族院议员。尽管津岛（太宰治的本姓）一家是津轻这个穷乡僻壤上远近闻名的豪门望族，但却是依靠投机买卖和高利贷而发家致富的暴发户。因此，“我的老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家谱”，“实在是一个俗气的、普通的乡巴佬大地主”(《苦恼的年鉴》)。这样一个豪华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种“名门意识”，同时又使他终生对那种真正的贵族抱有执著的憧憬（这在《斜阳》中表现得尤其充分)。因此，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恋、依赖这个家庭和背叛、批判这个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以追求个人的自我价值。不难看出，太宰治作为津岛家的公子，为这个家庭感受到了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而这种双重情感的分裂与太宰治一生的极度荣誉感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调乃是一脉相承的。

从小在周围和学校受到的不同于一般人的优厚待遇和自幼的聪颖敏感以及“名门意识”，使他感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人种。这种极度的自尊和优越感发展为一种极度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导致了他所谓的“选民意识”。而过分的自矜又导致了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敏锐的感受性，并必然在粗糙的现实中动辄受伤。在冷漠的家庭中，他近乎早熟地解构着他人的面目和人类的本性，从少年时代起就反复经历了对荣誉的热烈憧憬和悲惨的失败，进而对人性的绝望。正是这种极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伤的感受性构成了太宰治一生的性格基调。它不难演变成一种对绝对的渴求，对至善至美的最高理想的执著憧憬，容不得半点瑕疵的洁癖。这种绝对的追求因为缺乏现实的根

基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一遇到挫折就很容易蜕变成强烈的自卑和完全的自暴自弃。要么完美无缺，要么彻底破灭，这无疑最好地表达了太宰治一生的纯粹性和脆弱性，同时亦不妨看做现代青春特性的集中写照。

作为家庭的第六个儿子，加之父亲的忙碌和母亲的体弱多病，他是在叔母和保姆阿竹的养护下长大的。他生活在孤独寂寞的世界里，渴望着热烈的爱而又无法得到，这使他感到有一种被世界抛弃了的悲哀。外界对于他永远是一个可怕的存在，仿佛自己被社会排挤在外，不能与现实社会和他人发生有机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使他能够站在现实以外利用自己的批判意识来认识乃至批判家庭和社会中人的冷漠、虚伪和庸俗。可以说，在社会和外界遗弃了太宰治的同时，太宰治也拒绝了伪善、鄙俗的外界社会，从而使他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膜和分裂愈演愈烈，以至于发展成为一种尖锐的对抗性。因而，他对世间的认识永远是静止的，甚至不乏极端的成分，并依靠这种极端而成就了一种绝不妥协的纯粹性。他蜷缩在自己独自的世界里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自我，再加上物质条件的优厚使他得以在一个远离了实用性和人生操劳的超现实的境地中，在浪漫的主观世界里，编织自己至善至美的理想花环，并以此为基点去认识现实和批判现实。而这种脱离了实际生活的批判意识因为处在丑恶的现实之外，使他能够在剖析实际生活时变得更加犀利更加纯粹的同时，也很容易变成一种不结果实的花朵，一种必然败北的斗争。

而当太宰治的极度荣誉感和强烈的批评意识从外界转向自我时，追求至善至美的性格又使他无法肯定自我的价值，从而对自我进行了毫不留情、甚至是苛刻的反省，迫使他背负了在常人看来大可不必的自卑意识和自我欠缺感。作为大地主的第六个儿子，太宰治有一种“家庭的多余人意识”，以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与平民百姓的接触中发展成了一种“社会的多余人意识”。于是，他陷入了一种现实的批评者和理想的追求者之间的深刻矛盾中，以至于不得不在早

期作品《往事》的题首录下了魏尔伦的诗句："上帝选民的恍惚与不安俱存于吾身。"

在这种极度的苦恼、自我意识的分裂中怎样解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呢？"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寂寞的排泄口，那就是创作。在这里有许多我的同类，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到一种莫名的战栗。做一个作家吧，做一个作家吧。"（《往事》）于是，太宰治在一个远离了现实的地方，在一个独自的世界里——文学中找到了孤独和不安的排泄口，使主观理想与客观现实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创作的天地中，依靠观念和冥想得到了暂时的统一。

除了在文学中寻求矛盾的暂时缓和以外，在实际生活中太宰治被迫走上了一条自我破坏的道路。对市民社会的虚伪性和陈规陋习深恶痛绝的他弃绝了那些世俗的追求自我价值的道路，而是通过确认自己的自我欠缺感、甚至牺牲自己这样一种貌似无赖的方式来达成旧的道德秩序的解体，以换取一种"废墟的生命力"，实现一种曲折的自我肯定、自我升华，摆脱过剩的自我意识的泥沼。而大正末年、昭和初期兴起的无产阶级运动恰好成了他确认自我欠缺感、进行自我破坏的突破口。

昭和初年的无产阶级运动直接波及到了津岛家，以榨取农民血汗致富的津岛家不用说成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对象，这加深了太宰治的"社会多余人意识"，并进而发展成作为地主儿子的"民众之敌"的意识。太宰治为此抱有一种宿命的罪恶意识，在少年期所经历过的观念上的败北因为革命的到来得到了具体而实际的印证。这种阶级意识上的"负的意识"压迫着太宰治，促使他很快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出席秘密研究会，并写出了《学生群》、《一代地主》等带有无产阶级色彩的作品，但不久他就脱离了革命。显然这是与他的思想性格、特别是他参加革命运动的独特方式密不可分的。

太宰治作为绝对理想的追求者必然对相对的现实、僵化腐败的现存道德秩序持激烈的否定态度，因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无异于一

盏明灯点燃在现实的黑暗之中。他对现实的矛盾不加妥协、一律拒绝、全面批判的态度，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实社会的猛烈批判乃至对旧秩序的颠覆，从某种意义上看，无疑有着相似的一面。因而太宰治来不及仔细研究共产主义，仅仅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有制度的否定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总之，与其说是运动本身的目的，倒不如说运动的外壳更符合我的口味。”（《人间失格》）毋庸置疑，共产主义运动是一场打倒一切剥削阶级的现实革命，作为大地主的儿子，太宰治所抱有的宿命的罪恶意识使他不可能作为一个革命者，而只能作为革命的对象投身其中。因此，不是成为革命家，而是破坏自己、灭亡自己，清算封建家庭的罪孽，成为民众之友，发掘自己作为被革命者的存在价值就成了他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独特方式。这种独特的方式决定了他只能稀里糊涂地投身于革命，在自己极度受伤甚至于毁灭之后，便又脱离了革命。显然，他参加革命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客观的现实，而是自己出身的原罪意识和过剩的自我意识。换言之，他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思想，而是作为一种个人伦理来参加革命的，这决定了他在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改革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必然半途而废，因而，他始终没有从世界观上信奉马列主义，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知识修养对马列主义持理解态度。因此，不难理解太宰治在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身心交瘁的情况下脱离革命的结局。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加深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识”，并进行了残酷的自我破坏之后，太宰治逃离了革命。这彻底决定了他只能以灭亡者的身份与社会发生联系的生活道路。不是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感、背叛感一直折磨着患有洁癖的太宰治，使他背上了沉重的“罪恶意识”，使其文学变成了与罪恶意识搏斗的记录。

“如果是叛徒，就要像叛徒一样地行动。……我等待着被杀戮的日子。”（《虚构之春》）太宰治在确认了自己的“多余人意识”、“叛徒意识”之后，只能把叛徒的烙印打在自己的脸上，以自我破坏来追求自己作为“叛徒”的价值。“丢了性命来彻底地过所谓的不道德生

活，也许这倒要受到后世人们的称赞。牺牲者。道德过渡时期的牺牲者。”（《斜阳》）因此，太宰治自觉地也是无可奈何地选择了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不仅彻底毁灭自己，并以此去扩大恶，从内部来使旧的秩序彻底崩溃，为新的时代，为他人尽自己作为破灭者的努力，求得一种“负的平方根”，进而最终得到一种自我价值的肯定，这便是太宰治的“无赖”哲学。而最大的自我毁灭就是死亡——于是，太宰治和一个酒吧女招待一起跳海自杀，结果那个女人死了，而他却活了下来，这无疑更是加深了他的罪恶意识。

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使他对一切思想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也不再相信任何改革现实的实践活动，因而他又重新回到了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一度中断的文学创作。他以遗书的形式发表了总题为《晚年》的一系列小说。他在文学中以观念的形式避免强烈的自我破坏来解决现实的苦恼，达到了一种较为直接的自我肯定，使自己的行为得以正当化。然而，每当他的自我在文学中得到主张时，其批评意识又会即刻复活，对这种自我主张本身发起攻击，从而形成更深的自我否定。这种自我主张与自我否定交替进行，循环往复，使他暂时在文学中得以统一的自我变得愈加分裂，而这给他的创作手法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在《叶》、《丑角之花》、《虚构之春》、《狂言之神》等小说中，分裂的自我在绝望的自我否定与自嘲式的自我肯定中轮番登场，而无数的主人公都不啻作者的分身。

于是，在实际生活中，背负着“罪恶意识”而又渴求自我绝对完美的太宰治只能以彻底的自我牺牲和自我破坏来谋求与他人与社会的联系，并试图在这种联系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其具体方法就是他所谓的“丑角精神”。在与外界的敌对关系中经历了无数次败北的“多余人”和“叛徒”最后只能屈从于外界的现实生活，罩上“丑角”的面壳来掩盖自己的真实面目，用小时候起就惯用的“逗笑”、“装模作样”等手法来伪装自己，取悦于他人，使自己彻底地非自己化，与他人同一化，从而发展成一种“丑角精神”。但他极度的自尊心和荣誉

感又不允许他完全屈从于外界社会，因此，他又开始了向人们的攻击和报复。因而，“丑角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机制的产物。

太宰治扮演丑角乃是为了向他人求爱，同时又保护脆弱的自我。但太宰治的文学却力图使自己的这种“丑角精神”上升为一种绝对的利他精神，以此来反衬社会和他人的冷漠，夸耀自己的纯粹。事实上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这种“丑角精神”虽然总是力图上升为一种利他主义精神，但却一直未能达到一种真正的利他主义，其直接的目的较之服务于他人，更注重保护自我。由于这种“丑角精神”是在绝对固守自我的内心世界，割断与现实联系的前提下发挥的，因而“求爱”只是一个外壳，核心乃是掩藏真实的自我。即使他用虚假的自我赢得了与他人的联系，但这种联系也是建立在真实的自我之外的，因此必定是脆弱的、缺乏现实性的表面联系，从而注定了太宰治的“丑角精神”必然以失败告终。但是，根本否认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之可能性的太宰治是能够预料并且不怕这种失败的，因为虽然败在了别人手里，却战胜了自己。正是在一次次惨重的失败中，太宰治向人们、更向自己证实了自我通向至善至美境地的途径。因而，太宰治的“丑角”越演越烈，并在《人间失格》中大谈“丑角精神”的发挥和破灭。正是借助文学与现实的相辅相成，太宰治得到了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满足、人格上的自我升华和非同寻常的自我优越感，使至善至美的理想之光在汗流浃背的服务中冉冉升起。

“只有具备自我优越感的人才可能扮演丑角。”（《乞丐学生》）不难看出，太宰治的“丑角精神”既是获取自我优越感的途径，同时也是因扮演丑角、屈从于他人和社会而受伤的自尊心对外界现实和他人的报复。“以自虐为武器试图进行报复，这是太宰治的伦理。”[1]于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我肯定，他就只能加倍地扮演丑角。他的这种自我肯定有时甚至是建立在一种希望现实的恶、人类的恶暂时不变的

---

① 佐木召一《太宰治试论》（有精堂，1970年），34页。

基础之上的，因为只有现实和他人的恶不变，甚至越烈，他的高尚和纯粹才越发夺目，才越能在与现实和他人的反衬中追求并凸显自己的完美。因而他是靠摒弃了对现实社会之完美的追求来保持住了对自我之完美的追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他是一个自我中心主义者，但他又要用自我的完美反过来教育世人，给人类以爱的榜样，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他又是一个善良的人，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英雄人物。以至于他不惜用死亡来证实并完成自己的纯粹，然后再用自己的纯粹来拯救世界。换言之，是企图先拒绝现实以追求自我的绝对完美，然后再用绝对完美的自我来引导人们追求现实世界的绝对完美。至此，太宰治的想法明显地向《圣经》接近了。

怎样使自己的"丑角精神"和自我破坏获得真正的价值和永恒的意义呢？太宰治以文学为媒介表白自己的衷肠，证实自己的纯粹，但又不免感到这种文学上的自我肯定有他自己厌恶的傲慢与矫饰之嫌，所以，他在文学上的自我肯定是相对的，显得躲躲闪闪，时刻有被自己和他人批评的可能性。因此，太宰治迫切需要找到文学以外的一种东西来求得绝对的自我肯定，以统一分裂的自我。"'你要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这是我最初的宗旨，也是我最后的宗旨。"（《随想〈回信——致贵司山治〉昭和二十一年三月》）于是，太宰治以《圣经》为依据，将自己的"丑角精神"上升为一种爱邻人的宗教精神，从而使自己的自我破坏因为神的出现而获得了绝对的道德意义。正如同为无赖派代表作家的坂口安吾所言："在不良少年中也算是特别的胆小鬼和好哭鬼。依靠臂力不能取胜，依靠道理也不能取胜。于是，只好搬出一个证据的权威来进行自我主张。芥川和太宰都把基督搬出来作证。这是胆小鬼和好哭鬼的不良少年的手腕。"[①]太宰治一接触到《圣经》，不需要教会和牧师，便马上变成了《圣经》的热心读者。一面扮演丑角，一面又怀疑丑角意义的太宰治通过接近《圣经》，使"丑角

① 见坂口安吾《不良少年与基督》一文。

精神”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意义，一种有力的理论依据，从而有可能从自我保护手段上升为崇高的宗教精神。因而，他死死攀住基督这棵树，来使自己摆脱自我怀疑的泥潭，向基督的完美境界阔步前进，以成为一个绝对的善者。作为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太宰治对那种纯粹高尚的、无报酬的行为和毫无利己之心的生活，还有这种生活的完美实践者、基督的美感到深深的钦慕和向往。但太宰治作为一个罪人、叛徒，只能把自己投影于犹大身上，主动走向神这个绝对者的审判台，使自我破坏和“丑角精神”在神的面前演变成一种自我赎罪，并使自我赎罪彻底化为通向自我完善的途径，以获取与基督相同的意义。他“不相信神的爱，只相信神的惩罚”。（《人间失格》）这是他对神的独特信仰方式，从而使他区别于一般的基督教徒。我们知道，基督教因保罗的出现而由律法式的宗教变成了信仰的宗教。神把他的儿子耶稣派到人间，将人类从罪孽中拯救出来。无罪的基督身着仆人的褴褛衣衫在十字架上受刑而死，以他一个人的死赎清了全人类的罪过。因而基督之死证明神不仅是惩罚之神，更是恩宠之神。只有这样才打开了前往天国的道路。但太宰治对于神不是乞求宽恕，而仅仅是乞求一种惩罚。太宰治没有看到，更准确地说，是故意抹杀了死于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赎罪的耶稣的光辉，而只是以绝对理想追求者的身份崇拜着基督的完美。他把“人间失格”的形象与基督耶稣的形象联系起来，不断地乞求神的惩罚，以便使自己在神的惩罚中不断升华，最终由一个“人间失格者”过渡到耶稣式的英雄。越接近基督，也就意味着自我破坏愈加惨烈，越是丧失为人的资格，从而在这种带有自虐色彩的行为中汲取到文学的源泉，体验到一种超越了凡人向神的完美过渡的快感。正如法国作家纪德所言：“我因鞭笞自己而感到喜悦，喜悦自己的无处逃避——其中有莫大的骄傲，在身处罪恶时。”[①]于是，太宰治借助神的惩罚而获得了鞭笞自己的喜悦。但鞭笞自己的极限无疑是自

---

① 诺贝尔文学全集《纪德》卷（九华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68页。

杀——尽管太宰治深谙这一点，但却依旧勇敢地向自虐寻求文学的据点。他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称之为请求神惩罚的结果。如果失去了神的惩罚而相信神的恩宠，太宰治将作为一个常人成为教徒，从而可以得到心灵的解放而免受自我意识分裂的痛苦，但与此同时，也将失去太宰文学的本质。因为对神的信仰意味着单纯的“祈祷”，一切行动将由神来赋予，而人也就失去了作为人本身的自我意识和主体价值，成为神的仆从。这势必威胁到太宰治能否保持作家的主体性。至此，太宰治面临着文学家和信徒之间的选择危机。但他却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文学家的立场，弃绝了神的拯救和日常生活的安定，背负着十字架，用文学家的精神来贯穿了自己的一生。“只有信仰基督的赎罪，才会得到神的义。并且，不是依靠自己的功绩，而是依靠恩宠得到义的人才会得到实行基督的戒律的能力。”[①]由此一来，不相信基督之赎罪的太宰治自然不能得到神的义，从而关闭了自己通往天国的道路。既然不能得到神的义，就自己创造自己的义——“像玩扑克牌一样，负的全部收齐，就变成了正的。”（《维庸之妻》）面对神的权威，他建立起了自己的权威——要是神不惩罚我，我就自己惩罚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神不啻是他自我惩罚的工具。神被太宰治利用后便遭到了抛弃。可以说，太宰治自始至终贯彻了人本主义，以人的胜利来战胜了神，从而反过来证实了神的胜利。无疑，当他拒绝了神的拯救时，信仰也就发生了危机，注定了他自我惩罚的尽头只能是自杀。

我们不难发现，尽管神暂时统一了太宰治分裂的自我，但却不能填平太宰治与不存在着神的外部世界之间的鸿沟。太宰治因为神不是走进了大众和现实，反而更加远离了现实的人类。但太宰治活着的目的更主要是在向人类的求爱中通过他人来证实自己的存在价值，较之神的肯定，他更希求的是人的肯定，甘愿为得到人类的信赖和爱而放弃神的恩宠。所以，他只是借助了神的力量，而不可能在信仰的世界

---

① 菊田义孝《太宰治与罪的问题》（审美社，1964年）。

里驻足常留，必然在终极意义上抛弃神而返回到人间，即便这是一个不可能获得“信赖”和“安慰”的冷漠世间。可是，“怎么也不能对人类死心的”的太宰治一旦放眼现实世界，面对战后假民主主义的盛行，沙龙思想在文坛上的支配地位，还有战后的一片废墟和旧有道德的全面崩溃，他不禁发出了高度虚无的叹息：“只是一切都将过去。”（《人间失格》）“管他是不是人面兽心。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维庸之妻》）于是，他只好用肉体的消亡来结束内心的纠葛。但他不愿平常地死去，而必须得作一次悲壮的牺牲，来维护并成就自己英雄的声誉。面对让人绝望的现实，又要拯救这个神不存在的人类世界，太宰治只好让自己成为一个来自人间的神，换言之，像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一样，为了全人类他要勇敢地死去，靠死亡来最后完善自己，然后再用死亡达成的永恒、绝对、至美来拯救人类和现实。因为自杀有着区别于自然死亡和被动死亡的英雄色彩，因此，在他看来，自杀意味着主动抛弃了现实的相对性而获得了永恒和绝对。于是，1948 年 6 月 13 日，太宰治投河自杀，试图通过死亡来成为人类现代的赎罪者，本世纪的耶稣。“是吗？……真是个好孩子。”（《眉山》）“我们所认识的阿叶（主人公名），既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不，即使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人间失格》）他留下这些自我主张的美丽希望后绝尘而去，他的死不是面对神，不是通向天国的，而是面对人间的，即希望以死亡来换取人们的承认和赞美。不过，太宰治最终也没能变成耶稣，倒是因其独特的文学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甚至于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如今，太宰治和夏目漱石、宫泽贤治一样，是日本读者阅读得最多的作家之一，甚至成了不少青少年的精神导师。

太宰治作为文学家活跃于日本文坛，只有从 1933 年到 1948 年的短短 15 年。太宰治的文学创作通常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分别与日本左翼运动遭到镇压的战前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迷惘时代相对应。从空间上看，养育了太宰治的故乡，乃是津轻这样一个处

于日本本州北端的乡下地区。尽管太宰治长大成人后移居到了东京的郊外，但除了故乡津轻和东京之外，他也就只去过伊豆、三岛、甲府、新泻、佐渡等区区几个地方。不用说前往海外旅游，就连京都和大阪等关西地区也不曾涉足。换言之，太宰治作为一个文学家，在时间上只短暂地生活在了一个极其特殊而又异常的年代里，而从空间上说，也只是生活在了一个极其有限的狭窄地域里。不用说，这样一个作家所写出的作品，成为一种非常偏狭的特殊文学，自有其必然性。

尽管如此，太宰文学却具有一种超越了时空的不可思议的普遍性和现代性。阅读《斜阳》和《人间失格》等作品，不能不感觉到，太宰治所直面的乃是人类、特别是现代人共同面对的普遍课题，描写了现代社会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的自闭者、叛逆者、边缘人或多余人的悲剧。比如，就像《人间失格》中的主人公那样，在现代，一旦试图富有实验性地、忠实于自我地生活下去，就很可能遭到社会的疏远和异化，成为“人间失格者”。或许在所有现代人的心中，都或明或暗地存在着一块懦弱、孤独而又渴求着爱的荒地，而这块荒地却被太宰治的文字无声地侵袭，而且无从回避。之所以有无数的读者痴迷于太宰文学，无疑是因为他们把太宰治看做了自己心灵秘密的代言人，甚至具有排他性的青春密友。在太宰治自杀辞世已经过去了60年的今天，太宰文学迷有增无减，且逐渐跨越了国界。与其说太宰文学业已跻身于功成名就的经典作品行列，不如说在现代语境里反倒越来越彰显出历久弥新的鲜活的现代性。这无疑是因为太宰治不惜用生命作为赌注，将自己置于实验台上以曝露现代人的耻部，追求人类最隐秘的真实性和人类最本源性的生存方式，并表现为融独特性和普遍性为一体的文字之缘故。

心理学家荣格认为，所有人内心的无意识深处都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少年”原型。所谓“永远的少年”，乃是奥维德对希腊少年神伊阿科斯的指称。既然被称之为“永远的少年”，也就意味着可以返老还童，永不成年。在厄琉息斯的秘密仪式上，他又是谷物与再生之

神。作为英雄，他试图急速地上升，但时而又会突然坠落，被吸入作为地母的大地中。于是他又以新的形式再生，重新开始急速上升的过程。借助地母神的力量，他可以不断重复死亡与再生的过程，永葆青春。他永远不会长大成人，是英雄，是神的儿子，是地母的爱子，又是打破秩序的捣蛋鬼，同时又不可能彻底定型为其中的某一角色。他绝不被习俗所束缚，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他们对无意识中闪现的灵光，总是保持着开放的心灵，但却缺乏加以现实化的能力。所以，常常被认为是心理学上的退化。但荣格认为，退化并不总是一种病态，毋宁说是心灵创造性过程的必需之物。依靠退化，自我得以与无意识相接触，由此获得的，既可能是病态的或者邪恶的东西，也可能是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或是崭新生命的萌芽。因此，这种退化很可能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退化。

或许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把太宰治文学称之为永恒的“青春文学”。我们总是——同时也只可能——从他的作品里找到一个主人公，一个保持了纯粹性却长不大的“永远的少年”。即便我们从封闭的自我走向了广阔的社会，走向了成熟，而不能不向他挥手作别，但这个“永远的少年”也总是会在我们内心深处唤起一种深深的战栗和乡愁般的情愫，让我们管窥到人性的渊薮，点燃我们潜在的创造激情。这是因为——就像李安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断臂山”一样，我们每个人心中也必定潜藏着一个“永远的少年”原型。

杨伟

2008年6月19日

于重庆歌乐山下

目 录





斜阳

一

早晨，母亲在餐厅里轻快地啜了一匙子汤，突然小声地叫了一声：

“啊！”

“有头发？”

我以为汤里有什么脏东西。

“不。”

母亲像是什么事也没有，轻巧地又把一匙子汤送到嘴里，然后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转脸望着厨房窗外盛开的樱桃，就这样侧着脸又将一匙子汤轻巧地倒进小小的双唇之间。用“轻巧”这个词来形容我母亲，这绝不是夸张。她的用餐方式同妇女杂志之类介绍的迥然不同。记得直治弟弟曾经一边喝酒一边对我这个做姐姐的说过这样的话：

“你要知道，一个人不能因为有爵位就称得上贵族。也有的人虽然没有爵位，却具有天爵的优秀品质。像我们这种仅仅有爵位的人，也有不但不像贵族，反而更近于贱民的。像岩岛那种人（直治举了他同学中一个伯爵的名字），说实在的，给人的印象不是比新宿一带妓馆的掌柜还要下流吗？就是前几天，柳井（弟弟又举出同学中一个子爵次子的名字）的哥哥举行婚礼，那畜生穿着无尾礼服什么的，有什

么必要穿无尾礼服来参加呢，这且不去说它，在席上致词时，这小子却用文言不像文言、白话不像白话的狗屁不通的敬语说话，听了真叫人恶心。假装斯文地毫无温文尔雅可言，这是无聊透顶的装腔作势。过去在本乡[①]一带，我们时常可以看到‘高级御[②]公寓’这类招牌，而所谓华族[③]，大部分实际上可以说都是‘高级御乞丐’。真正的贵族可不会像岩岛那样拙劣地装模作样。拿我们这个家族来说，真正的贵族可能只有妈妈了吧？她才是名副其实的贵族啊。有些地方我怎么也比不上她。”

就拿喝汤来讲吧，我们都是在盘子前面略微低下头去，横捏着匙子把汤舀起来，然后依旧横捏着匙子将它送到嘴边喝的，但是母亲却把左手指轻轻地放在餐桌边上，挺着身子，扬着头，连盘子也不看一看，横捏着匙子就一下子舀起汤来，然后像燕子那样——真想用这个字眼来形容——轻巧而又优美地将匙子尖端对着嘴，就这样把汤倒到嘴里去。她一面随意地左顾右盼，一面极其轻巧地操着匙子，匙子简直像小翅膀那样轻飘飘地动着，汤一滴也不会泼出来，同时一点也不会发出啜汤或者碰响盘子的声音。这种吃法可能不符合所谓的正式礼节，可是在我看来却非常可爱，那才是名副其实的吃法。而且事实上，喝汤的时候舒适地挺着上半身，从匙子尖端把汤倒进嘴里，这比低着头从匙子边喝，味道要好得恐怕叫人难以相信。然而我正是直治所说的那种高级御乞丐，所以无法像母亲那样轻巧而又漫不经心地使用匙子，没有法子，只好死心，仍然在盘子前面弯下身子，按照所谓正式礼节那种乏味的方法喝汤。

不只是喝汤，母亲的用餐方式也不大合乎礼法。肉一端上来，她就立即用刀叉把它全切成小块块，然后丢开刀，改用右手拿叉子，一块一块地把肉叉起来，很高兴似的慢慢吃起来。至于吃带骨的鸡肉，

---

① 本乡是东京一个住宅区。

② “御”是日文接头语，加上了表示尊敬或谦虚等义，用在这里是不通的。

③ 华族是明治维新后对新封给爵位的人及其家族的称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废止。

当我们担心把盘子碰响，还在费尽心思从骨头上切下鸡肉的时候，母亲已经满不在乎地用手指将骨头拎起来，用嘴把肉和骨咬开，若无其事地吃起来了。那样粗鲁的吃法，不但使人看上去感到可爱，甚至显得异常迷人，所以说名副其实的人到底与众不同。她不仅吃带骨的鸡肉时这样，进便餐时吃火腿和红肠之类也常常随手抓起来就吃了。

“你们知道饭团子为什么好吃吗？因为是用手指捏着做的啊，”母亲还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想过，用手抓着吃也许真的很好吃吧，可是我又觉得，像我这种高级御乞丐笨拙地学着这样做，就真变成名副其实的乞丐了，所以还是忍住了没学她。

连直治弟弟都说学不到母亲那样，我也深深感到要学母亲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有一次，那是个初秋的月夜，在西片町宅邸的里庭园，我和母亲坐在池旁亭子里赏月，边笑边谈着狐狸和老鼠出嫁时准备的嫁妆有什么不同，这时候，母亲霍地站起来，走进亭子旁边茂密的胡枝子丛里，又从胡枝子的白花中间露出她白净娇艳的脸，微微地笑着说：

“和子，你猜妈妈在做什么？”

“在折花，”我回答说。

母亲却轻轻地笑出声来说：

“我在小便哪。”

她一点都不把身子蹲下去，这使我感到吃惊，可是我从心里感觉可爱，同时也觉得我这种人怎么也不可能学她的。

虽然从今天早上喝汤的事扯得太远了，不过我最近在一本书上看到：路易王朝时期的贵妇人都是满不在乎地在宫殿庭院或者走廊角落里小便的，我对这种随随便便确实感到新奇，因此我还想到，像我母亲这样的人也许是真正的贵妇人中的最后一个吧？

再回过头来说她今天早上喝了一匙子汤，“啊”地轻轻叫了一声。我问她：“有头发吗？”她却回答说：“不！”

“那是不是太咸了？”

早上的汤，我是用最近配给的美国罐头青豆滤过后做的浓汤。对于做菜我本来就没有把握，所以即使听到母亲说“不”，我还是非常担心，又问了一声。

“不，汤做得很好，”母亲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她喝完汤，就用手抓着紫菜裹的饭团子吃起来。

我从小就不爱吃早饭，不到十点钟左右肚子不会饿，所以这时候汤是勉强喝下去了，可是不想吃饭，把饭团子放在碟子里用筷子捣得不成样子，然后用筷子夹一点，像母亲喝汤时操匙子那样，让筷子尖端对着嘴，简直像喂小鸟一样地塞到嘴里去。我还在这样慢腾腾地吃着，母亲已经把饭吃好，静悄悄地站起来离开座位，背靠在朝阳照射着的墙上，默默地看着我吃饭。不一会儿她说：

“和子，你还是不行啊。你要变得最爱吃早饭才好。”

“妈妈您呢？您爱吃吗？”

“那还用说，我已经不是病人了。”

“和子我也不是病人啦。”

“不行不行！”

母亲发愁似的笑着，摇了摇头。

五年前我生过肺病，长期卧床，但我知道那只是一种富贵病。倒是不久前母亲生的病才叫人担心和难过。然而母亲却只顾着担心我的事。

“啊！”我禁不住叫了一声。

“怎么啦？”这回母亲问我了。

我们两人对看了一下，好像彼此完全会意似的，我吃吃地笑起来，母亲也微微地一笑。

一个人突然想到什么害羞得无地自容的事情时，就会轻轻地发出这种奇怪的“啊”的声音。脑海里突然清楚地想起了六年前我离婚的事情，所以不禁喊了一声：“啊！”可是母亲刚才也“啊”了一声，

那又是为什么呢？她绝不会有我这种使人害臊的往事，不，或许她有什么……

“妈妈，刚才您也想起什么事了吗？是什么事情啊？”

“我忘了。”

“是我的事吧？”

“不是。”

“是直治的事吗？”

“是的，”母亲刚开口，却又歪着头说，“也许是的。”

弟弟直治在大学读书时碰到征兵，到南方岛上去了就杳无音信，停战以后仍然下落不明。母亲说她已经作好精神准备再也见不到直治了，可是我一次也没有作过这种“精神准备”。我想一定能够见面的。

“我以为我已经想开了，可是一吃到美味的汤，就会想起直治来，难受得不得了。我们过去待他好点就好了。”

直治进高等学校以后就热衷于文学，还过着浪荡子似的生活，不知叫母亲操了多少心。尽管这样，母亲还是喝一口汤就想到直治，不由得“啊”地叫一声。我硬把饭塞到嘴里，眼睛噙着热泪。

“您放心吧，直治不会有问题的。像他那样的无赖，不会那么容易就死的。死的一定都是又老实、又漂亮、又和善的人。直治那种人你用棍子打也打不死。”

母亲听了笑着跟我开玩笑说：

“那么说，阿和你是属于会早死的一类人了？”

“哎呀，为什么？我既是个无赖，又有点锛儿头，活到八十岁是拿得准的。”

“真的吗？那妈妈一定能活到九十岁了？”

“是的。”

我刚开口就感到有点说不下去。无赖命长，漂亮的人命短。妈妈是个漂亮的人，却又希望她长寿。我真着了慌。

“您故意难为人哪！”

我说罢只觉得下唇颤抖起来，眼泪夺眶而出。

我再讲点蛇的事吧。那是四五天前的一个下午，附近几个孩子在庭园篱笆那里的竹丛中发现了十来个蛇蛋，就来告诉我。

“这是蝮蛇蛋，”孩子们硬是这么说。

我想竹丛里要是孵出十条蝮蛇来，可就不能随随便便到庭园里去了，于是说：

“把它们烧掉吧！”

孩子们都乐得跳起来，跟着我走了。

我们在竹丛附近堆起木柴和树叶，生起火来，把蛇蛋一个个投入火中。但是蛇蛋怎么也烧不起来。尽管孩子们在火堆上加树叶和小树枝使火更旺，蛇蛋还是烧不起来。

“你们在干什么？”坡下农家的姑娘从篱笆外走过，笑着问。

“烧蝮蛇蛋。要是孵出蝮蛇来，那多可怕呀。”

“蛋有多大？”

“有鹌鹑蛋那么大，都是雪白的。”

“那是普通蛇蛋，不会是蝮蛇蛋吧？生蛋是怎么也烧不起来的。”

姑娘感到滑稽，便笑着走开了。

蛋烧了近半小时还烧不起来，于是我叫孩子们从火中把蛇蛋拾起来埋在梅树下，我找来一些小石子给它们做了墓碑。

“来吧，大家都来拜一拜吧。”

我蹲着合掌的时候，孩子们也都顺从地蹲在我背后合起掌来。然后我离开孩子们，独自慢慢地登上石阶，只见母亲站在石阶上紫藤架的阴凉处。她说：

“你老是爱做残忍的事。”

“我以为是蝮蛇蛋，哪里知道原来是普通蛇蛋。不过没关系，已经把它们埋葬了。”

我虽然这么说，但觉得这事被母亲看见总不好。

母亲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可是自从十年前父亲在西片町的宅邸

逝世以来，她很怕蛇。父亲临终前，母亲在他枕边看到一条不粗的黑绳子，想随手把它拾起来，才发觉是条蛇。蛇很快地向走廊逃去，然后就不见了。这事只有母亲跟和田舅舅两人看见，他俩不由得面面相觑，可是为了避免房间内送终的人慌乱，都忍着一声不响。虽然我们也在场，但关于那条蛇的事情却一点都不知道。

然而父亲去世的那天傍晚，庭园水池旁的每棵树上都有蛇爬上去，这桩事情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今年是二十九岁的老太婆，十年前父亲逝世时我已经十九岁，不是小孩子了，所以即便十年后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肯定不会弄错。我想剪些上供用的花，便向庭园池旁走去，在池岸的杜鹃花旁边停下脚步一看，杜鹃花的枝梢上有小蛇盘绕着。我有点惊奇，想折另一棵棣棠花的花枝，可那花枝上也盘绕着蛇。旁边的木樨、若枫、金雀儿、紫藤和樱树，无论哪儿，也不论哪棵树，都盘绕着蛇。然而我并不感到怎么可怕，只觉得蛇也和我一样，为父亲的逝世感到悲伤，才从洞中爬出来追悼他的吧？我把这事悄悄地告诉母亲，她听了却十分镇静，微微歪着头，仿佛在想什么，可是什么话都没有说。

但这两次蛇的事件使母亲从此非常讨厌蛇倒是事实。与其说是讨厌，不如说是敬畏，就是说，她似乎产生了畏惧。

我想母亲看见我烧蛇蛋一定认为不吉利，于是忽然觉得烧蛇蛋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说不定会给母亲带来什么灾难，所以老是放心不下，到第二天、第三天都无法忘掉，而今天早晨无意中又在餐厅里说漏了嘴，胡说什么美人命短，结果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终于哭起来。吃完早饭我一面收拾桌子，一面觉得好像有条使母亲缩短寿命的可怕小蛇钻进了自己的心底里，实在叫人厌恶得不得了。

可是当天我在庭园里又看见蛇了。这天天气爽朗，十分舒适，我把厨房活做完就带着一把藤椅走下台级，到庭园草坪上，想在那里打毛线，不料在石头旁的小竹子间看到了一条蛇。唉，真讨厌！我只是有这么个感觉，也没有想得更多，拿着藤椅就走回来，把它放在檐下

的廊子上，坐下来就开始打毛线。到了下午，我想到院子角落的佛堂里去从藏书中取出一本洛朗森①的画册，可是下庭园台级时又看见一条蛇在草坪中慢腾腾地爬着。还是早上那条蛇，是条细长的很文静的蛇。我想这是条“女蛇”。它静悄悄地穿过草坪，爬到野蔷薇的阴凉处停下，抬起头来颤动着火焰般的细长舌头。接着它向周围眺望了一会儿，便垂下头无精打采地蜷缩着不动了。这时我也只是强烈感觉到它是条美丽的蛇。我从佛堂里取出画册回来，悄悄地去看原来有蛇的地方，蛇已经不见了。

傍晚时分，我和母亲在中国式房间里一面喝茶，一面朝庭园眺望，这时候早上那条蛇又在石阶的第三级悄然出现了。

“那条蛇是……?”

母亲也看见了它，这么说着奔到我身边，握住我的手就呆立不动了。经母亲一提，我也忽然猜测到，脱口便说：

“是蛇蛋的母亲吧?”

“是的，一定是的。”

母亲的声音嘶哑了。

我们互相拉着手，屏息静气地默默注视着那条蛇。垂头丧气地蜷缩在石阶上的蛇又摇摇晃晃地滑动起来，像是有气无力地穿过石台阶，向燕子花那边爬去了。

“从早晨起它就在庭园里爬来爬去了，”我低声向母亲说。

母亲叹了一口气，就精疲力竭地坐到椅子上，用沉郁的声调说：

“是吗？它在寻找蛇蛋啊。怪可怜的。”

我无可奈何，低声地笑笑。

夕阳照在母亲脸上，她那双眼睛看上去甚至发出绿幽幽的光，微带怒色的脸显得异常美丽，不禁使我想扑上去抱她。我心里暗忖：

---

① 玛丽·洛朗森（1885—1956），法国女画家，起初属“立体派”，后转为“装饰式野兽派”。

啊，她这张脸似乎有点像刚才那条悲伤的蛇。而钻到我心中转来转去的那条丑恶的蝮蛇，说不定早晚会把这条深深地陷在悲伤之中的异常美丽的母蛇咬死。我不知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我把手放在母亲柔软纤细的肩膀上，不知怎么的难过了半天。

我们放弃了东京西片町的宅邸而搬到伊豆这幢中国式山庄来，是在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年的十二月初。父亲逝世以后，我们一家的经济全由和田舅舅照料，他是母亲的弟弟，现在是母亲的唯一骨肉。看来是他跟母亲说，战后世态变了，经济已经维持不了，现在最好卖掉房屋，把女佣人辞退，母女俩在乡下买一幢整洁的房子称心地过过日子。金钱的事母亲比小孩子更不懂，所以听和田舅舅这么一说，也就托他多加关照了。

十一月底，舅舅寄快信来，说骏豆铁路沿线河田子爵有一幢别墅要出让，房子建筑在高地上，适于眺望景致，还有一百坪[1]左右的田地，那一带的梅花十分有名，而且冬暖夏凉，我想你们住在那儿一定会喜欢的，我看有必要直接跟对方面洽，所以希望你明天无论如何到我银座的办事处来一趟。

“妈妈，您去吗?”我问她。

她脸上露出异常凄凉的神色，笑着回答说：

“这是托舅舅办的嘛。”

第二天母亲请从前的司机松山先生陪伴，刚过中午就去了，晚上八点多由松山先生送了回来。

“决定了!”母亲走进和子的房间，双手扶着和子的桌子，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一坐下就说了这么一句。

“决定了什么?”

“什么都决定了。”

---

① 一坪等于3.306平方米。

“可是，”我吃了一惊说，“什么样的房子，看也没看就……”

母亲在桌子上支起一只胳膊肘，手轻轻地托着前额，微微地叹了口气说：

“和田舅舅说是个好地方嘛。我想就这样闭着眼睛搬到那里去得啦。”

她说罢扬起脸来微微一笑。那张脸有点憔悴，却也很美。

“是啊，”母亲对和田舅舅的高度信赖使我只好附和说，“那么，我也把眼睛闭起来了。”

虽然两人都笑出声来，但笑过之后却感到很凄凉。

从此每天有搬运工到家里来打包准备搬家。和田舅舅也来安排，该变卖的就变卖了。我和女佣人阿君一道整理衣服，或者在院子里烧破烂东西，忙得不可开交。母亲既不吩咐什么，也一点不帮忙整理东西，每天躲在房间里磨磨蹭蹭的不知在干什么。

“怎么啦？您不愿意去伊豆了吗？”我一狠心，便用稍微苛刻的口吻问她。

她只是呆呆地回答一声：

“不是的。”

十天左右便整理好了。黄昏时候我和阿君两人在院子烧纸屑和稻草，母亲从房间里出来，站在廊子上默默地看着我们的火堆。一阵阴冷的西风吹来，烟低低地在地面掠过，我忽然抬头朝母亲看了一眼，从来没有看见过她的面色这样苍白，不由得惊讶地喊起来：

“妈妈，您的脸色不好哇！”

“没什么，”母亲微微一笑，转身又安静地回到房间里去了。

那天晚上由于被褥都包好，阿君就睡在二楼西式房间的沙发上，我把一床向邻居借来的被褥铺在母亲房间里，和母亲一起睡。

母亲出乎意外地对我说：

“因为有你，因为和你一起，我才想去伊豆的。同你在一道嘛。”

母亲的声音显得那么苍老而有气无力，简直叫人不敢相信。我吓

了一跳，不由得反问了一句：

“假如没有我呢?”

母亲突然哭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那不如死的好！妈妈也真想在你爸爸去世的这屋子里死去呀。”

母亲哭得越发伤心了。

母亲一次也没有向我讲过这样的泄气话，我也从未见她哭得这么厉害过。父亲逝世的时候，我出嫁的时候，我肚子里怀着孩子回到她身边来的时候，我在医院里生下了死胎的时候，我卧病在床起不来的时候，或者直治干了坏事的时候，母亲都没有露出过这种示弱的态度。父亲去世后十年，母亲同父亲在世时毫无两样，她是个无忧无虑的慈祥母亲。而我们则一味地跟母亲撒娇，逍遥自在地长大起来。可是母亲现在把钱用光了。为了我们，为了我和直治，她毫不吝惜钱，都用光了。现在已经不得不离开这个长年住惯了的屋子，搬到伊豆的小山庄去，只跟我两个人开始过寂寞的生活。如果母亲是个心眼不好的吝啬鬼，老是叱责我们，或者只顾暗中设法增加自己的私房钱，那么不管世道如何改变，她也不至于有这种不如死的心情吧？啊，没有钱是多么可怕而凄惨的事，就像掉进了不可得救的地狱一样。我像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这一点，悲痛得难过，因为过于痛苦，想哭也哭不出来，所谓人生严峻，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下的感觉吧？我感到身体都动弹不得，仰面朝天躺着，就像石头一样，一动也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面色依然不好，而且不知怎么的总是磨磨蹭蹭，像是尽可能在这个屋子里多待一会儿。可是和田舅舅来了，说行李已经发送得差不多，今天该去伊豆了。于是母亲只好勉勉强强地穿上大衣，对前来告别的阿君和常有来往的人默默地点头行礼，然后跟舅舅和我三个人一起走出了西片町的宅邸。

火车乘客少，三个人都有座位。一路上舅舅兴高采烈地吟唱谣曲；母亲脸色苍白，始终低着头，似乎很怕冷的样子。到了三岛改乘骏豆铁路，在伊豆长冈下车，走了十五分钟左右改乘汽车。下汽车

后，朝山那边沿着一条并不陡的坡道上去，就到了一个小村，小村尽头就是那幢相当别致的中国式山庄。

“妈妈，这地方比我想象的好，”我喘着气说。

“是啊。”

妈妈站在山庄门口，脸上一刹那掠过一丝高兴的笑容。

“首先是空气好，是新鲜空气，”舅舅洋洋自得地说。

“真是的，”妈妈微微笑着说。“好吃，这里的空气真好吃。”

三个人都笑起来。

进门一看，从东京寄来的行李都到了，从门口到房间堆满了行李。

“其次是，从房间看出去景致也好。”

舅舅高兴得把我们都拉到铺席子的房间里去坐。

这时是午后三点左右，初冬的太阳和暖地照着庭园草坪，穿过草坪走下石阶有一个小池子，旁边种有许多梅树，庭园下方展现着一片橘子地，再过去是一条村路，路那边是水田，再往远处是松树林，松树林那边看得见海。坐在房间里看去，大海的水平线正好平着我的胸口。

“景色很柔和，”母亲感到厌倦似的说。

“大概是空气的关系吧？太阳光跟东京的完全不同。光线好像用绢滤过似的，”我喜不自胜地说。

房间有十铺席和六铺席的，还有中国式的会客厅，在门口和浴室旁各有一间三铺席的小间，另外有餐厅和厨房，二楼有一间摆着大床的供客人用的西式房间，房间虽只有这么几个，可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不，即使直治回来有了三个人，也并不叫人感到拥挤而不舒畅。

舅舅到村里仅有的一家旅店去交涉晚饭，不久便送来了盒子装的简单饭菜，他在屋子里把盒子饭打开，就喝起他带来的威士忌，并兴致勃勃地谈他和这山庄的前主人河田子爵在中国旅行时遇到的倒霉事。可是母亲几乎筷子都没有动过，天微微暗下来她就低声说：

“就这么让我躺一会儿吧。”

我打开行李，把铺盖铺好，让她躺下来，还总觉得不放心，从包裹中找出体温表给她一量，却有 39℃。

舅舅似乎也吃了一惊，好歹先到坡下村里去找医生。

“妈妈，您怎么啦?”

我怎么叫她，她还是迷迷糊糊。

我握住母亲那只纤小的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我只觉得母亲实在太可怜太可怜了，不，我们两个都太可怜太可怜了，怎么哭都哭不停。我一面哭，一面真想就这么同母亲一起死去。我们已经什么都不要了。我觉得我们一走出西片町的宅邸，我们的人生就已经结束了。

过了两小时左右，舅舅带着村里一位医生回来。医生看上去年纪相当大，穿着礼装裙裤，是用仙台特产的高级丝绸做的，脚上穿着日本的白布袜。

“会变成肺炎也未可知。但即使变成肺炎也无须忧虑。”

医生看过后说了这样模棱两可的话，打了一针就回去了。

第二天母亲的热度还是没有降下来。和田舅舅交给我两千块钱，嘱咐说，万一需要住院，就打电报给他，当天他就回东京去了。

我从行李里拿出必要的炊事用具，熬点粥劝母亲吃。母亲躺着吃了三调羹，就摇了摇头。

将近中午时分，村子里的医生又来了。这回他没有穿礼装裙裤，可脚上还是穿着白布袜。

“住院是不是好些……”我建议说。

“不，我看并无必要吧。今天鄙人为她注射一针强效针，热度或许即能下降。”

他照旧模棱两可地回答，接着给母亲注射了所谓强效针，便回去了。

也许是那强效针奏了奇效吧，那天中午过后母亲便满面通红，浑身出汗，在换睡衣的时候笑着说：

“他也许是位名医呢。”

热度已经退到37℃。我高兴极了，拔腿就奔到村子里仅有的那家旅店去，请女掌柜让了十个鸡蛋，马上煮成半生不熟的给母亲吃。母亲吃了三个，还吃了半碗粥。

第二天村子里那位名医又穿着白布袜来了。我对他昨天注射强效针表示感谢，他脸上露出当然会见效的神色，深深地点了点头，接着就仔细地为母亲诊察，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

“令堂大人已经痊愈。今后进什么食做什么事，都可以悉听尊便了。”

他说着这种古里古怪的话，我费了很大力气才忍住没有笑出声来。

我把医生送到门口，回房间一看，母亲已经坐在床上，显得非常高兴，出神似的自言自语说：

“真是名医呀。我已经没有病了。”

“妈妈，我把里面一道纸糊窗拉开好吗？外面在下雪哩。”

大片的雪像花瓣似的轻轻飘落下来。我拉开纸糊窗，同母亲并排坐着，透过玻璃窗看伊豆的雪景。

“我已经没有病了，”母亲再次自言自语似的说。“我这么坐着，就觉得过去的事情全像做梦一样。老实说，快要搬家的时候，我是怎么也不想到伊豆来的。真想在西片町那屋子里多待一会儿，哪怕一天半天也好。坐上火车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是半死不活了，到了这里心情稍微愉快些，可是天一暗就越发怀念东京，难过得人都要晕过去了。这可不是普通的生病。那是神叫我一度死去，然后又使我变成与昨天不同的另一个人而复活了。”

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仅有我们两人的山庄生活总算平安无事地度过来了。村里的人待我们也都很亲切。搬到这里来是去年十二月，过了一月、二月、三月，现在是四月，我们除了做饭吃饭，大都在廊子编结东西，或在中国式房间里看书喝茶，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

活。二月梅花盛开，整个村庄便淹没于梅花之中。即便到三月，因为风和日丽，满开的梅花一点也不凋落，到三月底还是开得那么美丽。无论是清晨、白天、傍晚或是夜间，梅花都鲜艳得叫人赞叹不已。只要把走廊的玻璃窗户打开，不管什么时候，屋里立刻能闻到梅花香。三月底，一到黄昏就刮风，我在餐厅摆碗筷的时候，梅花瓣不时从窗口随风飘进来，落在碗子里潮湿了。到了四月，我和母亲在廊子编结东西时差不多就是谈耕地种菜的打算。母亲说她也要帮忙。啊，看到我这么写，大家可能以为当真就像母亲说过的那样，我们已经死过一次，变成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人复活了。然而像耶稣那种复活，在人来说毕竟是不可能的吧？母亲虽然嘴里那么说，可还是啜一口汤便会想起直治，不由得喊叫一声："啊！"而我过去的伤痕实际上也一点没有治好。

啊，我真想毫不隐瞒地把一切都和盘托出。有时我甚至认为，这山庄的安静只是表面的，全都是虚假的。即使说这是神赐给我们母女的短暂休息时间，可是我心里总不能不觉得，在这和平生活里，一种不吉的阴影正悄悄地逼近。母亲表面上装出幸福的样子，人却日益衰弱了；可我呢，由于有一条蝮蛇寄生在心中，甚至不顾牺牲母亲，自己却越发胖了，尽管想办法控制，还是一味地发胖，啊，如果这只是由于季节关系就好啦，近来我常常感到，这种生活实在令人无法忍受了。烧蛇蛋之类的下流行为，一准是我这心焦意烦的一种反映，结果是增加了母亲的悲伤，使母亲更加衰弱罢了。

一写到爱这个字，我什么也写不下去了。

二

发生蛇蛋事情之后大约十天，又发生了一件不吉的事情，越发使母亲悲伤，更加缩短了她的寿命。

我差点儿引起了一场火灾。

我竟引起了火灾。在我生活中会有这么可怕的事，这是我有生以来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

对火不小心便会引起火灾，难道我是连这样极普通的道理都不懂的“千金小姐”吗？

我半夜起来解手，走到门口的屏风旁边时，发现浴室那边很亮。无意中朝那里一看，浴室的玻璃窗映照得通红，还听到枯木噼噼啪啪炽烈燃烧的响声。我急步跑过去打开浴室的便门，赤脚走到外面一看，堆积在洗澡炉子旁的柴堆正在燃烧，火势很猛。

我立刻奔到与庭园连着的下面一户农家，拼命敲门，连声叫喊：

“中井先生！请快起来，失火啦！”

中井先生仿佛已经睡了，可他还是回答说：

“好，我马上来！”

当我还在央求他快来帮忙的时候，他穿着睡觉的浴衣就从家里飞跑出来了。

两个人跑到失火的地方，用洋铁桶打池水救火。正在这时候，我

听见屋子走廊那边传来母亲的嗳呀嗳呀声。我丢下水桶，从院子跑上走廊，说：

“妈妈，不用担心，不要紧的，您去休息吧。”

我赶紧抱住眼看就要倒下来的母亲，扶她上床躺下，又奔回失火的地方。这回我把澡盆里的水递给中井先生，中井先生把它往柴堆里浇，但火势太猛，这么做看来无论如何也灭不了火。

下面传来喊叫声：“失火啦！失火啦！别墅起火了！”很快就有四五个村民推倒篱笆跳进来。然后他们像接力赛跑那样用铁桶把篱笆下方的蓄水传递上来，两三分钟就把火浇灭了。再晚一些，火就要烧到浴室屋顶。

我刚觉得还算好的时候，忽然又想到失火的原因，不禁吓了一跳。真的，我到这时候才想到，昨天傍晚我把浴室炉灶烧剩的柴火从炉子中抽出来，满以为火都灭了，就把它放在柴堆旁，于是引起了火灾。一想到这一点，我都快要哭出来了，一直呆呆地站在那里不动，这时候听见对面西山先生家的媳妇在篱笆外边大声说：浴室烧光啦，都是不小心炉火引起的。

村长藤田先生、警察二宫和警防团团长大内先生等人都来了。藤田先生照常面带笑容，温和地问道：

“吓坏了吧，怎么回事啊？”

“怪我不好。我把以为灭了的柴……”

我这么一说，便觉得自己太凄惨，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低下头就什么也说不下去。那时候我还以为要被警察带走，成为犯人了。我忽然对自己只穿睡衣、光着脚的那种惊慌失措样子感到害臊，痛切地感到自己竟已倒霉到这种地步。

“明白了。你妈妈呢？”藤田先生用安慰我的口气慢慢地说。

“我让她在屋子里休息。她可吓坏了……”

“还算好，”年轻的二宫警察也安慰我说，“房子总算没烧着。”

这时候，坡下农家的中井先生回去换好衣服又来了：

“没什么，只是烧掉了一点劈柴。连小火灾都算不上，”他气喘吁吁地说，替我糊涂的过失辩护。

“是吗？我完全明白了。”

村长藤田先生也连连点着头，然后同二宫警察小声地商量着什么，然后回头说：

“那么我们回去啦。请代向你妈妈问好。”

村长转身就跟警防团长大内先生和其他人一起回去了。

只有二宫警察留下来，走到我跟前，声音低得像呼吸声似的说：

“那么，今天晚上的事我就不另外呈报了。”

二宫警察走了之后，坡下农家的中井先生非常担心似的，用紧张的声调问：

“二宫先生怎么说？”

“他说不呈报了，”我回答说。

篱笆那边也还有邻人，他们似乎也听到了我的回答。“这就好啦！这就好啦！”说着都慢慢地回家去了。

“你也该休息了，”中井先生向我打过招呼之后，也走了，我独自一人呆呆地站在烧过的柴堆旁，泪汪汪地仰望着天空，看样子天快亮了。

我走进浴室，把脸和手脚洗了洗，可是总有点害怕见到母亲，于是在浴室旁的三铺席房间里梳头发，磨蹭了半天，然后又到厨房去整理那些用不着整理的碗筷，一直弄到天大亮。

天亮之后，我蹑手蹑脚地偷偷来到母亲房间一看，她早已换好衣裳，精疲力竭地坐在中国式房间的椅子上，一见到我，就朝我微微一笑，面色苍白得使人吃惊。

我笑不起来，默默地走到母亲的椅子背后站着。

过一会儿，母亲说：

“这没关系呀，劈柴本来就是要烧的。”

我忽然觉得快活起来，嘻嘻地笑了。“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

苹果在银网子里。"[1]我想起《圣经》上这句箴言，对于自己有幸得到这么一位慈祥的母亲而由衷地感谢上帝。昨夜的事是昨夜的事。干吗要想不开？这么一想，我就透过中国式房间的玻璃窗眺望着伊豆清晨的大海，就这么一直站在母亲背后。后来母亲平静的呼吸和我的呼吸完全合在一起了。

简单地吃过早饭，我正在收拾被烧过的柴堆时，村里唯一的旅店的女掌柜阿咲从庭园的栅栏门外急步走来，眼上闪着泪花说：

"怎么搞的？怎么搞的？我这才听说，哎呀，昨天晚上究竟怎么搞的？"

"真对不起！"我小声道歉说。

"有什么对不起对得起的。小姐，重要的是警察那边怎么样？"

"说是不要紧。"

"啊，这就好啦！"她脸上露出从心底里感到高兴的神色说。

我同阿咲商量怎样向村里人表示感谢和道歉好。阿咲说还是送点钱，并且告诉我该上哪些人家去送钱道歉。

"要是小姐不愿意一个人去，我可以陪你去。"

"一个人去比较好吧？"

"一个人能去的话，当然是你一个人去好。"

"那我就一个人去。"

阿咲还帮我收拾了一下火烧过的地方。

收拾完，我向母亲要了钱，用美浓纸[2]做封包，每包包一张一百元的纸币，纸包上都写上"道歉"两个字。

最先去村公所。村长藤田先生不在，我就把纸包递给传达室的姑娘，并向她道歉说：

"昨天晚上的事我非常抱歉。今后我一定注意，这次请原谅吧。

---

① 见《旧约全书·箴言》第二十五章。

② 岐阜县美浓地方产的一种日本纸。

并请代向村长先生致意。”

然后我到警防团团长大内先生家去，大内先生亲自到门口，看着我一声不响，难过地微笑着，我不知怎么的，突然要哭出来了。

“昨夜很对不起！”

我好不容易才讲出这句话，赶忙就告辞了，一路上泪水直流，脸上擦的粉弄得一塌糊涂了，只好回家到盥洗室洗脸，重新化妆。正在房门口穿鞋想出门的时候，母亲从屋子里出来问我：

“你还得出去吗？”

“啊，才跑了一两家呢！”我头也不抬，回答说。

“辛苦你啦！”母亲亲切地说。

我受到母爱的鼓舞，这回一次都没哭过，挨家挨户都跑遍了。

到了区长家，区长不在，出来的是他儿媳妇，对方一见到我反而自己满眼含泪。在警察家，二宫警察对我说：好啦，好啦。他们待我都很和气。然后又挨家走访近邻，同样受到了大家的安慰和同情。只有一个人严厉地叱责我，就是对面那家西山先生的小媳妇，说是小媳妇，实际上是个四十左右的大婶了。

“今后可得请你小心点。你们是皇族还是什么族，我可不知道，但是对于你们像玩儿童做饭游戏那样过活，我看着早就在替你们担心了。像是两个小孩生活在一起，以前没有发生火灾反倒叫人奇怪呢。真的，今后可得多留点神啊。你不要小看，昨晚要是风再大一点，这村庄整个都给烧掉啦。”

当时坡下农家的中井先生还特地跑到村长先生和二宫警察面前替我讲好话，说这连小火灾都不算；可正是这位西山先生的小媳妇却在篱笆外边大声说：浴室烧光啦，都是不小心炉火引起的。然而我倒认为西山先生小媳妇的责备是真情实话。我感到确实如此。对西山先生的小媳妇没有什么可埋怨的。母亲为了安慰我，跟我开玩笑说劈柴本来就是要烧的，可那时候真的风大的话，说不定正像西山先生的小媳妇说的那样，这整个村庄都要烧毁了。到那时候，我即使用死来谢

罪也来不及了。我一死，母亲大概也活不了，这也等于玷污了已故父亲的名声。虽说现在已经不时兴什么皇族不皇族，华族不华族，但反正是要灭亡的东西，那就痛痛快快地灭亡吧，然而因为闹出火灾谢罪而死，这种悲惨的死法可就叫人死也很难瞑目了。总而言之，今后必须挺起来好好干才对。

我从第二天起便鼓起劲做田里的活。坡下农家中井先生的姑娘也常常来给我帮忙。自从差点引起火灾而出丑之后，不知怎的，我总觉得自己身上的血仿佛有点变成暗红色了，在这以前已经有条心术不正的蝮蛇寄生在心中，现在又连血的颜色都有些变了，所以愈加觉得自己正在变成粗野的乡下姑娘，即使在檐下廊子同母亲一起打点毛线，不知怎的也会叫我感到窒息难受，倒不如去田里翻翻土干些活，反而感到舒畅些。

这就是所谓体力劳动吧？这种力气活在我来说也不是第一次了。战争期间我曾经被征去劳动，甚至还做过打夯女工。现在去田里干活穿的那双胶皮底袜子也是那时候军队配给的。胶皮底袜子这玩意儿当时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穿，穿着却觉得非常舒服，简直舒服得叫人不敢相信。我穿着它在庭园中一走，对飞禽走兽光着脚在地上走有多么轻松愉快，仿佛也完全能够体会了，心里可真高兴啊。战争中令人愉快的回忆就只有这么一个。回想起来，战争实在是叫人受不了。

去年，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前年，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大前年，也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刚停战不久，某报登过这样一首有趣的诗。现在回想起来，一方面好像有过许多事情，另一方面却也真的似乎不曾有过什么事情。有关战争的回忆，我既不愿讲，也不愿听。尽管人死了不少，可这讲起来既陈旧又无聊。这难道是我太自顾自吗？只有我穿着胶皮底袜子被

征去当打夯女工那件事想起来还不觉得那么陈旧。虽然也感到相当痛苦，但是由于做过打夯女工，我的身体却着实健壮起来，甚至到现在我有时还打算在生活真正困难时就去当打夯女工过日子。

战局已经快到绝望的时期，一个身穿军装似的衣服的男人到西片町来，递给我一张征召通知和一个劳动日程表。一看日程表，从第二天起我就得隔日到立川①地方的深山里去劳动，我不由得落下泪来。

"不能请人代替吗?"

我眼泪怎么也止不住，终于啜泣起来了。

"这是军队征召，必须本人去，"那男人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决心去了。

第二天下雨，我们在立川山脚下排好队，先听一个军官训话。

"战争一定能胜利，"军官一开头就这么讲，接着说："战争一定能胜利，但是如果大家不按照军队的命令工作，就会妨碍作战，就会发生冲绳那样的后果。因此大家必须完全照吩咐的办。此外，也可能有特务钻进山来，你们都要互相注意。今后你们也像士兵一样进入阵地工作，有关阵地的情况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讲，这一点希望充分注意。"

山中烟雨迷离，将近五百名男女队员浑身湿透，就这样站在那里恭听这番训话。队员中还混杂着国民学校的男女学生，冷得都快哭出来了。雨水透过我的雨衣渐渐渗到上衣，不久连贴身衬衣也湿透了。

那一整天都是挑网篮装运土石。在回家的电车上我不禁掉下眼泪。第二次干的是拉绳子打夯，干这活我最有兴趣。

上山两三次以后，我发觉国民学校的男学生老是奇怪地盯着我看。有一天我在挑网篮，两三个男生跟我擦肩而过，其中一个小声说：

"她就是特务吧?"

我听了吓一大跳。

---

① 地名，在东京都内。

“怎么说出那种话来呢?”我问同我并肩挑网篮的年轻姑娘。

“因为你像外国人嘛,”年轻姑娘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你也以为我是特务吗?”

“不,”这回她稍稍笑着回答。

“我是个日本人哪。”

讲过之后，我连自己都觉得这句话无聊极了，一个人吃吃地笑起来。

有一天天气晴朗，我从早晨起就跟男人们一道搬运圆木，一个值勤监视的年轻军官皱紧双眉，用手指着我说:

“喂，你！到这儿来。”

他说着朝松树林方向快步走去，我感到不安和恐怖，心扑通扑通直跳，跟在他后面走。在树林深处堆积着刚从锯木厂送来的木板，军官在木板堆前停下脚步，突然转过身子对我说:

“每天干吃不消吧？今天就请你在这里看守这些木材。”

他露着雪白的牙笑了。

“就站在这儿吗?”

“这儿又凉快又安静，就在这木板上睡一个午觉吧。如果觉得无聊，就读读这本书，也许你已经看过了，”他说着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册文库本，腼腆地把它扔在木板上。

文库本上写着《三驾马车》几个字。

我拿起书，说:

“谢谢。我家也有喜欢看书的，不过他现在还在南方。”

“啊，是吗，是您家先生吧。在南方可了不得啦，”他仿佛听错了我的话，连连摇着头悄悄说，“总之，今天就在这里当看守，你的饭，一会儿我给你送来，你好好地休息吧。”

说罢，军官急忙回去了。

我坐在木材上看书，看完大约半本，那位军官咯噔咯噔走过来了:

“给你送饭来了。一个人觉得无聊吧?”

他说着把饭盒子放在草地上，又急急忙忙地赶回去了。

我吃过饭便爬到木材上躺着看书，看完书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醒来已经是下午三点过后。我忽然觉得那位年轻军官从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从木材上下来，正在理头发，又听见咯噔咯噔的脚步声走过来，他说：

“啊，今天辛苦啦。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我跑到军官跟前，把书还给他。我想说句感谢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是抬头默默地凝视着军官的脸。当两个人视线碰在一起时，我的热泪簌簌地往下落。那位军官的眼睛也闪烁着泪花。

两个人就这样默默地分别了，那位年轻军官以后再也没有到我们干活的地方来过。我也只玩了那么一天，以后还是隔天在立川的山中艰苦地劳动。母亲始终很担心我的身体，可是我反而强壮起来了。现在我对干打夯女工之类的力气活还是充满信心，干地里活也不觉得怎么苦了。

我说我不愿讲也不愿听有关战争的事情，可是不知不觉却讲了我自己“宝贵的体验”。不过在我的战争回忆中还想稍微讲讲的，简单说来也就是这么一点，除此以外就像那首诗写的一样，可以说是：

去年，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前年，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大前年，也不曾有过什么事情。

我身边留下来的就是这么一双胶皮底袜子，其余都像一场幻梦，只觉得是愚蠢和无聊。从胶皮底袜子无意中讲了这些废话，离开本题了。我如今正是穿着这双可说是战争唯一纪念品的胶皮底袜子，每天上田里去排遣隐藏在心底里的不安和焦躁，而母亲近来看上去却日益明显地衰弱了。

蛇蛋。

火灾。

从那时候起，我总觉得母亲显然有一副病人的样子。而我恰恰相反，觉得自己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既粗野又下流的女人。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是靠不断吮吸母亲身上的活力而日益胖起来的。

起火的时候母亲还开玩笑说劈柴本来就是要烧的，从那以后，像是要安慰我，她一次都不提及火灾的事，并且处处照顾我，然而她内心受到的打击肯定比我还大十倍。那场起火的事之后，母亲不时在半夜里发出呻吟声，到了刮大风的夜晚，她在深夜里时时假装上厕所，偷偷从床上起来在家里到处巡视。而且她面色始终苍白，有时甚至走路都显得困难。从前她也说过想帮我做点田里活，有一次她竟然不听我劝阻，提着大桶打了五六次井水来浇地，第二天就说肩膀疼痛得气都透不过来，整天躺着不能起床，从这以后，她对田里活似乎彻底死心了，偶尔到田里来，也只是默不作声地看着我干活。

“听说谁喜欢夏季的花就会在夏天里死，这话是真的吗？”

今天母亲在看着我干活的时候，忽然说了这么一句。我一声不响地给茄子浇水。啊，这么说，现在已经是初夏了。

“我喜欢合欢木的花，可这庭园里一棵也没有，”母亲继续平静地说。

“不是有很多夹竹桃吗？”我故意用粗暴的语气说。

“夹竹桃我可不喜欢。夏天的花我大都喜欢，可是夹竹桃有一种轻佻的感觉。”

“我喜欢蔷薇。不过它四季都开花，所以喜欢蔷薇的人就会春天里死，夏天里死，秋天里死，冬天里死，得反反复复死四次。”

两个人都笑起来。

“不休息一会儿吗？”母亲继续笑着说。“今天妈妈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呢。”

“什么事啊？死的事情我可不爱听。”

我跟着母亲走到紫藤架下，在长凳上并排坐下来。紫藤花已经凋谢了，下午柔和的阳光透过紫藤叶洒在我们膝上，把我们的膝盖染成

一片绿色。

“这件事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不过想在两个人心情都愉快的时候说，等机会一直等到今天。反正这不是件好事情。不过今天我总觉得能坦率地讲出来了，希望你也耐心地听我讲完。直治其实还活着呢。”

我一下子愣住了。

“五六天前，和田舅舅来信说，有个从前在他公司里工作的人最近从南方回来去看他，在闲聊的时候才晓得，这个人恰巧和直治同一个部队。直治也平安无事，大概不久就能回来了。不过有件事可叫人伤脑筋。据那人讲，直治抽鸦片似乎中毒很深……”

“又来了！”

我好像吃了什么苦果似的把嘴都扭歪了。直治在高等学校的时候模仿一位小说家，患了麻药中毒，因此欠了药房一笔惊人的借款，母亲为了向药房还清这笔债款整整花了两年工夫。

“是的，好像又患了。可是那人说，不把它戒掉看来是不准回来的，所以他一定能戒了回来。舅舅在信中还说，即使他戒了鸦片回来，像他那种品行的人可不能马上让他出去工作。如今在这混乱的东京工作，连正常人都感到有点失常，何况一个刚刚治好中毒毛病的半病人呢，他立刻会像发疯一样，谁知道他会出点什么事啊。因此直治回来马上要把他领到伊豆这山庄，什么地方也别让他去，暂时就在这里静养比较好，这是一。还有，和子，舅舅还嘱咐了另外一桩事。舅舅说如今又是冻结存款，又是抽财产税什么的，我们已经没有什么钱，舅舅要像以前那样寄钱给我们就有困难了。因此直治回来之后，妈妈我、直治和你三个人都不做事，生活费全靠舅舅想办法的话，他就得操很多心。所以舅舅说趁早给和子找个婆家，或者找个人家去相帮也好。”

“去相帮，是指当女佣人吗？”

“不，舅舅说的是到驹场家相帮，”母亲举了一家皇族的名字继续说，“舅舅说那家皇族和我们也有亲，所以和子上他家去相帮，兼做

小姐的家庭教师，大概也不会感到拘束和孤单的。”

“再没有别的差使吗？”

“舅舅说，别的职业对和子来说恐怕不太合适吧。”

“为什么不合适？妈妈，您说吧，为什么不合适？”

母亲惨然地微微笑着，一句话都没回答。

“我可不干哪！那种活儿……”

我也意识到自己脱口说出了意外的话。可是怎么也抑制不住了。

“我所以穿着这种胶皮底袜子，所以穿这种胶皮底袜子，”我一开口，眼泪就夺眶而出，不禁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我扬着头，一面用手背擦眼泪，一面想：对母亲不好这样，不好这样，可是我的话却像无意识地，似乎同我毫无关系似的一口气顺嘴说出来了。“您不是说过吗？您不是说过，因为有和子你，因为有你在一道，所以我才想去伊豆的？您不是这样说过，没有和子您就不想活了吗？所以我才什么地方也不去，一直待在妈妈身边，像这样穿着胶皮底袜子干活，我是想让妈妈尝到好吃点的蔬菜，可是您一听到直治要回来，就突然把我当做累赘，叫我去给皇族当女佣人，这可太过分了，太过分了。”

虽然我也觉得在脱口而出地说着过于无情的话，但话像什么生物似的，不受我控制了。

“穷了，没钱了，把我们的衣服卖掉不行吗？把这房子也卖掉不行吗？我什么都能干。到村公所当个女办事员什么的都可以，村公所不肯用我，就去当打夯女工什么的。穷算得了什么？我一直想，只要妈妈爱我，我就一辈子都待在妈妈身边，可是看来妈妈更喜欢直治。那么我走，我走好啦。反正我和直治一向合不来，三个人一起过大家都会感到不幸的。我和妈妈两个人已经一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什么可以留恋的了。今后就不夹杂外人，只由直治和妈妈母子俩过日子，由直治尽量来孝敬您得啦。我也已经感到厌烦了，我对以前的生活都感到厌烦了。我走，今天就走！我有我去的地方！”

我站了起来。

“和子!”

母亲声色俱厉地喊了一声，脸上充满我从未见过的严厉神气，她一声不响地面对我站着，看上去身材似乎比我稍稍高一点。

我想马上说一声对不起，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反倒又说出别的话来了。

“您骗了我，妈妈您骗了我。直治回来以前，您在利用我呢。我是您的女佣人。现在不需要了，就叫我到皇族那儿去。”

我站在那里哇的一声又哭出来，哭个没完。

“你真傻呀，”母亲低声说，她的声音气得颤抖着。

“是的，我傻。因为傻才受骗了。因为傻才被人当做累赘嘛。我走了好是不是？穷，怎么啦？钱，又怎么啦？我真不懂。我只是相信爱，相信妈妈的爱才活到今天呀。”

我抬着头，顺口又说了这些不讲理的蠢话。

母亲突然把脸背过去，她也在哭。我想扑上去抱住母亲说声对不起，可是双手做田里活弄脏了。我略微踌躇一下，不知怎的又变得冷冰冰地说：

“只要我不在就行，对不对？我可以走。我有我去的地方!”

说罢，我就急步跑了。我先到浴室，呜呜咽咽地哭着，把脸和手脚洗了洗，然后到房间里换上西式服装，这时禁不住又哇的一声大哭起来，真想尽情地放声痛哭一场，于是跑到二楼西式房间便扑倒在床上了。我把毛毯一直蒙到头上，放声大哭，好像人都哭瘦了。后来神思恍惚，我渐渐地怀念起一个人来，多么想同他见一面，多么想听到他的声音！简直恋慕得像两足足底让艾炷灸着，一动不动地忍着灼痛一样，我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心情。

傍晚时候，母亲悄悄走进二楼的西式房间，吧哒一声开了电灯，随后走近床边，非常温存地叫了一声：

“和子!”

“嗯。”

我起来坐在床上，用双手理着散乱的头发，一见母亲的脸便嘻嘻地笑起来。

母亲也微微地笑着，深深地坐到窗子旁边的沙发上，说：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违背了和田舅舅的嘱咐……妈妈刚才给舅舅写了封回信，我是这么写的：孩子们的事就让我来安排吧。和子，我们把衣服卖掉吧。把两个人的衣服全卖掉，拿出钱来挥霍它一下，过一过舒服的生活。我再也不想让你干庄稼活了。买贵一点的蔬菜又有什么关系呢？每天干那种农活，对你来说也太委屈了。”

事实上，每天干庄稼活我也有点吃不消。刚才所以像发疯一样大哭大闹，就是因为干庄稼活的疲劳和悲伤心情混杂在一起，一切都觉得既厌烦又可恨。

我坐在床上低着头，默不作声。

“和子。”

“嗳。”

“你说你有去的地方，是哪儿？”

我感到自己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

“是细田先生那儿吗？”

我不响。

母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问道：

“可以提提往事吗？”

“请吧，”我小声回答说。

“当你离开山木先生家回到西片町家里来的时候，妈妈相信并没有讲过什么责怪的话，只说了一句：‘你辜负了妈妈的期望啊！’你记得吗？你听了就哭起来……我也感到当时不该用‘辜负’这样重的字眼……”

然而当时我听母亲那么一说，反倒很感激她，高兴得哭起来了。

“妈妈那时候说你辜负了我，不是指你离开了山木先生家，而是因为山木先生告诉我：和子和细田两人在相爱，当时听他那么一说，

我真感到自己的脸色都变了。细田先生早是有妇之夫，还有子女，不管你怎样爱他也毫无办法了……”

“什么两人在相爱，全是瞎说。那不过是山木先生瞎猜罢了。”

“真的吗？我想你不会还在想念那位细田先生吧。你说要去的地方是哪儿?”

“反正不是细田先生的家。”

“是吗？那是什么地方?”

“妈妈，我曾经想过一件事：人完全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是什么？语言、智慧、思考和社会秩序吗？所有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其他动物也都有吧？说不定还有信仰哩。人吹嘘自己是万物之灵，但他和其他动物好像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似的？可是，妈妈，我倒发现有一点是不同的，您不知道吧？有一样东西是其他动物绝对没有而只有人才有的。那就是人有秘密事儿！您说是吗?”

母亲脸上微微发红，笑得很美丽，她说：

“啊，和子的秘密事儿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就好啦，妈妈每天早上都在向爸爸祈祷：赐给和子幸福吧。”

我的脑海里忽地浮现出秋天原野的景色，那是我和父亲坐汽车到那须野去游玩在途中下车时看到的情景。野外盛开着胡枝子、瞿麦、龙胆和败酱草等秋季花草。野葡萄还没有熟。

然后我和父亲乘汽艇游琵琶湖。我跳进湖里，水藻中的小鱼碰到我的腿，湖底清晰地映出我两条腿的影子，它们不停地划动着——这些情景前后毫无关联地在我脑海里时而浮现，时而消失。

我从床上滑下来，抱住母亲的双膝说：

“妈妈，刚才我对不起您啦。”

回想起来，那天前后是我们母女俩幸福的回光返照，接着直治从南方归来，我们真正的地狱生活便开始了。

三

心里发慌，好像已经怎么也活不下去了似的。这就是所谓不安的心情吧，痛苦的浪潮在我心里不断翻滚，像白云在骤雨过后的天空中接连地匆匆掠过一样，使我的心脏时而收紧，时而松开，脉搏出现了间歇，呼吸变得稀薄，眼前发黑，一片模糊，全身的力气忽然从指尖上跑掉，毛线都打不下去了。

近来淫雨绵绵，令人纳闷，不论做什么都感到厌倦，所以今天我把藤椅搬到铺席房间檐下的廊子，想把今年春天没有打完的毛衣打下去。毛线是浅牡丹色，很不鲜艳，我打算给它配上深蓝色的毛线，打成一件毛线上衣。这些浅牡丹色毛线是从二十年前我上小学时母亲给我打的一条围巾上拆下来的。那条围巾的一端当头巾用，我把它戴在头上往镜子里一照，像个小妖怪。而且它和其他同学的围巾颜色完全不一样，我真不想要它。一个关西[①]巨额纳税者家庭的同学曾经用老成的口吻称赞我说："你围着一条好围巾哪！"我听了反而愈加感到害臊，这条围巾以后就丢在一边，一次也没围过。但是今年春天，由于所谓废物利用吧，我又将它拆开想打一件毛线上衣，可是对那暗淡的颜色总觉得不称心，结果打了一半又不打了，今天由于过分无聊，

① 关西指京都和大阪一带地方。

偶然取出来慢腾腾地继续打下去。我一面打毛衣，一面无意中发现：那浅牡丹色的毛线和阴霾的灰色天空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既柔和又相宜的色调。这一点我过去是不知道的。我从不知道有这么个重要的道理：服装必须考虑它同天空颜色的调和。调和，这是多么优美而绝妙的事情啊，使我不由得有点惊讶。灰色天空和浅牡丹色毛线配合起来，双方会同时显得生气勃勃，这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手上的毛线忽然变得暖和起来，冷冰冰的阴霾天空也变得像天鹅绒那样柔和了。我还想起莫奈①的雾中寺院那幅画。我好像通过毛线的颜色才第一次认识到"搭配"的意义。母亲有雅致的爱好，她完全晓得这种浅牡丹色在冬季的雪天里多么调和而美丽，才特地为我挑选的，可我由于自己无知，一直不喜欢它，但是母亲对我这个孩子一点也不强制，随我高兴，对这颜色一句也不解释，装做不知道的样子，二十年来一直默不作声，等着我自己真正懂得这种颜色的美丽。我深深感到她是一位好妈妈，也意识到我和直治两人时刻都在虐待这么好的一位母亲，使她为难，使她日益衰弱下去，也许不久就会使她丧命，我心中忽然涌起无法形容的恐怖和不安的乌云。我越是东想西想，越是觉得在未来的道路上尽是异常可怕的坏事情，内心非常不安，甚至觉得怎么也活不下去了，手指头的力气也没有了，就把绒线针放在膝上，深深叹了一口气，抬起头，闭着眼睛，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妈妈！"

母亲正靠在房间角落的桌子上看书，诧异地问我：

"什么事啊？"

我张皇失措，不知回答什么好，就故意放大嗓门说：

"蔷薇开花了。妈妈，您看到了吗？我刚刚才发现它终于开花了。"

这是指廊子前的蔷薇。这蔷薇是和田舅舅过去从法国或英国，也

---

① 克洛德·莫奈（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

记不清是哪一国了，反正是从遥远的地方带回来的，两三个月前，舅舅把它移植到这山庄庭园里来，到今天早晨才开了一朵花。这件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可是为了掩饰窘态，我假装刚发现一样，大声笑着嚷了一声。这朵紫绛色的花给人一种严肃、骄傲和坚强的印象。

“我知道了，”母亲平静地说。“你好像把它当件大事呢。”

“也许是的。您觉得可怜吗？”

“不，我只是说你有这种脾气，在厨房的火柴盒上贴列那狐[1]的画呀，给娃娃做手帕呀，看来你喜欢这些事。而且你说起庭园那蔷薇的事来，好像在说活人的事一样。”

“因为我没有孩子呀！”

我脱口说出了连自己都没想到的话，讲过之后自己也吓了一跳，觉得很不好意思，不停地摆弄着膝上的毛线。这时我仿佛清楚地听见一个男人很不好意思地用低音说：“你已经二十九岁了。”这声音就像是从电话里传来的，听了叫人害臊，我顿时羞得满面通红，热得像发烧一样。

母亲没有作声，继续看她的书。几天来母亲都戴着纱布口罩，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她近来显然不爱说话了？这口罩是听直治的话戴上的。

十天前，直治带着一张黝黑的脸从南方的岛屿回国来了。

他事先一点没有通知，夏天傍晚从后门走进庭园来：

“唉呀呀，糟糕透了。这个家一点趣味都没有。在门口挂个招牌吧：‘来来轩。出售烧卖！’”

这就是直治第一次见到我时说的话。

在这两三天前，母亲因为舌头有毛病卧床了。外表看不出有什么不对，可是她说舌尖一动就疼得不得了，吃饭也只喝点薄粥。“请医生给看看吧，”我劝她。她摇摇头苦笑着说：

“会给人笑话的。”

---

① 列那狐是法国民间故事中的角色。

我给她涂了卢戈耳氏溶液，好像没用处，因此我很不放心。

就在这时候，直治回国来了。

直治在母亲枕边坐下，说了声“我回来啦”，并行了个礼，紧接着他站起来，把狭小的家到处看了看，我一直跟在他后面走。

“怎么样？妈妈变了吗？”

“变了，变了。瘦多了。不如早点死了好。妈妈这样的人，在这种社会里是怎么也没有办法活下去的。太惨啦，叫人不忍心看哪！”

“我呢？”

“变得下流了。看上去像是有两三个男人似的。有酒吗？今天晚上我可要喝个痛快！”

我到村子里唯一的旅店去，求女掌柜阿咲说：弟弟回来了，分一点酒给我吧。阿咲回答说，不凑巧，酒现在缺货。我回来告诉直治，他脸色陡然一变，像个陌生人似的说：“哼，都怪你不会打交道。”他问了我旅店在哪儿，就趿拉着在院子里穿的木屐跑出去了。之后怎么等他都没有回家来。

我烧了直治喜欢吃的烧苹果和用鸡蛋做的菜，餐厅也换上了明亮的大灯泡。等了他很久，阿咲忽然从厨房后门走进来：

“您看这不要紧吧？他在喝烧酒呢……”阿咲把平时那对圆滚滚的鲤鱼眼睛睁得更大，像发生了重大事件似的压低声音说。

“烧酒，就是甲醇吗？”

“不，不是甲醇，可是……”

“不会喝出病来吧？”

“当然不会，不过……”

“那就请你让他喝吧。”

阿咲像是硬把唾沫咽下去那样点了点头便回去了。

我去向母亲说：

“听说他在阿咲那里喝酒呢。”

母亲听了歪着嘴笑了笑，说：

“哦，那么鸦片他是不是戒了？你先吃饭吧。还有，今天晚上三个人都在这房间里睡吧。把直治的被褥铺在当中。”

我真想哭。

夜深了，直治踏着粗野的脚步回来。我们三个人钻到铺席房间的一顶蚊帐里睡。

“是不是讲点南方的事情给妈妈听听啊?”我躺着说。

“没什么好讲的。没什么好讲的。全都忘了。到日本，上了火车，透过车窗看到的水田真是美丽极啦。就这么些，都讲完了。把电灯关掉吧。这怎么睡得着?”

我关了电灯。夏夜的月光像洪水一样充溢在蚊帐中。

第二天早晨，直治趴在睡铺上边吸烟边远眺大海。

“舌头痛，是吗?”他好像这才发现母亲身体不舒服似的说。

母亲只是微微地笑了笑。

“那一定是心理作用引起的，准是晚上张着嘴睡觉。太不注意了。戴个口罩吧。用利凡诺尔液浸一浸纱布，把它放在口罩里就行啦。”

我听了不由得笑出声来：

“这叫什么疗法?”

“叫美学疗法!”

“可是妈妈一定不喜欢戴口罩。”

不但是口罩，母亲连眼带啦，眼镜啦这些戴在脸上的东西都一向不喜欢。

“妈妈，您说要戴口罩吗?”我问。

“戴，”母亲声音很低，却很认真地说，我不禁吃了一惊。看来直治不论说什么，她都相信并且照办。

早饭后，我照直治刚才说的，把纱布在利凡诺尔液里浸过，准备好口罩就送到母亲那里去。母亲一声不响地接过去，就那么躺着，顺从地将口罩带子挂到自己两只耳朵上了。那样子真像个小女孩，我看了感到一阵悲哀。

正午过后，直治说他要去同东京的朋友和文学老师他们见见面，换上西装，向母亲要了两千块钱，就上东京去了。这以后近十天直治都没有回来。母亲却每天戴着口罩等他。

“利凡诺尔液是一种好药哇。戴着这口罩，舌头就不疼啦，”母亲笑着说。

我总觉得母亲在说谎。她说已经不要紧了，现在她已经起床，可看样子胃口还是不大好，很少说话，因此我非常担心。直治在东京干些什么呢，准是同那位小说家上原先生等人一起在游逛，被东京那股疯狂的浪潮给卷进去了。我越想越感到痛苦和难受，突然向母亲说起蔷薇什么的，还脱口讲了“因为我没有孩子呀”这种连自己也感到意外的话，情况愈来愈糟，想到这里，我就“啊”地叫了一声，站起身来，可到底没有什么地方可去，连身子都不知往哪儿搁好，于是顺着楼梯摇摇晃晃地上二楼，走进了西式房间。

这个房间如今准备给直治用。四五天前，我和母亲商量后请坡下农家中井先生来帮忙，把直治的衣橱、书橱和五六箱书和笔记本，总之，把从前西片町宅邸直治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到这里，等直治从东京回来再把它们放到他喜欢的地方。在他回来以前，我想还是让它们随便放着好。所以屋子里满地都是东西，连踏脚的地方都没有了。我从脚边的木箱里随手捡起直治一个笔记本看看，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

《夜开花日记》

里边都是些胡乱地写下的东西。看来这是直治患麻药中毒感到苦恼时写的手记。

活活烧死之感。虽然痛苦，但一句半句也叫不得，旷古未有，开天辟地以来从无先例，这种无底地狱的情形可不要掩饰。

思想？是假的。主义？是假的。理想？是假的。秩序？是假的。诚实？真理？纯洁？全都是假的。听说牛岛的紫藤有千年树龄，熊野的紫藤有数百年树龄，其花穗前者最长为九尺，后者有五尺余，我只对那花穗感兴趣。

那也是人之子。正活着。

论理，归根到底是对论理的爱。不是对活着的人的爱。

金钱和女人。论理便羞怯地急忙溜掉了。

历史、哲学、教育、宗教、法律、政治、经济、社会，一个处女的微笑比这些学问都更可贵，浮士德博士勇敢地证实了。

学问是虚荣的别名，是人想为了不成为人的努力。

向歌德[①]我也敢发誓。要我写得怎样好都行。通篇结构严谨，具有适当的诙谐和叫读者流泪的悲哀，或者严肃的，即读起来令人所谓肃然起敬的完美无缺的小说，朗读起来简直像银幕上的解说词，但这种玩意儿真叫人害臊，我哪能够写呢？写出这种杰作来的想法根本就是卑劣的。读小说会肃然起敬，那是疯子的行为。那样的话，作家索性得身穿和服礼装来写作才行。我认为越是好的作品越没有装模作样的感觉。我只因为想看一下朋友由衷感觉高兴的笑容，才故意将一篇小说写糟，写得非常拙劣，还假装摔了个屁股墩，一边搔着头一边溜走了。啊，瞧朋友当时那副高兴的样子吧！

文章不行，人不行，吹玩具喇叭给人家听，这是日本最傻的人，你还算好哩，祝你长寿！——这样祝愿的爱情究竟是什么呢？

朋友得意洋洋地叙述感想：这就是那家伙的缺点，真令人可惜。别人在爱他也不知道。

没有不端品行的人有没有呢？

真没意思。

---

① 歌德（1749—1832），德国著名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浮士德》是他的代表作。

希望得到钱。

不然的话，

睡着睡着死去吧！

在药房里负了近一千元债。今天偷偷地把当铺掌柜带到家里来，让他进我的房间。我问他这屋里有没有比较值钱而可当的东西，有就拿去，我急需钱用。掌柜也不好好看一下就说："算了吧，又不是你的家具。""好，那就只把我过去用零用钱买来的东西拿走吧，"我一面说大话，一面把一些破烂东西凑在一起，可是可当的东西一样也没有。

首先是那石膏手像。这是维纳斯的右手。一只像大丽花般的手，一只雪白的手，它下面只垫上一个座子。可是你只要仔细一看就明白：这是维纳斯被男子看到她全裸，大吃一惊，羞得整个裸身都变成淡红色，乱扭着发烧的身子时手的姿势。通过指尖无指纹、掌上无手纹的一只雪白娇嫩的右手，维纳斯感到喘不过气来的害羞表情完全表现出来了，使人看了甚至会怜悯得心里难受。然而这归根到底是一种不实用的破烂东西。掌柜估价为五毛钱。

其他还有巴黎近郊大地图、直径近一尺的赛璐珞陀螺、可以写出字来比丝还细的特制笔尖，当初无一不是当做意外收获买来的，可是掌柜笑着说他要走啦。"等一等！"我拦住他，结果又让掌柜背了一大堆书回去，领款五元整。我书架上的书大都是廉价的文库本，而且是从旧书店买来的，所以当的价钱自然也这么少了。

想还一千元的债，结果仅得五元整。我在这社会里的实际能力大致如此。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

颓废？可是不这样混就活不下去。这样骂我的人比不上当面敢于对我说"你去死吧"的人。这样骂倒令人觉得痛快些。然而很少有人会说："你去死吧！"都是些非常卑贱而又谨小慎微

的伪君子。

正义？所谓阶级斗争的本质并不在那个地方。人道？别开玩笑了。我可知道，那就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要把对方打倒，把对方消灭掉。这不是宣告“你去死吧”是什么？你们可不要掩饰啊。

然而我们的阶级里没有什么像样的人。尽是些白痴、幽灵、守财奴、疯狗、吹牛专家、讲话不文不白假装斯文、只会从云上撒尿的人。

连“你去死吧”这话都不值得向他们去说。

战争。日本的战争是自暴自弃。

被卷进这种自暴自弃中去而死，这我不干。那倒不如独自一个人死的好。

人说谎时必定假装正经。近来领导人那种一本正经的样子真可笑。哼！

我希望跟不想受人尊敬的人交往。

可是那样的好人却不会要跟我交往。

我伪装早熟，人们就传说我早熟。我伪装懒汉，人们就传说我是懒汉。我伪装写不出小说，人们就传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伪装说谎，人们就传说我说谎。我伪装有钱，人们就传说我有钱。我伪装冷淡，人们就传说我冷淡。然而当我当真痛苦得禁不住发出呻吟时，人们却传说我是伪装成痛苦的。

总有出入。

归根到底，除了自杀大概没有别的办法了吧？

尽管这么痛苦，也不过是以自杀告终，这样一想，我便不

由得失声大哭起来。

据说春天早晨，在朝阳照耀着两三朵花蕾绽开的梅村枝头上，有个海德尔堡的年轻学生吊死了。

“妈妈！你骂我吧！”

“怎么个骂法呢?”

“就骂我是个懦弱的人！”

“是吗？懦弱的人……这行了吧?”

妈妈慈爱无比。一想起妈妈我就想哭。为了向妈妈表示歉意，我也应该死。

请原谅我吧，请再原谅我这一次吧。

幼鹤生下目已盲，
岁月如梭渐成长，
羽毛丰满成大鸟，
终日哀苦暗神伤。
(元旦试作)

吗啡　阿特罗莫尔[1]　纳尔科蓬　盼得本　巴比纳尔班奥宾　阿托品

何谓自尊心，自尊心是什么?

“我比别人强！”“我有很多优点！”一个人，不，一个男人，难道不这么想就不能活下去吗?

---

① 从这一个词开始，以下那些词均为镇静、镇痛、麻醉剂等药的商品名称。

我讨厌别人，别人讨厌我。
斗智。

严肃＝愚蠢

总而言之，人还活着，肯定正在做欺骗人的勾当。

一封借钱的信：
“回信吧。
请回信吧。
希望一定是个好消息。
我预料我将蒙受种种耻辱，我正在独自呻吟。
这不是在演戏。绝对不是。
请帮助我吧。
我羞耻得人都要死了。
这不是夸张。
天天等候回信，白天黑夜都在发抖。
请不要把我推倒在地。
夜深了，墙壁那边传来了吃吃的笑声，我在床上辗转反侧。
请别让我受辱吧。
姐姐！”

读到这里，我把那本《夜开花日记》合起来，放回木箱里，然后朝窗口走去，把窗户完全打开，俯视着在烟雨中显得一片白茫茫的庭园，回想起当时的往事。

六年过去了。直治那时的麻药中毒成了我离婚的原因，不，也不能这么说，即使没有直治的麻药中毒，总有一天我也会由于别的什么偶然原因而离婚，我想这似乎是我生下来就注定了的事情。直治没办

法给药房付款时，曾再三死乞白赖地求我给他钱。那时我刚嫁给山木，哪能这么自由地用钱呢？而且我觉得，私下把男方的钱接济娘家弟弟很不合适，因此我同由娘家陪我过来的奶妈阿关一起商量，把自己的手镯、项链和衣服卖了。弟弟寄信给我说："请给钱。"他信上还说：

"现在感到既痛苦又害臊，怎么也没脸见姐姐，甚至打个电话谈一谈都不敢，因此请吩咐阿关把钱送到小说家上原二郎先生那里去。姐姐一定只知道他的名字，他就住在京桥×街×号的茅野公寓。上原先生的名声好像不好，社会上都把他看做堕落的人。其实他绝不是那种人，所以可以放心把钱交给他。上原先生一接到钱，就会马上打电话告诉我的。请务必这么办，因为我这次中毒，无论如何不想让妈妈知道。我打算在妈妈还没有发觉的时候，想尽办法将它治好。这回我得到姐姐的钱，就还清药房的债，到盐原[①]的别墅去，等身体恢复健康后再回来，这是真的。药房的债一还清，我决心不再使用麻药了，我可以向神发誓，请相信我，对妈妈要保密。叫阿关交给茅野公寓的上原先生，我恳求你。"

他的信这样写，我照他的话，让阿关偷偷把钱送到上原先生的公寓去了。但是弟弟在信上发的誓全是谎言，他没有去盐原别墅，药物中毒却越来越深了。可是他缠着要钱的信总是用近似悲鸣的痛苦语调写，说什么这回无论如何一定要戒毒了，又是哀求又是起誓，叫人不由得背过脸不忍把信看下去，于是我一面想这说不定又是撒谎，一面不知不觉又叫阿关去卖别针之类，把钱送到上原先生的公寓去。

"上原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矮个儿，面色很不好，说话板着脸很不和气，"阿关回答

---

①地名，是个温泉疗养地，位于枥木县北部盐谷郡。

说。"不过他很少在公寓里。大都只有太太同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在家。这位太太并不怎么漂亮，可是人很和气，看样子很有修养。把钱交给那位太太倒是可以放心的。"

那时候的我同现在的我比较起来，不，甚至比都不能比，简直是另外一个人，是个过悠闲日子的呆子。但是尽管如此，弟弟接连硬是要钱，而且金额越来越大，这样一来我到底还是放心不下，有一天看完能乐[1]回来，在银座就让小汽车先回去，一个人步行去访问京桥的茅野公寓。

上原先生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看报。他身上穿着条纹夹衣和藏青地碎白花纹的外褂，看上去又像老年人又像年轻人，好像一只从未见过的稀奇动物一样，这就是他第一次给我的古怪印象。

"我老婆……刚才和孩子一起……出去买配给的东西了……"

上原稍带鼻音地断断续续说话。看来他把我当做了妻子的朋友。我说我是直治的姐姐，上原先生一听，"哼"地笑了一声。不知怎的，我心里感到有点害怕。

"到外边去吧。"

说着他已经披上和服外套，赶紧从木屐箱里取出一双新木屐，一穿上就在我前头沿着公寓走廊头也不回地出去了。

初冬的傍晚。寒风凛冽。仿佛是由隅田川河上吹来的风。上原先生像逆风前进，稍稍耸起右肩，朝筑地方向默默地走。我只得小步在他后面追赶。

两人走进了东京剧场后面大楼的地下室。二十铺帘大小的细长房间里，有四五堆顾客坐在桌子两旁静悄悄地喝酒。

上原先生用玻璃杯喝酒。他给我叫了一杯，劝我也喝点。我喝了两玻璃杯，一点也没什么。

上原先生又喝酒又吸烟，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我有生以来还是第

---

① 日本的一种古典乐剧。

一次到这种地方来，但我十分沉静，觉得很舒畅。

“喝点酒就好啦，可是……”

“啊?”

“不，我是说你弟弟。他改喝酒就好了。从前我也患过麻药中毒，人们对麻药中毒总觉得有些可怕，其实酒精也没什么两样，可是人们对于酒精却出乎意外地宽容。我来把你弟弟变成一个爱喝酒的人吧。好吗?”

“爱喝酒的人我看到过一次。新年我要出门的时候，我家司机的一个熟人像鬼怪一般满脸通红，躺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我吓了一跳，不觉喊叫起来，司机说这个人是个酒鬼，真没办法。司机把他从汽车上拉下来，扛在肩上，不知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像一个没有骨头的人，耷拉着身子，可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什么。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所谓酒鬼，不过也觉得很有趣。”

“我也是个酒鬼。”

“是吗，但总不一样吧?”

“你也是酒鬼呢。”

“没有的事。酒鬼我见过，可完全不一样。”

上原先生这才快活地笑了笑，说：

“那么，你弟弟也许不可能成为酒鬼，但不管怎样，让他变成一个爱喝酒的人总比较好。我们走吧。太晚了，你会不方便吧?”

“不，不要紧的。”

“说实话，倒是我感觉拘束得受不了。大姐！算账吧!”

“贵吗？钱不多的话，我有……”

“是吗？那么就由你来付账吧。”

“我也许不够呢?”

我看了看手提包，告诉上原先生有多少钱。

“有这么多钱，还可以到两三家酒馆去。跟我开什么玩笑!”上原先生皱紧眉头这么说，接着又笑了。

“您还要上什么地方去喝酒吗?”我问道。

上原先生一本正经地摇着头说:

“不,已经够了。我给你叫出租汽车,你回去吧。”

我们踏着地下室昏暗的楼梯上去。走在我前面一步的上原先生,在半楼梯上忽然转过身来,很快地亲了亲我的嘴。我紧闭着嘴唇让他吻了。

我并不怎么喜欢上原先生,但那以后却有了这“秘密事”。上原先生咯嗒咯嗒地奔上楼梯,我怀着一种奇异而清澈的心情慢慢地上楼梯,到了外边,河风迎面吹来,使人感到无比舒服。

上原先生找来了出租汽车,我们不声不响地分别了。

我的身子任凭汽车摇晃着,内心感到这世界突然变得像大海那样宽阔了。

“我有情人呢,”有一天我受到丈夫责备时,不禁觉得孤单凄凉,无意中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是细田吧?你怎么也死不了心吗?”

我默不作声。

每逢我们夫妻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这个问题就会提出来。我感到这已经不可挽回了。正像衣服料子剪裁错了一样。剪裁错了的料子无法缝合,只好全部放弃,重新剪裁别的新料子。

“难道肚子里的那孩子是……”有一天晚上丈夫指责我说。

我听了觉得很可怕,浑身嗦嗦发抖。现在想来,我和丈夫那时候都还年轻。我不知道什么是恋,也不懂得什么叫爱。我被细田先生的画迷住了,我对谁都这么说:“如果能够成为细田先生的夫人,该能过多么美满的生活啊。不同这样风雅的人结婚,结婚就没有什么意义。”这一来我被大家误会了。可是我不但不收回前言,而且虽说不懂什么叫恋和爱,却满不在乎地公然说:“我喜欢细田先生。”这一下便发生了意外的纠葛,连还在我肚子里的小娃娃都受到我丈夫怀疑。尽管我们谁也没有公开说要离婚,但周围的人都不知不觉地冷眼

相看，于是我同陪我的阿关一起回到娘家母亲这里来了。后来我生了死胎，接着又生病卧床，从此我跟山木的关系便完全断绝了。

直治似乎对于我的离婚也感到负有什么责任似的说：“我死好啦。”他说罢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脸都仿佛要哭烂了。我问弟弟药房的债积欠了多少，那金额之大确实可怕。而且后来知道，这个数目还是假的，因为弟弟不敢说出实际数额来。实际总额比弟弟当时告诉我的几乎要大三倍。

“我和上原先生见过面了，他是个好人。今后你就同上原先生一起喝酒玩吧，怎么样？酒也不便宜，不过酒钱我随时可以给你。欠药房的钱也不用担心。总可以解决的。”

我和上原先生见过面，还说他是好人，这仿佛使弟弟非常高兴。那天晚上弟弟一接过我给他的钱，马上就到上原先生那儿玩去了。

说不定中毒是一种精神上的病吧。我称赞上原先生，向弟弟借上原先生的著作看，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之类的话，弟弟听了便说，姐姐那样的人怎么可能理解他呢，不过他还是露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接着又说：“那么看看这个吧。”他又拿上原先生的其他著作给我看。后来我也认真地读起上原先生的小说来了，两个人常常念叨上原先生。弟弟几乎每天晚上大摇大摆地找上原先生去玩，看来他是照上原先生的计划逐渐转到喝酒方面去。药房的债务问题，我偷偷地提出来同母亲商量。母亲用一只手蒙住脸，一动也不动地思考着。之后她抬起头来，凄凉地笑着说：“想也没有用。也不知道需要还几年，可我们还是每个月还给人家一点吧。”

这些都是六年前的事了。

夜开花。啊，弟弟也感到痛苦吧。而且路都挡住了，什么事情应该如何做，直到现在恐怕他都还没有弄明白吧？他大概只是每天拼着性命在喝酒？

索性横下心来真正做个品行不端的人又怎么样？这样弟弟也许反而会感到轻松吧？

没有不端品行的人有没有呢？那笔记本里有这样的话。给他一问，我也觉得我是个品行不端的人，舅舅也是个品行不端的人，甚至母亲好像也是个品行不端的人。所谓品行不端的人，指的会不会是柔情的人呢？

四

写信好还是不写信好，我犹豫了很久。今天早晨忽然想起了耶稣的话：要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1]于是我奇怪地来了精神，决定写信给您。我是直治的姐姐。您忘了吗？如果忘了就请回忆起来吧。

前些日子直治又来打搅了，看来给您添了不少麻烦，实在很抱歉。（直治的事其实应该随直治的便，我多嘴多舌地表示道歉，我也觉得太无聊了。）今天我不是为了直治的事而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想请求您。我听直治说，您在京桥的公寓受灾之后搬到现在的住址来了，我很想直接上东京郊外去您家拜访，可是母亲最近身体不大舒服，丢下母亲跑到东京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所以决定写这封信给您。

我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

我要商量的问题，如果从以往的“女大学”的立场来看，也许是非常奸诈，又很肮脏，甚至是一种恶劣的犯罪行为，但是我，不，我们，照现在这样就很难活下去，所以我打算将我的想法毫不掩饰地告诉您——我弟弟直治在这世上似乎最尊敬的人，——恳求您给予指点。

现在的生活我受不了。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照旧不变

---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

的话，我们母子三人是怎么也活不下去了。

昨天我还感到难受，身体像有点儿发烧，喘不过气来，不知怎么办好。中午稍过，坡下农家的姑娘冒雨扛米来了。我就照说定的把衣服给她。姑娘在餐厅对着我坐下，一边喝茶，一边用非常现实的口气说：

"您靠卖东西，今后能维持多久啊?"

"大概一年半载，"我回答说。我用右手遮住半边脸，继续说："我老想睡，倦得受不了。"

"您累啦。大概得了一种神经衰弱，老是想睡的?"

"也许是吧。"

我差点儿流泪了，这时候我忽然想起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个字眼。对我来说，现实主义是不存在的。一想到这样能不能活下去，浑身就不寒而栗了。母亲是个半病人，她有时卧床，有时起来。而弟弟呢，您也知道，他精神上是个重病人。在这里，他每天要到附近一家兼做旅店的菜馆去喝烧酒，三天里就有一次带着我们卖衣服的钱上东京去玩。我感到痛苦的倒不是这些事情。我清楚地预感到，我虽然没有病倒，我的生命却在这种日常生活中一天天地自然消灭，就像芭蕉叶不落地便腐烂掉一样。这使我感到害怕，无论如何也受不了。因此即使违背"女大学"的处世原则，我也想要摆脱现在这种生活，所以我想找您商量了。

现在我想明确地告诉母亲和弟弟，说我早就爱上一个人，准备做他的情人，一起生活。这个人照说您也认识。他的名字的大写字母是M·C。以前我一有痛苦的事就想飞到M·C那儿去，想他都要想死了。

M·C和您一样，也有夫人和孩子。似乎还有比我更漂亮更年轻的女朋友。但我觉得除了到M·C那里，没有别的活路了。M·C夫人我虽然还没有见过，但听说她待人和善，是个好人。一想到那位夫人，我就觉得自己是个可怕的女人。然而我又觉得我现在的生活仿佛比这桩事还要可怕，所以依然不能不投靠M·C。我希望驯良像鸽子、

灵巧像蛇那样去实现我的恋情。不过妈妈、弟弟和社会上的人肯定没有一个会赞成我。您怎么样？总之，我除了独自思考独自行动之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想到这里我的眼泪便不禁夺眶而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的事情。这样难办的事，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在人们的祝福中实现吗？像思考一道非常复杂的因数分解的代数答案一样，我费尽心机仔细思考，仿佛总会有个线头可以把乱线一下子顺利地理开似的，我突然又变得快活起来了。

但首要的是，M·C怎样看我呢？想到这一点，我就垂头丧气了。说起来，我是送上门的……怎么说好呢，我不能说自己是送上门的妻子，可不可以说是送上门的情人呢，说到底就是这么回事，因此只要M·C说一声他怎么也不愿意，那就完了。所以我要拜托您，请您问问他看？六年前的一天，我心中出现了一道淡淡的彩虹，它既不是恋又不是爱，但随着岁月过去，那彩虹变得越来越鲜艳，色彩越来越浓了，至今我都没有忘记它。骤雨后在晴朗天空中出现的彩虹很快便会消失，但人心中的彩虹却仿佛不会消失。请您问问那个人看，他究竟是怎样看待我的？是不是也看成雨后彩虹那样呢？而且是早已消失了的彩虹？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也不能不把我的彩虹抹掉了。然而不先把我的生命消灭就要把我心中的彩虹抹掉，这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盼望着您的回信。此致

上原二郎先生（我的契诃夫。My Chekhov。M·C）[1]

再者，近来我一点一点地胖起来了。我认为，与其说是我渐渐成了一个动物般的女人，不如说我更像个人了。这个夏天，我只读了一本劳伦斯[2]的小说。

---

① 契诃夫（1860—1904），俄国作家。My Chekhov是英文，意为“我的契诃夫”，“M·C”是其缩写。

② 戴·赫·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

您没有回信，所以我再次写信给您。上次那封信充满蛇一般的狡诈，我想您大概一个个都识破了吧？的确，那封信的每一行字我都是极尽狡诈之能事写的。您大概认为这封信不过是想请求您接济我的生活，我的意图只是想要钱吧。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如果说我只是为了找个保护人，那对不起，我不需要特地选择您。愿意照料我的有钱老人并不少。事实上不久前我还有过一件奇妙的亲事。对方的名字说不定您也知道，他是个六十多岁的单身老人，据说还是个艺术院会员什么的。这位艺术大师为了要我，竟到这山庄来了。他就住在西片町我们原来的家附近。由于过去我们和他在同一“邻组”①，有时偶尔见见面。记得秋天里一个黄昏，我和母亲坐着汽车经过那位大师的家，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呆呆地伫立在家门口，母亲透过汽车窗口向他轻轻地点头致意，只见大师那副总是板着的黝黑的脸一下子比霜叶还红。

“是不是在恋爱，”我打趣说。“妈妈，他喜欢您呢。”

“不，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母亲却很镇静，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说。

尊敬艺术家是我家的家风。

听说那位艺术家的夫人前几年去世了，他通过一位跟和田舅舅要好、也对谣曲很自负的皇族向我母亲提出这个希望，母亲叫我怎样想就怎样直接给他回信，我因为不愿意，也用不着多考虑便直截了当地写了封信，告诉他我现在并不想结婚。

“我回掉他行吧？”

“当然行……我也觉得这件事不太合适。”

那时候艺术家住在轻井泽的别墅，我把这封拒绝的信寄到别墅去了。可是艺术家还没有收到信，第二天却突然到我们山庄来了。他说他是去伊豆温泉工作，顺路来看我们的，关于我的回信他一无所知。

---

① 邻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类似我国新中国成立前保甲制度的组织。

看来艺术家这种人尽管年纪大，做事仍然像小孩子那样任性。

母亲因为身体不舒服，就叫我出来接待，我在中国式房间请他喝茶，说：

“我那封辞谢的信，我想这时候该到轻井泽了。我是认真考虑过的。”

“是吗?”艺术家慌慌张张地说。他揩了揩汗珠，接着又说：“不过这桩事请您再好好考虑一下。我能使您……怎么说好呢，说起来也许在精神上不能给您幸福，但是在物质方面却尽可以使您幸福。至少这一点我敢肯定。嘿，坦率而毫不客气地说来就是这么回事。”

“您说的那种幸福，我还不大能够理解。请允许我冒昧地说吧。契诃夫在给他妻子的信中不是写过吗：‘请生一个孩子吧，生一个我们的孩子吧！’尼采的随笔中也有这样的话：‘一个想让她生孩子的女人’。我希望有个孩子。什么幸福，那种玩意儿随它去吧。钱我也想要，不过只要有一点钱可以抚养孩子就够了。”

“您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不管对谁都能说出您的心里话。跟您这样的人在一起，我的工作也许会忽然出现新的灵感吧?”艺术家奇妙地笑了笑，和他的年龄不相称而有点装模作样地说了这样刺耳的话。

我想，如果我真有力量能使一个伟大艺术家在工作上返老还童，那无疑也是一种极有意义的生活，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我被那个艺术家抱着的样子。

“难道我对您没有爱也行吗?”我略微笑着问道。

艺术家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女人这就行了。女人是个呆子也没什么关系啊。”

“可是像我这样的女人，没有爱还是不能考虑结婚的。我已经是个大人，明年就是三十岁了。”说过之后，我又不由得把嘴捂起来。

三十岁。女人在二十九岁以前还有少女的气息。一个女人到了三十岁，她身上就不再存在丝毫少女的气息了，我忽然想起从前读过的一本法国小说中的这些话，心头不禁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孤单和寂

寞。往窗外一看，只见大海映照着正午的阳光，就像玻璃的碎片那样强烈地闪闪发亮。读那本小说的时候，我只觉得是这样嘛，也便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能满不在乎地认为一个女人到三十岁就完了，那种时候实在是令人怀念啊。手镯、项链、衣裳、腰带一一从我身边消失，随着这些东西的消失，我身上的少女气息也越来越少了吧？一个贫穷的中年妇女。啊，真难过！可是中年妇女的生活中也还是有女人的生活啊。我最近懂得了这一点。我还记得，我十九岁时一位英国女教师回国，曾经对我说：

“您不可以恋爱。您一恋爱就会变得不幸了。要恋爱也等长大之后再恋爱。三十岁以后再谈好了。”

那时我听了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当时我对三十岁以后的事根本想象不出来。

“听说你们要把这别墅卖掉……”艺术家的脸上忽然泛起不怀好意的表情说道。

我不免笑起来。

“请原谅我失礼，因为我想起了《樱桃园》①。是您要买下来吧？”

艺术家到底敏感地觉察到了，他像是生气，歪着嘴不做声。

确实有个皇族打算住到这里，曾提出用新日币五十万元买这所房子，后来没有下文了。艺术家大概听到了这个传闻吧。不过他感到自己被我们看成《樱桃园》里罗巴辛一类人可受不了，于是显得情绪很不好，闲聊了一会就走了。

我现在要求您的不是罗巴辛。那是可以肯定的。我只是请您接受一个送上门的中年女人。

我初次跟您见面，那是六年前的事了。那时对于您的为人我一无所知。我仅仅知道您是我弟弟的老师，而且是个不太好的老师。后来我和您一起用玻璃杯喝酒，之后您不是悄悄地胡闹了一下吗？但我并

---

①《樱桃园》是契诃夫的著名剧本，写到一家破落地主把祖传领地卖给新兴暴发户罗巴辛。

不在乎。不知怎的，真奇怪，我只觉得轻松了。我既不是喜欢您又不是讨厌您，都不是。这以后为了叫弟弟高兴，我就向他借您的著作来看，觉得有的饶有趣味，有的却没意思。我不是那么个热心的读者。可在这六年当中，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您的事却像雾一样渗透到我心中来。那天晚上我们俩在地下室楼梯上的事一下子清晰地回想起来，我总觉得这是件决定我命运的大事。真想死您了，也许这就是恋爱吧。一想到这个我便感到不安和寂寞，独自抽抽噎噎地哭起来。您和其他男人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是像《海鸥》[1]里的妮娜那样爱上了一个作家。我不憧憬小说家。要是把我看做一个爱好文学的少女，那我真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希望生个您的孩子。

假使早先您还是一个独身的人，而我也还没嫁给山木，我们相遇而结婚了，我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痛苦。可是我已认命，我和您是不可能结婚的。推开您的夫人，那像是无耻的暴力行为，我不喜欢这么做。我哪怕就当个小老婆吧（这字眼我很不愿意讲，但即使叫情人又有什么用，通俗地说，确实是小老婆，所以我还是明确地讲了）。不过世上一般小老婆的生活似乎是困难的。人们说，小老婆一到无用的时候大多被人遗弃，无论哪个男人，快到六十岁时都回到正妻那里去。我也曾听西片町的老仆和乳母说："不管怎样，小老婆可当不得！"不过那是世上一般小老婆的情形，我觉得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认为对您来说最要紧的还是工作。如果您喜欢我的话，两个人相好对您的工作也有好处吧？这样一来，您的夫人也会理解我们的。这道理好像有点牵强，可是我认为我的想法没有什么不对。

问题仅仅在于您的回音。喜欢我，讨厌我，还是两者都不是。我很害怕听到您的回音，可是我又不能不问个明白。上次那封信中我写道：一个送上门的情人。在这封信里又写道：一个送上门的中年女人。可是现在仔细一想，没有您的回音，我即使想送上门也没法送，

---

①《海鸥》是契诃夫的著名剧本。

除了一个人呆呆地在这里憔悴下去，还有什么办法呢？您不说一句话还是不行啊！

现在忽然想到，您在小说里相当大胆地写恋爱之类的冒险故事，被社会上风言风语地说成大无赖，其实您仅是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吧？我不懂什么常识。只要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我以为就是过着好生活了。我愿意生您的孩子。其他人的孩子我无论如何都不想生。因此我才跟您商量。如果您理解的话，就请给我回信，把您的想法明确地告诉我吧。

雨停了，却又刮起风来。现在是午后三点。我想现在就去领配给的一级酒（六合），把两只朗姆酒瓶放在袋子里，把这封信摆在胸袋里，再过十分钟左右我就到坡下的村庄去。这酒不给弟弟喝，我想自己喝。每天晚上用玻璃杯喝一杯。真正喝酒看来还是应该用玻璃杯喝的。对不？

您不想到这里来吗？此致

M·C 先生。

今天又下雨了。外面正下着眼睛几乎看不见的蒙蒙细雨。我每天都不外出，只等着您的回音，可是直到今天都没有收到信。您究竟在想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上一封信里提到那位艺术大师的事反而使您不高兴了？“故意写那件亲事，想扇起我的竞争心哩。”您是不是这么想？可是那门亲事就那样结束了。刚才我和母亲还讲到这桩事，两人都笑了。母亲不久前因为舌尖痛，直治劝她做美学疗法，通过这疗法现在不痛了，所以最近她的精神稍微好了点。

刚才我站在檐下廊子上，一面望着一阵风卷着蒙蒙细雨吹过去，一面在揣度您的心情。这时听到了母亲在餐厅那边叫我：

“牛奶煮好了，你过来吧。”母亲见到我又说：“天气冷，所以我烧得烫一些。”

我们在餐厅一边喝着冒热气的牛奶，一边交谈着前几天那位艺

术家的事。

“他和我无论如何也不相配吧?”

“是不相配,”母亲随口回答道。

“我太任性了。我也不是不喜欢艺术家,再说那个人似乎有许多收入,同那样的人结婚倒是蛮好呢。我虽然这么想,可还是不愿意啊。”

“和子你真坏。你那样不愿意,还跟他高高兴兴地说了半天,你的心情我真不明白,”母亲笑了笑说。

“啊,因为很有趣嘛。我还想跟他多谈谈呢。我的做法不够慎重吧?”

“不,你太黏了。和子你这个人太黏了。”

今天母亲的精神非常好。

母亲看了看我昨天第一次梳的高髻发型,说:

“头发少的人梳高髻比较合适。你的高髻过于漂亮了,真想给你戴上一顶小金冠呢。你梳这个不合适。”

“那我真失望了。妈妈,您从前不是说过我的脖子又洁白又优美,梳头时最好别把脖子遮住吗?”

“你只记得这些事。”

“受人称赞的哪怕是小事,一生也忘不了。记住它使人更高兴啊。”

“上次那个人大概也称赞过你什么吧?”

“是啊,所以我变黏了。他说他跟我在一起就会有灵感……啊,真叫人受不了。我虽然不是不喜欢艺术家,但像他那样摆出一副人格高尚的样子,我可怎么也不喜欢。”

“直治的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听了大吃一惊。

“我不太了解,反正是直治的老师嘛,好像是个明码标价的坏蛋。”

“明码标价?”母亲流露出愉快的眼神喃喃地说。“这个词真有意思。明码标价反而可靠。这不更好吗?就像脖子上挂着铃铛的小猫一样使人感到可爱。没标明价码的坏人才可怕哩。”

“是吗?”

我高兴得不得了,觉得自己的身子好像一下子轻飘飘的,像烟那样飘到天上去了。您能领会我为什么感到高兴吗?如果您不能领会的话……我可要揍您了。

您真不想到这里来玩一次吗?我叫直治把您带来好像有点不自然,所以请您装做发酒疯,顺路到这儿来吧。由直治陪着来也可以,不过最好还是您一个人来,而且趁直治上东京不在家的时候来。因为直治在家,他要把您拉过去,你们一定会到阿咲那里去喝酒,事情也就完了。我家世世代代喜欢艺术家。古时候画家光琳[①]曾经在京都我们家逗留过很长时间,在桶扇上给我们画了很漂亮的画。因此我想,您来访,我母亲一定会高兴的。大概会安排您睡二楼的西式房间。请别忘了把电灯关掉。我一只手拿着小蜡烛,顺着黑暗的楼梯上去……这不行吧?太早了。

我喜欢坏蛋,特别喜欢明码标价的坏蛋。我也想成为一个明码标价的坏蛋呢。我觉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活路了。您在日本是天字第一号明码标价的坏蛋吧?弟弟说最近又有很多人在攻击您,说您卑鄙无耻,是个讨厌的家伙,他们都非常恨您,但我听了之后越发喜欢您了。我想您这样的人一定有很多女朋友,但不久您会渐渐地只喜欢我一个。不知怎的我总这样想。您跟我生活在一起,每天都能愉快地工作。我从小就常常听人对我说:“同你在一起能够忘掉辛苦。”我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不讨人喜欢的事。大家都说我是个好孩子。因此我认为您也绝对没有理由不喜欢我。

咱们见面就行了。现在已经不需要回信,什么也不必要了。我真

---

① 尾形光琳,日本江户时代绘画流派“光琳派”的创始人。

想见见您。我上东京到您家里去，这也许是见面的最简单办法，可是我母亲像个半病人，我是片刻不离地在旁伺候的护士兼女佣人，所以那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我恳求您，请您到这里来吧。我希望和您见一面。见面之后一切都会明白的。请看一看我嘴角两旁出现的微小皱纹吧。请看一看这些象征着年代悲哀的皱纹吧。我的面容按理比我的任何话语更能清楚地把我的想法告诉您。

在第一封信里我提到过我心中出现的彩虹，这道彩虹并不是萤火虫的光或者星光那种幽雅的美。我的心思如果是那样淡淡的而又遥远的话，我就不会这么痛苦，也可以逐渐把您忘掉了。我心中的彩虹是一座火焰的桥。我感到我的心都要烧焦了。一个麻药中毒的人碰到麻药缺货，渴望麻药的心情恐怕也没有这么难过吧？我没错，我不是在做什么邪恶的事情。我虽然这么想，有时却会不寒而栗，忽然觉得自己是不是在做一桩了不得的大蠢事。我还时常反问自己，我是不是发疯了。然而我也有冷静地在计划着的事情。说真的，请您到这儿来一趟吧。什么时候来都行。我哪儿也不去，始终等候着您。请相信我。

再见一面吧，到那时候您要是不愿意，就明白对我讲好了。我心中的火焰是您给点燃的，所以也请您来吹灭。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怎么也灭不了。总之见一面吧，见一面我就能得救了。要是在《万叶集》[①]或《源氏物语》[②]的时代，我说的这种事一点也不成为问题。我的愿望是当您的爱妾，当您孩子的母亲。

这样的信如果有人嘲笑，这个人就是嘲笑一个努力想活下去的女人。他就是一个嘲笑女人生命的人。我不能忍受海港内滞积着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即便港外有暴风雨，我也要扬帆起航。歇着的帆毫无例外都是污秽的。那些嘲笑我的人一准都是歇着的帆，他们什么事都

---

①《万叶集》是日本最古的歌集，收集公元四世纪至八世纪中叶长、短和歌约四千五百首。

②《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巨著，一般认为作者是紫式部（女），大约写于1004—1009年。在那时候，贵族通常是一夫多妻，可随意通奸纳妾。

不会干。

使人伤脑筋的女人。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最痛苦的正是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任何痛苦的旁观者正松开了污秽的帆在休息，却还要来批判这个问题，那实在太无聊了。我不希望人家随便说我这是一种什么什么思想。我没有思想我是从来不用什么思想或哲学来采取行动的。

我知道，社会上认为好的、受尊敬的人都是些说谎的人，都是伪君子。我不相信这个社会。只有那些明码标价的坏蛋才是我的朋友。明码标价的坏蛋。我即使被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面也心甘情愿。尽管可能受到万人的责难，然而我也可以谴责他们说：你们不是没标明价码的更危险的坏蛋吗?

您能理解吗?

恋爱不需要理由。好似小道理讲多了点。但我又觉得这不过是模拟弟弟说话罢了。我只是等待着您到这儿来。我希望同您再见一次面。没有别的要求了。

等待。啊，在人的生活里有喜、怒、哀、乐，但是这种感情只不过占人生活中的百分之一，而其余百分之九十九的生活，难道不是只在等待中度过吗?我怀着焦灼不安、望眼欲穿的心情时刻等待着走廊上传来幸福的脚步声，可是完全落空了。唉，所谓人的生活实在太凄惨了。大家都说，不要生下来就好啦。这就是现实。然而人每天都从早到晚虚幻地在等待着什么。这太悲惨了。啊，生下来倒不错，我希望能这样高兴地看一看人生和社会。

您不能冲破那种道德的阻碍吗?

此致

M·C（这不是 My Chekhov 的缩写。我不恋慕作家。这是 My Child[1]。）

---

① 英文，意为“我的孩子”，缩写也是 M.C。

五

今年夏天我给一个男人寄去了三封信，都没有回信。不管怎么考虑，我都觉得除此之外无法活下去，于是把自己的心里话写成三封信，怀着一种犹如从岬角往翻滚的怒涛中跳下去的心情，将这些信投入了邮箱，但我怎么等都没等到回音。我向弟弟委婉地打听他的情况，看来他无动于衷，每天晚上还是到处喝酒，净写一些违背道德的作品，越发受到社会上正人君子的憎恨和轻视。据说他还劝直治经营出版事业，直治也颇感兴趣，除了他又请两三个小说家做顾问，也有人愿意为直治提供资金。从弟弟的话听来，在我爱上的人周围一点也闻不到我的气息，我与其说因而感到羞耻，不如说觉得这个世界同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却像是另一种奇怪的生物，而我像是黄昏时被孤独地遗弃在秋天的旷野里，怎么呼喊都没有用，一种从未尝到过的凄怆感觉不由得涌上心头。这是否就是失恋呢？除了这样彷徨在旷野里等天黑之后在夜露中冻死，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吗？想到这里我更是心潮起伏，一阵阵没有眼泪的恸哭使两个肩膀抖动，气都喘不过来了。

事到如今，我只有想尽一切办法上东京去同上原先生会见。因为我已经扬帆出港，怎么还能停滞不前呢，不能不走到底了。当我悄悄地拿定主意要上东京去时，母亲的健康突然起了变化。

母亲整夜咳嗽得很厉害，一量体温，竟有 39℃。

“今天大概受凉啦，明天会好的，”母亲一边不停咳嗽，一边小声地说。

可是我总觉得这不像是一般的咳嗽，决定明天无论如何要请坡下村子里的医生来。

第二天早晨，母亲的热度降到37℃，咳嗽也少了，可我还是去找村子里的医生，告诉他我母亲近来突然虚弱，昨夜起又发烧，咳嗽也不像是一般的伤风咳嗽，请他前来出诊。

医生说过一会就来。接着他从客厅一角的橱里取了三个梨子给我，说是别人送的。中午稍过，医生穿着白地蓝花纹的布衫，套着夏季穿的单上衣来了。他照例又是听诊又是叩诊，花了很长时间仔细诊察，然后回转身来对我说：

“毋庸忧虑，服药便可康复。”

我不知怎的觉得很可笑，就忍住笑问医生：

“要不要打针？”

“大概无此必要。因为是上感，只需静养当可痊愈，”医生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然而母亲的热度过了一个星期也没有退。咳嗽是好了，但早上总有37.7℃左右，一到傍晚就升到39℃。第二天起，医生据说是拉肚子在休息，我去拿药时请护士转告他我母亲的病状不太好，可是医生却说这是一般的伤风感冒，用不着担心，只给了我药水和药粉。

直治照旧前往东京，已经十来天没有回家了。我一个人很担心，于是写了一张明信片给和田舅舅，把母亲的病情变化告诉他。

母亲发热后大约十天，村里的医生说他身体好了，又来给母亲诊察。

医生脸上露着认真仔细的表情，一面叩诊母亲胸部一面叫起来：“清楚啦，清楚啦。”然后他又转过身来对我说：“发烧原因现已查明。左肺有浸润。但不必担心。热度可能还会持续一个时期，但只要静养，就无需忧虑。”

是这样吗？我心里还有点怀疑，可也有一种溺水者攀草求生的心情，因此对村里医生这一诊断也就略微放了心。

医生走后，我说：

“妈妈，这可好啦。稍微一点点浸润，一般的人也有。只要精神上坚强些，很快便会好的。都怪今年夏天气候反常。我不喜欢夏天，我也不喜欢夏季的花。”

母亲闭起眼睛笑着说：

“听说喜欢夏季花的人会在夏天里死，我原以为自己也会在今年夏天死去，但是直治回来了，我也终于活到了秋天。”

我一想到，连直治那样一个人也能成为母亲活下去的支柱，心里便感到无比难受。

“那么，夏天已经过去，妈妈病情的危险期也已经过去了，对不？妈妈，庭院里的胡枝子都开花啦。还有败酱草、地榆、桔梗、苓草和狗尾草，庭园里完全是一片秋天景色了。到了十月，您的热度也准会退的。”

我这么祈求着。九月里闷热的所谓残暑季节尽早过去就好了。一到菊花盛开，每天都是晴朗的小阳春天气，母亲的热度就一定会退下来，恢复健康，我也就可以同那个人相见，说不定我的计划还能够像大朵的菊花盛开一样顺利地实现呢。啊，十月快点到吧，母亲的热度快点退下来就好了。

给和田舅舅寄去明信片后大约一星期，舅舅请来给母亲看病、做过皇家主治医生的三宅老医生带着护士从东京来了。

这位老先生同已故的父亲也有交往，所以母亲非常高兴。再说老先生一向不大拘礼，说话随便，这也叫母亲喜欢。那天他把诊察什么的扔在一边，两人净是兴高采烈而又融洽地聊天。我就在厨房做布丁。当我把布丁端到房间去时，老先生好像已经诊察过了，只见他像戴项链似的把听诊器随随便便挂在脖子上，坐在走廊的藤椅上继续同我母亲悠闲地聊天。

"连我都站在摊子旁边吃面条啦。还有什么好吃不好吃的?"

母亲若无其事地在听他说话。没有什么事啦，我一下子感到放心。

"情况怎么样?这村里的医生说胸左边有浸润呢?"我突然精神焕发地问三宅先生。老先生却满不在乎地轻声回答说:

"没什么，不要紧的。"

"嘿，这可好啦，妈妈，"我流露出衷心的微笑向母亲喊道。"老先生说是不要紧的。"

这时候三宅先生忽然从藤椅上站起来，往中国式房间走去。我看他仿佛有什么事要找我，于是悄悄地跟在他后面。

老先生走到中国式房间的壁毯底下，停住脚步说:

"听到了呼噜呼噜的声音。"

"不是浸润?"

"不是。"

"是支气管炎吗?"我嘴里问，眼泪已经夺眶而出了。

"不是。"

结核!我不愿意想是结核。要是肺炎、浸润或支气管炎，我一定尽力给母亲治好病。然而要是结核，啊，那恐怕是不行了。我感到脚底下好像裂开一样，站都站不稳了。

"呼吸音很不好吗?听见了呼噜呼噜响?"

我由于不安，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右肺、左肺，全都是。"

"可是妈妈精神还好。吃饭时也说好吃好吃……"

"没法子啊。"

"这不是真话。没这回事吧?多吃些奶油、鸡蛋和牛奶就会好的，对不?只要身体有了抵抗力，热度也就能退的吧?"

"嗯，什么都得多吃点儿。"

"是吗?是这样吧?西红柿也每天吃五只左右呢。"

“嗯，吃西红柿好。”

“那么，不要紧吧？就会好的，是不？”

“不过，这次的病或许会致命。你们要有这个思想准备才好。”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到，这世界上好像有一堵令人感到绝望的墙，那就是：有许多事情是人力所无法挽回的。

“两年？三年？”我浑身颤抖着小声地问道。

“不知道。总之，已经是无法挽救啦。”

三宅先生说他在伊豆的长冈温泉预约了旅馆，当天就同护士一起走了。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外，然后拔腿奔回屋子，坐在母亲的枕边，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她笑了笑。母亲问我说：

“先生是怎么说的？”

“他说只要热度退了就没问题啦。”

“胸部呢？”

“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瞧，准是像那次您生病时一样。等天气凉快了，您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我想相信自己的谎言。我希望忘记什么致命不致命的这种可怕的话。一想到母亲她将去世，就好像自己的肉体也会随着消失，这对我来说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事。今后我要忘掉一切，专心为妈妈多弄一些好吃的东西：鱼肉汤、罐头、肝、肉汁、西红柿、鸡蛋、牛奶、清汤——啊，倘若有豆腐就好啦，可以做豆腐酱汤。还有白米饭、年糕等等。我把所有的东西卖掉，凡是好吃的东西都给母亲吃。

我站起身到中国式房间去。我把那里的长沙发移到母亲房间的檐下廊子附近来，然后坐在那里凝眸望着妈妈的脸。妈妈睡时的面容一点也不像病人。眼睛又美丽又清澈，脸色也生气勃勃。她每天早晨都按时起床，去盥洗室，然后在浴室的三铺席房间里自己梳头，整整齐齐地打扮好之后才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来。接着她坐在床上吃饭，饭后有时躺在床上，有时起来。整个上午她都在看报或者读书，只是到了下午就发热。

“啊，妈妈没有病。一定没问题的，”我在心中坚决地否定了三宅先生的诊断。

一到十月菊花开的时候就……我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打起瞌睡来了。啊，又走到这儿来啦，我走到森林中的湖畔时这么想。现实中一次也没看到过的风景，因为在梦中时常见到，就觉得非常熟悉了。我和一个穿和服的青年一起走着，两人都没有脚步声。整个景色仿佛笼罩着一片绿色的雾。湖底沉没着一座雪白而别致的桥。

“啊，桥沉下去了，今天什么地方也不能去了。咱们就在这饭店住吧。我想应该有空房间的。”

湖滨有一幢石筑的饭店。饭店的石头蒙上了绿色的迷雾，全是湿漉漉的。石门上刻有一排纤细的金色文字：HOTEL SWITZERLAND[①]。当我读到 SWI……的时候突然想起了母亲的事。妈妈将会怎么样呢？我感到疑惑，妈妈也会到这饭店里来吗？我和青年一起钻进石门来到前院。雾气迷漫的庭园里盛开着八仙花那样的大红花。小时候我在被面上看到印染着的许多鲜红八仙花，不知怎的会感到分外悲愁，而现在我相信，原来真有火红色的八仙花。

“不冷吗？”

“嗯，有一点。耳朵被雾气弄湿了，耳朵后面觉得冷。”我笑着又问道：“妈妈会怎样呢？”

青年露出异常悲伤而又非常慈爱的微笑回答说：

“她在坟墓里了。”

“啊，”我小声尖叫起来。对啦。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了。母亲的殡仪不是早已举行过了吗？啊，妈妈已经去世了，我意识到这点便感到不可名状的寂寞，浑身发抖，于是醒过来了。

往阳台一看，已经是黄昏了。正在下雨。周围的一切正如梦境那样笼罩着一片绿色的寂寞气氛。

---

① 英文，意为瑞士饭店。

“妈妈，”我喊了一声。

“你在干什么？”妈妈轻轻地反问我。

我高兴得跳起来，立即走进屋子，对她说：

“刚才我睡着了。”

“是吗，我还以为你在干什么呢。睡得好长啊，”母亲说着，觉得有趣似的笑起来。

母亲这样优雅地呼吸着，活着，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多么叫人高兴啊，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

“晚饭烧什么菜？您想吃什么？”我有点嬉皮笑脸地问道。

“行啦，什么都不要。今天体温升到39.5℃了。”

我一下子像被压扁了，完全垂头丧气。我不知所措，呆呆地环视着发暗的屋子，忽然我真想死去。

“39.5℃？这是怎么回事啊？”

“没什么关系。只是发热之前真叫人难受。头有点疼，接着浑身发冷，然后就发烧啦。”

夜幕已经降临，雨虽然停了，却刮起风来。当我开了电灯想去餐厅时，母亲却说：

“有点儿晃眼，不要开灯吧。”

“您一动不动地躺在这么暗的地方，不觉得难受吗？”我站着问了一声。

“我闭着眼睛躺着，还不一样吗？而且一点也不会觉得寂寞，晃眼反而不舒服。今后这个房间就一直别开灯吧，”母亲回答说。

我感到这也是不祥之兆，不声不响地将屋子的灯关掉，就到隔壁房间去开了台灯，不由得感到一阵难以忍受的凄凉，赶快跑到餐厅，把罐头鲑鱼放在冷饭上吃起来，眼泪簌簌地落下来了。

到了夜里，风越刮越大，九点左右起风雨交加，成了地地道道的暴风雨。只听见檐下廊子两三天前卷起来的竹帘子咕咚咕咚地碰撞着。我怀着一种奇妙的兴奋心情在母亲隔壁的房间里读着罗萨·卢森

堡[1]的《经济学入门》。这是我上次从二楼直治房间里拿来的，那时候我还擅自把《列宁选集》和考茨基[2]的《社会革命》等书也一起拿来了，放在我房里的桌子上。早晨母亲洗脸回来走过我的桌子旁，无意中发现那三本书，就一本一本拿起来看，接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悄悄地把书放在桌上，脸上露出一种凄凉的神态，朝我瞅了一眼。她的眼神虽然充满深深的悲哀，但绝没有表示反对或者嫌恶。母亲读的是雨果、仲马父子、缪塞和都德[3]等人的作品，然而我知道，即使是这种美丽故事书里也蕴藏着革命的气味。像母亲那样具有天生教养——这种词句不一定对——的人，也许是不会出乎意外而理所当然地迎接革命的。我这样读着罗萨·卢森堡的书，也不是没有一点儿装模作样，可我还是感到有浓厚兴趣。这里边写的是经济学，可作为经济学来读就太没意思了。实际上都是些简单而又明摆着的事情。不，或许我根本就无法理解经济学这个玩意儿。总之，我对它毫无兴趣。人都是吝啬的，而且永远是吝啬的，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学说就完全不能成立，对于并不吝啬的人来说，无论是分配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都是毫无兴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读这本书，并在其他方面感到一种奇妙的兴奋。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有一种不瞻前顾后的勇气，毫不犹豫地对旧思想进行破坏。我眼前甚至浮现出一个已婚女子不顾违背道德，满不在乎而迅速地奔到她所爱的人那里去的情景。破坏思想。破坏会使人感到悲哀和伤心，但却是一种美丽的东西。这是一种通过破坏、重建而达到完成的幻想。然而破坏之后，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可正因为是爱，所以不能不进行破坏。不能不进行革命。罗萨一心一意可悲地热爱着马克思主义。

---

① 罗萨·卢森堡（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领袖之一，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与李卜克内西一起被杀害。

②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③ 雨果（1802—1885）、大仲马（1802—1870）、小仲马（1824—1895）、缪塞（1810—1857）、都德（1840—1897），都是法国作家。

那是十二年前一个冬天的事情。

“你是《更级日记》[1]里那个少女呢。对你说什么也已经没有用了。”

有个朋友这么说，从此便不同我来往了。那时我把列宁的书看都没看就还给了她。

“读过吗?”

“很抱歉，我没看哪。”

我们正站在可以看到尼古拉教堂的桥上。

“怎么? 为什么不看?”

那位朋友身材比我还高一寸，外语学得非常好，一顶红色的贝雷帽对她正合适，一致公认她的脸像蒙娜丽莎，是个美丽的姑娘。

“我不喜欢封面的颜色。”

“你真怪。恐怕不是这个原因吧? 其实是对我感到害怕了吧?”

“怕你什么呀。那封面的颜色我可受不了。”

“是吗?”

她有点悲哀地说，接着就说我是《更级日记》里的少女，断言她对我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们一时间默默地俯视着冬天的河流。

“祝你健康。如果这是永远的离别，那就祝你永远健康。拜伦[2]。”

她又用原文很快地朗诵了这句拜伦的诗，然后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

我难为情地小声道歉说：“对不起你啦。”然后我向御茶水车站走去。回头一看，那位朋友依旧站在桥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

从此我没见过她。我们俩虽上同一个外国教师家学习，却不是同一个学校的。

---

①《更级日记》是日本古典作品，菅原孝标的女儿写的日记，内记作者从十三岁（1020年）离开父亲的任地去京城到1059年丈夫病死为止的往事。这一句意指和子的思想太老，有如《更级日记》里的少女。

② 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

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可我还是没有从《更级日记》再前进一步。哎呀，在这期间，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我没有憧憬过革命，而且连恋爱都不懂。一直到现在，世上的大人都教导我们说，革命和恋爱是最愚蠢最可恶的东西。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我们也都那样想，可是战败以后，我们不再信赖那些大人了，觉得一切只有同那些人所说的相反才有真正的活路；我们还认识到革命和恋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正由于太好了，大人们才不怀好意地欺骗我们，说它们是不可以吃的青葡萄哩。我想确信：人是为了恋爱和革命而生的。

槅扇轻轻地打开，母亲面带笑容走进来，说：

“还没睡呀！你不想睡吗？”

我一看桌上的钟，已经十二点了。

“嗯，我一点也不想睡。读着社会主义的书便兴奋起来啦。”

“是吗，有酒没有？这种时候喝点酒睡觉，就能睡得好了。”

母亲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可她那样子有些颓废，并近乎妖艳。

一眨眼已经到了十月，然而天气并没有变得秋高气爽，连续几天都像梅雨季节一样，既潮湿又闷热。每到傍晚时分，母亲的体温依然是38℃到39℃左右。

一天早晨我看到一种可怕情形。母亲的手肿了。母亲过去总是说早饭最好吃，近来她却坐在床上只吃一小碗粥，香味稍重点的菜就不吃了。那天我端给她一碗松蕈清汤，她连松蕈的香味都感到讨厌，把碗端到嘴边又轻轻放回食桌上。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母亲的手，不禁大吃一惊。她的右手肿得胀鼓鼓的。

“妈妈！手，不要紧吗？”

母亲的脸看上去很苍白，也有些虚肿。

“不要紧的。肿这么一点儿不要紧。”

“什么时候肿起来的？”

母亲只是像目眩似的眨了眨眼，没有回答。我真想放声大哭。这

不是我母亲的手。这是别人的手。我母亲的手没有那么粗，那么大。我所熟悉的她的手是一双优美的手，可爱的手。那双手是不是永远消失了呢？她的左手虽然肿得不太厉害，也还是叫人不忍心看，于是将视线移开，瞪眼望着壁龛上的花篮。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终于忍受不住，霍地站起身来向餐厅奔去，只见直治独自在那里吃半生半熟的鸡蛋。他很难得回到伊豆这家里来，即使来了，晚上还是要到阿咲那儿去喝烧酒，早晨总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不吃饭，只吃四五只半生半熟的鸡蛋，然后又回到二楼去，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

“妈妈的手肿得……”我向直治刚开口就低下了头，怎么也说不下去了，不禁哭得气都透不过来。

直治不做声。

我用手抓住桌子的一端，抬起头来说：

“已经不行啦。你没注意到吗？肿得那样厉害就没救啦。”

直治的脸也沉了下来，说：

“看样子快啦。唉，终于发生没有趣儿的事了。”

“我希望把妈妈的病治好。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治好，”我用右手拧着左手说。

直治突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说：

“什么用处也没有啊。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用处也没有吗？”

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乱擦眼睛。

当天，直治为了向和田舅舅报告母亲的病状，并听听他对后事有什么吩咐，便立即上东京去了。不在母亲身旁的时候，我从早到晚几乎整天都在哭。在晨雾中去拿牛奶的时候，坐在镜子前面梳头发涂口红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和母亲一起度过的幸福日子里的种种往事，像一幅幅画在我眼前浮现。我怎么也抑制不住悲哀的眼泪。傍晚天黑了，我独自伫立在中国式房间的阳台上，抽噎了好半天。秋天的夜空闪烁着星星，别人家的一只猫蜷缩在我脚边，一动也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手肿得更厉害了。什么东西都吃不进。连橘子汁她也说因为口腔干裂痛得喝不下去。

“妈妈，您再戴一次直治说的口罩怎么样?”

我本来想笑着说的，可说话时感到一阵心酸，压抑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每天这么忙，你不累吗？给我雇一个护士吧，”母亲平静地说。

我深深体会到母亲关心我的健康胜过关心她自己的身体，这使我感到格外悲伤。我一站起来就向浴室旁的三铺席房间奔去，尽情地大哭。

过了晌午不久，直治陪着兰宅老先生和两个护士回来了。

平素爱开玩笑的老先生这时也露出像在生气的样子，咯噔咯噔走进病室，马上就开始诊察。然后不专对谁；轻轻地说了一声：

“衰弱多啦。”

接着就给我母亲注射樟脑液。

“先生住哪里?”母亲像说梦话似的问道。

“还是去长冈。我已经定好旅馆了，你不必操心。你这位病人呀，可不要为别人操心啦，想吃什么就尽量多吃点吧，只要多增加营养就会好起来的。我明天再来。今天留下一个护士，请你们使唤吧，”老先生对病床上的母亲大声说着，向直治做了个眼色，便站起来。

直治一个人去送先生和陪同的护士。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直治回来，想哭又拼命忍住的样子。

我们俩悄悄地溜出病室，来到餐厅。

“不行了吗？对不?”

“真没趣儿，”直治歪着嘴笑着说，“看来是一下子变得衰弱了。他讲，说不定就在今明两天了。”

直治说着说着，眼泪已经夺眶而出。

“要不要打电报通知熟人呢?”我反而变得非常镇静地说。

“我同舅舅也商量过，他说现在这种时候不是那样容易就能把人

请来。即使人家来了，这么小的房子反倒对人家不礼貌。附近又没有像样的旅馆，在长冈的温泉也不能预定两三个房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穷得无力邀请那些名流了。舅舅说他跟着就会来的，不过这家伙本来就是个吝啬鬼，你想靠他是什么也靠不住的。昨天晚上就是这样，他把妈妈生病的事扔在一边，把我给狠狠地申斥了一顿。受到吝啬鬼的教训而能觉醒过来的人，自古到今从南到北可从来没有过。姐姐和我比，妈妈和那家伙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呢，真叫人讨厌。”

“我倒无所谓，可你今后还得依靠舅舅……”

“绝对不干。我倒不如当个乞丐好。往后姐姐才需要依赖他呢。”

“我……”我情不自禁地又掉了眼泪。“我有地方去。”

“再结婚吗？有对象了？”

“不。”

“独立生活吗？做劳动妇女。算啦！算啦！”

“也不算独立生活。我呀，想做革命家呢。”

“哦？”

直治惊奇地直对着我看。

这时候，三宅先生带来伺候病人的护士来叫我了：

“老太太像有什么事要找您。”

我赶快回到病室，坐在床旁，把脸靠近母亲问道：

“有什么事？”

母亲似乎想说什么又不说。

“想喝水吗？”我又问了一声。

但她还是微微地摇了摇头。看来也不像要喝水。过了一会儿母亲才小声说：

“我做了个梦。”

“是吗？什么梦？”

“梦见蛇。”

我吓了一跳。

“檐下廊子外面放鞋的石板上，有一条红色条纹的女蛇吧？你去看看。”

我不由得不寒而栗，霍地站起身就走到檐下廊子上，透过玻璃窗一看，在放鞋的石板上果然有一条蛇在秋天的阳光照射下伸长身子躺着。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

我可还认识你。看上去你比以前长大了，老一点了，但你就是被我烧掉了蛇蛋的那条女蛇吧？你的报复我已经完全领教了，你就走吧，请你赶快走吧！

我一边心里这么叨念着，一边盯着蛇看，蛇却怎么也不肯动一动。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让护士看见这条蛇。咚！咚！我使劲地踏了踏脚，故意提高嗓门说：

“没有哇，妈妈。梦怎么会是真的呢。”

说罢，我又朝放鞋的石板上瞅了一眼，只见蛇这时候才慢腾腾地蠕动着身子从石头上滑下去。

已经不行啦。已经不行的了，我看到那条蛇之后就开始死心了。父亲去世时也说是有一条黑色小蛇待在他的枕边，那时候我还看见院子里所有的树上盘着蛇。

母亲似乎没有力气从床上坐起来了，总是迷迷糊糊地躺着，完全让护士来照料她，几乎什么都吃不下。自从看到蛇之后，我倒产生了一种类似幸福感的宽心之感，这可以说是一种过于悲伤之后所产生的平静心情，事到如今，我只想尽可能多地待在母亲身边。

从第二天起，我就紧紧靠在母亲的枕边坐下来打毛线。打毛线和缝衣服我比别人都快，但手艺很差。因此母亲总是手把着手地教我。那天我虽然并不想打毛线，但为了装做很自然地紧靠着母亲身旁坐，便从毛线箱里取出毛线，很专心似的打起来。

母亲一直注视着我手的动作，说：

“是打你的袜子吧？那还得加八针才行，否则穿起来会紧的。”

小时候母亲怎么教我我都打不好，现在也跟那时候一样，我发慌

了，同时觉得又难为情又分外亲近。啊，母亲今后不可能再这样教我了，我想到这一点便不禁热泪盈眶，连毛线的针眼都看不清了。

母亲这样躺着，好像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从早晨起她什么都没吃，我只是用纱布浸一浸茶水，给她润一润嘴。但她意识还是很清楚，不时平静地跟我说话。

“报上好像有陛下的照片，让我再看一次吧。”

我把报上的照片递到母亲眼前给她看。

“陛下老了。”

“不，是照片拍得不好。上次那张照片又年轻又活跃。他大概反而喜欢这种时代吧。”

“为什么？”

“因为陛下也是这次获得解放的嘛。”

母亲凄凉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她说：

“我想哭，但眼泪已经枯竭啦。”

我突然想，母亲现在或许是幸福吧？所谓幸福感，难道不是像沉没在悲哀的河流底下微微闪耀着的沙金一样的东西吗？经历过无限悲哀之后，看到一丝朦胧的光明这种奇妙的心情，如果这就是幸福感的话，那么陛下、母亲和我，现在确实是幸福的。静谧的秋天午前。明朗的阳光照耀下的秋天庭院。我把毛线活停下，眺望着波光粼粼的齐胸的大海，对母亲说：

“妈妈，以前我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啊。”

接下来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但又怕被正在房间角落准备静脉注射的护士听见了难为情，就不说了。

“你说是以前……”母亲微笑着责问，“那么你现在见过世面啦？”

不知怎么的，我脸都涨得通红了。

“人世间可不好懂啊，”母亲把脸转向一旁，小声嘟囔说，“我就不懂。懂的人也不见得有吧？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大家都还是小孩

子，依然是什么都不懂。”

然而我不能不活下去。或许仍旧像个小孩，可也到了不能老是撒娇的时候了。往后我得同人世间争斗下去。啊，像母亲那样与世无争、既不憎恨又不埋怨地度过又美丽又悲哀的一生的人，恐怕母亲是最后一个了，今后的世界里大概不会再有了吧？将要死的人是美丽的。要活下去，要生存下来，这仿佛是一桩非常丑恶而又充满血腥味的肮脏事。我在铺席上想象着一条怀孕的蛇在掘洞。可我还是不能死心。无耻又有什么关系，我要生存下去，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我要同人世间争斗下去。到了母亲无疑要去世的时候，我的浪漫主义和伤感便逐渐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变成一种十足狡猾的生物。

那天正午过后，我正在母亲身旁给她润湿嘴唇的时候，门口传来停车的声音。和田舅舅和舅妈一起坐小汽车从东京赶来了。舅舅走进病室，在母亲枕边默默地坐下，母亲用手帕将自己的下半个脸遮住，凝视着舅舅哭了起来。然而那只是一张悲痛欲绝的脸，没有泪水，使人觉得她像个木偶。

“直治在哪儿?”母亲问我。

我走上二楼，只见直治躺在西式房间的沙发上看新杂志，就对他说：

“妈妈在叫你。”

“哎呀，又是哀伤的场面。你们可真有能耐一直待在那儿。不是神经太粗，就是薄情吧。如我这种人则无法忍受了，内心纵然很热，无奈肉体难挨，无论如何也不忍侍奉在妈妈身旁，”直治嘴里这么说，可还是穿上上衣，跟我一起从二楼下来。

我们两人在母亲枕边并排坐下，母亲突然从被窝里伸出手来，默默地指指直治，又指指我，然后把脸转向舅舅，两个手掌紧紧地合着。

舅舅深深地点了点头说：

“啊，知道啦。知道啦。”

母亲仿佛放了心，轻轻地闭起眼睛，把手慢慢放进了被窝。

我哭了，直治也低着头呜咽起来。

这时三宅老先生从长冈来了，他急忙给母亲打了一针。母亲见到舅舅，好像已经无所留恋似的说：

“先生，请让我早点安息吧。”

老先生和舅舅面面相觑，沉默无言，两人的眼睛都闪着泪花。

我站起来，去餐厅做舅舅喜欢吃的加葱丝和油豆腐的清汤面，给老先生、直治和舅妈也各盛了一碗，送到中国式房间去，然后把舅舅送来的丸内饭店的火腿面包拿给母亲看，放在母亲枕边。

“很忙吧？”母亲小声问我。

他们在中国式房间闲谈了一会儿，舅舅和舅妈说有事情，今天晚上无论如何得回东京去，就把慰问的钱包亲手交给了我。三宅先生也要和护士一起回去，他对伺候病人的护士吩咐了种种应急治疗方法之后说，意识还很清楚，心脏也没那么衰竭，只要打针，大概还能维持四五天。于是他们当天都坐汽车回东京去了。

把大家送走后，我回到房间里来。母亲又露出只对我笑时才有的亲密表情笑着，像说私房话似的小声说：

“忙坏了吧？”

说她脸上生气勃勃，莫如说是喜气洋洋。我想她是见到舅舅感到高兴了吧。

“不，不忙。”

我心里也喜不自禁，微微一笑。

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和母亲的最后一次谈话。

大约过了三小时母亲便逝世了。在秋天幽静的黄昏里，美丽的母亲，日本最后一位贵妇人，由护士摸着脉，在直治和我这两个仅有的骨肉的守护下与世长辞了。

母亲死时的面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父亲逝世时脸色刷地变了，但母亲的脸色一点都没变，只是停止了呼吸。连什么时候停止呼吸都

不知道。脸上的浮肿从前一天起就开始消退，两颊像蜡一样光光的，薄薄的嘴唇略微歪着，看上去好像在微微笑着，显得比母亲活着时更加娇媚艳丽。我觉得她很像 pietà[①]中的圣母玛利亚。

① pietà，意大利语，指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基督尸体的美术作品。

六

战斗开始啦。

也不能老是沉浸在悲哀之中。有件事我无论如何要争到手。新的伦理吗，不，这样说也是一种伪善，应该说是爱。只是爱。就像罗萨没有新的经济学便活不下去一样，我现在没有爱就无法活下去。耶稣为了揭发当时宗教家、道德家、学者和权势者的伪善，为了把上帝真正的爱毫不踌躇地如实告诉世人，将他的十二个弟子派到各地去，那时候他教导弟子们的话，对于现在的我似乎也不是毫无关系的。

“……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

“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

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到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到生命。”①

战斗开始啦。

如果我起誓，为了恋爱我一定完全遵守耶稣的这一教导，耶稣会不会责备我呢？我真不明白，为什么说“爱”是好的，“恋”是不好的。我总觉得两者一样。为了弄不明白的爱和恋，为了由此造成的悲哀而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人，啊，我敢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依靠舅舅他们的照料，没有通知别的亲友，就在伊豆把母亲安葬了，再在东京举行了正式葬礼之后，我和直治又回到伊豆山庄里过着说不出道理的不愉快生活，彼此见了面也不说话。直治说出版需要资金，将母亲的宝石之类全部拿去，在东京喝得不想喝了，就活像个重病人似的，脸色苍白、步履蹒跚地回到伊豆山庄来睡觉。有一次他带了一个舞女模样的年轻女人来，直治到底有点不好意思。我趁此机会说：

“今天我可以上东京去吗？我想到好久没见面的朋友那儿去玩玩，打算住两三个晚上，请你看家吧。烧饭就请那位帮忙得啦。”

这就是灵巧像蛇。我说罢把化妆品和面包什么的塞进手提包，终于能够很自然地上东京去同他见面了。

乘国营电车在东京郊外荻洼车站的北口下车，再走二十分钟左右便到那个人在大战后的新住址。这地址是我不露痕迹地向直治打听到的。

那天刮着凛冽的刺骨寒风。当我在荻洼车站下车时，天已经快黑

---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

了。我不时向过路人问路，在暗下来的郊外小巷转了将近一个小时，心里非常不安，不由得落下泪来，不知不觉在碎石路的石头上绊了一下，啪嗒一声，木屐带子断了。我一时不知所措，僵在那里，无意间朝右手的两家连檐屋看去，在夜色中还能认出其中一家的牌名泛着白，上面写的仿佛是上原。我于是不顾一只脚只穿着布袜子，立即向那家门口奔去，把牌名再仔细地看了看，果真写着“上原二郎”几个字，屋子里却是黑洞洞的。

怎么办？刹那间我又呆住了，可我还是怀着投河自杀的心情，身子像倒在格子门上似的紧紧靠着它说：

“请问里边有人吗？”

我用双手的指尖抚摸着格子门，轻轻地喊了一声：

“上原先生！”

有人答话了。可那是女人的声音。

大门从里面打开，一个老派的长脸女人，看上去比我大三四岁，出现在黑洞洞的门口，微微一笑，问道：

“您是哪一位？”

那问话听不出有什么恶意或警惕的口气。

“不，噢……”我终于错过了报姓名的机会。不知怎的，唯独在这个人面前，我的爱情总叫我感到内疚。我显得战战兢兢，近乎卑屈地说：“先生呢？他不在家吗？”

“嗯，”她答了一声，仿佛过意不去似的望着我说，“他总是去……”

“很远吗？”

“不，”她像是觉得可笑，用一只手捂住嘴说，“就在荻洼。您只要找到车站前一家叫白石的馆子，卖素什锦的，我想总能问到他上哪里去了。”

“噢，是吗？”我高兴得几乎跳起来。

“哎呀，您的木屐……”

我接受了她的邀请，进门坐在进内室的木板台阶上，先生夫人给我一根皮的带子——大概称为“简便木屐带”吧，木屐带断了能用它简单地修理，——我用它修起木屐来。这时候夫人为我点了一支蜡烛，送到房门口来，她好像满不在乎地笑着说：

“真不凑巧，两个电灯泡都断了丝。近来的灯泡实在不顶用，又贵又容易坏。要是我家主人在家，就可以去买了。可是昨天前天两个晚上他都没回来，今天已经是第三个晚上。因为没钱，就只好早睡。”

夫人背后站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身材苗条，一双大眼睛，但看样子不容易亲近。

敌人，我虽然并不这样看，但是这位夫人和这个孩子总有一天会把我看做敌人，肯定会恨我。一想到这点，我的热恋好像也一下子冷了。我系好木屐带站起来，拍掉双手上的灰尘。这时我猛然觉得一阵苦闷，简直无法忍受，只想奔进内室，在一片漆黑中紧紧抓住夫人的手痛哭一场。我犹豫了一阵，随即想到自己没法下场时那种扫兴而乏味的情景，于是改变主意，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说了声：“谢谢您啦。”就出来了。寒风迎面刮来，我边走边想：战斗已经开始：恋爱，喜欢，想念；真正地恋爱，真正地喜欢，真正地想念；恋爱，有什么办法呢，喜欢，有什么办法呢，想念，有什么办法呢。那位夫人确实是个少有的好人，那位小姐也很漂亮，然而我即使站在天主的审判台前也问心无愧。人是为了爱和革命而生下来的，天主没有理由惩罚他。我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真正喜欢嘛，所以完全可以大摇大摆的。为了同那个人见一面，即使露宿两夜三夜我也一定要……

车站前那家白石素什锦铺很快就找到了。然而他不在那儿。

“准是到阿佐谷去了。从阿佐谷车站的北口笔直走一町[①]半左右的路吧，有一家五金店。从那儿向右拐弯再走半町路，有一家叫柳屋的小菜馆，先生近来同柳屋的阿舍姑娘可亲热了，一天到晚都泡在那

① 町，距离单位，约合109米。

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去车站买了车票，乘上去东京的国营电车，在阿佐谷下来，从北口约走一町半，从五金店向右拐弯又走半町，就到了柳屋，里面静悄悄的。

“他们刚走，人很多，听他们说，还要到西荻的千鸟大婶那儿去通宵喝酒呢。”

这个女人比我年轻，很沉着，又文雅，又亲切，她就是跟他亲热得不得了的阿舍姑娘吗？

“千鸟？在西荻的哪儿？”

我有点泄气和不安，眼泪都快掉下来，忽然怀疑自己这会儿是不是疯了。

“我也不很清楚，听说是在西荻车站下车，从南口向左拐弯进去。总之，问一下派出所就能知道吧？反正他只喝一家是不会满足的，说不定到千鸟之前，又耽搁在什么地方了。”

“我到千鸟去看看，再见。”

我又往回走。从阿佐谷坐上去立川的国营电车，经过荻洼，在西荻洼南口下车，在寒风中打转转，找到派出所问了千鸟的方向，然后跑了一段夜路。一发现千鸟的绿色灯笼，我就毫不犹豫地把格子门推开了。

紧挨着土间[1]是一个六铺席大小的房间，屋子里烟雾腾腾，有十来个人围着一张摆着酒菜的大桌子哇啦哇啦地喧嚷着，里面夹着三个比我年轻的小姐，有的抽烟，有的喝酒。

我在土间扫了一眼寻找他。好像做梦，隔了六年，他已经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了。

难道他就是我的彩虹，M·C，为了他我才感到活着有意义的那个心上人吗？六年了。头发跟从前一样乱蓬蓬，但稀少了，红红的，多么可怜啊。面孔浮肿，脸色发黄。眼眶又充血，又糜烂。门牙掉了，

---

① 土间是日本式房屋内没有铺地板的房间。

像闭上嘴嚼东西似的不停地动着嘴。他看上去活像一只老猿猴驼着背坐在屋子角落里。

一位小姐发现了我，递眼神告诉上原先生我来了。他仍旧坐在那里，伸着细长的脖子看我，脸上毫无表情，只是用下巴示意叫我过去。在座的人对我丝毫不感兴趣，继续大声吵嚷，可也一点一点地挤出一个位置来，让我坐在上原先生的右边。

我默默地坐下来。上原先生往我的玻璃杯里斟满酒，又往自己的杯里添了酒，然后用嘶哑的嗓子低声说：

“干杯!”

两只酒杯轻轻地碰了碰，发出悲哀的咔嚓一声。

“咯罗嗦，咯罗嗦，咻噜咻噜咻!”有人这样喊道。另一个人应和着说：“咯罗嗦，咯罗嗦，咻噜咻噜咻!”然后两人叮一声使劲地碰了碰杯，各自咕嘟一口喝干了。“咯罗嗦，咯罗嗦，咻噜咻噜咻!”“咯罗嗦，咯罗嗦，咻噜咻噜咻!”此起彼伏地唱起了那种荒唐无稽的歌，相互不停地碰杯喝酒。他们像是用这种戏谑的节奏制造气氛，硬把酒灌到喉咙里去。

“那么我先走了，”一会儿有人这么说着，晃晃荡荡地回去了。一会儿又有新的客人慢腾腾地走进来，只向上原先生轻轻地点点头，就挤进那一伙中间去了。

“上原先生，那个地方，上原先生，那个‘啊啊啊’的地方该怎么念？是‘啊，啊，啊’呢，还是‘啊啊，啊’?”

那个探出身子问上原的人，我看过他的戏，是话剧演员藤田。

“应该是‘啊啊，啊’。比方说：‘啊啊，啊，千鸟的酒可不便宜呀!”上原先生回答说。

“净是讲钱，”一个小姐说。

“所谓‘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么’[①]，这算贵还是便宜呢?”

---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十章。

一个年轻绅士问道。

"还有'倘若不一厘钱都偿清的话'这类词句，又有很复杂的比喻，说什么'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二千，一个给了一千'[1]，看来耶稣也挺会算账啊，"另一个绅士说。

"而且那家伙还是个酒徒哩。我感到奇怪，《圣经》里居然有那么多关于酒的比喻。你看，《圣经》中不也记载着，他曾经被责难为'嗜酒的人'吗？请注意，不是说'饮酒的人'，而是说'嗜酒的人'，由此看来，他肯定是个喝酒的好手。至少是喝一大升酒的人，"又一个绅士说。

"算了，算了，别说啦。啊啊，啊，尔等畏惧道德，便借耶稣当挡箭牌。知惠小姐！我们来一杯吧，咯罗嗦，咯罗嗦，咻噜咻噜咻！"

上原先生说罢，便同一个最年轻最漂亮的小姐叮一声使劲碰了碰杯，咕嘟一口喝干了。酒从嘴角滴落下来，下巴弄得湿漉漉的。他像发脾气似的用手掌乱擦嘴，接着连续打了五六个大喷嚏。

我悄悄站起来到隔壁房间，问面黄肌瘦像是有病的老板娘厕所在哪里。回来又经过那房间时，刚才那个最漂亮最年轻的知惠小姐站在那儿，仿佛在等我，亲热地笑着问：

"您不饿吗？"

"嗯，不过我带着面包来了。"

"虽说没什么东西，"像是有病的老板娘依旧懒洋洋地靠在长方形火盆旁边斜坐着说，"请您就在这房间里吃吧。陪那种酒鬼喝酒，一晚上什么也不能吃哩。请坐吧，上这儿来！知惠小姐也一起来吧。"

"喂，阿绢，酒没有了，"一位绅士在隔壁房间里叫道。

"来啦，来啦！"

那个叫阿绢的三十左右的女佣，穿一身漂亮的条纹衣裳，答应了一声，用盘子端着十来个长把酒壶从厨房走出来。

---

① 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等一等，”老板娘叫住她，笑着说，“这儿也放两壶吧。”又说：“阿绢，还麻烦你到后街铃屋去叫两碗面，快一点。”

我和知惠小姐并排坐在火盆旁边，在火盆上暖手。

“请用被子吧，天真冷啊。您不喝一点吗？”

老板娘拿起一个长把酒壶往自己的茶杯里斟酒，接着又往其他两只茶碗里斟了酒。

于是我们三个人默默地喝起酒来。

“你们的酒量都不错啊，”老板娘不知为什么悄悄地这么说。

只听见咯嗒咯嗒开前门的声音。“先生，我带来啦！”这是一个青年的声音。“总之，我们那个经理算盘很精，我再三坚持要两万，可他还是只给一万。”

“是支票吗？”上原先生用嘶哑的嗓音问道。

“不，是现款。真抱歉。”

“嗯，没什么，我来写收据。”

这时，其他在座的人仍旧一直在唱“咯罗嗦，咯罗嗦，咻噜咻噜咻”那首干杯歌曲。

“阿直先生呢？”

老板娘认真地问知惠小姐。我吓了一跳。

“不知道。我又不是阿直先生的保镖，”知惠小姐慌得脸颊绯红。

“最近他跟上原先生有什么疙瘩吗？过去他们总是在一起的，”老板娘郑重地说。

“听说他喜欢起跳舞来了。大概是爱上了舞女吧？”

“阿直先生这个人哪，又酗酒又搞女人，真难对付！”

“是上原先生亲自训练出来的。”

“不过阿直先生的品质更恶劣。像他这种没落大少爷……”

“我说，”我微笑着插嘴道，因为我觉得不说出来反而对她们俩不礼貌，“我是直治的姐姐。”

老板娘似乎吃了一惊，重新打量了我一下。知惠小姐却满不在乎

地说：

“您的脸真像。我刚才看到您站在昏暗的土间里，可吓了一跳，还当是阿直先生哩。”

“哦，原来您是……”老板娘改变了口气说。“这么简陋的地方真难为您来。那么您跟上原先生从前就……”

“是的，六年前我们见过面……”我吞吞吐吐地说着，低下头，不由得两眼噙着泪。

“让你们久等啦，”女佣端面来了。

“请趁热吃吧，”老板娘劝道。

“那就不客气了。”

我拿起碗，面条的热气直往脸上冒。我哧溜哧溜地吃得很快。这时我仿佛尝到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凄凉滋味。

“咯罗噤，咯罗噤，咻噜咻噜咻！咯罗噤，咯罗噤，咻噜咻噜咻！”上原先生低声哼着走进我们的房间，在我旁边盘腿坐下，不声不响地把一只大信封递给老板娘。

信封里的东西老板娘看也没看，就把它放到长方形火盆的抽屉里，笑着说：

“只这么点，余下的都赖掉可不行啊。”

“会拿来的。余下的账款明年给你。”

“说得倒好听。”

一万元。一万元不知可以买多少电灯泡呢？有这些钱，我也能舒舒服服地过一年了。

唉，这些人准有什么毛病。不过，说不定也同我恋爱一样，不这么做就活不下去吧？如果说人生在世就得活下去，那么这些人为了活下去而做的事，恐怕也不该加以责备吧。人要活着。人要活着。啊，这简直是叫人难办得要死的大事啊。

“总而言之，”隔壁房间的一个绅士说，“今后要在东京生活，不会厚颜无耻地说‘您好您好’这类奉承话是怎么也混不下去的。今天

向我们要求什么稳重呀、诚实呀之类的美德，这等于是使劲地拉吊死的人的脚一样。稳重？诚实？呸！实在令人作呕！那怎能活呢？假如你不会厚着脸皮说‘您好您好’之类奉承话，剩下的就只有三条路：一条是回去种田，一条是自杀，另一条是由女人养。”

“这三条路都不会走的可怜家伙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另一个绅士说，“就是逼着上原二郎请客，彻夜痛饮！”

咯罗嚓，咯罗嚓，咻噜咻噜咻！咯罗嚓，咯罗嚓，咻噜咻噜咻！

“你没有住的地方吧？”上原先生压低嗓门，像自言自语似的说。

“我？”

我意识到自己心中的毒蛇扬起了镰刀形的脖子。敌意。我产生了一种近似敌意的感情，拘谨地坐着。

“你能同许多人挤在一块儿睡吗？天气可冷哩，”上原先生也不管我生气，嘟囔着说。

“恐怕不行吧？”老板娘插嘴说。“这太委屈她啦！”

上原先生咋了咋舌头说：

“那就别上这种地方来好啦。”

我依然不吭声。他肯定看过我的信。我从他的口气里很快就发现他比谁都爱我。

“实在没办法，只好去请福井先生帮忙了。知惠小姐，请你陪她去好吗？啊，都是女的路上怕有危险。真麻烦啊。大婶，请你把她的木屐放到厨房去吧，我送她去。”

夜深了，外面一片静寂。风小些了，满天星斗闪闪发光。我们并肩走着。

“许多人挤在一起睡也好，怎么都好，我无所谓。”

上原先生只困倦地嗯了一声。

“您是想只跟我两个人待在一起吧，对不？”

我说着笑了出来，上原先生扭歪着嘴，苦笑着说：

“因为这样，所以我不喜欢。”

我深深意识到他非常喜欢我。

“您喝那么多酒。每天晚上都喝？”

“嗯，每天都喝。从早上起就喝。”

“酒的味道好吗？”

“不好！”

不知怎的，我听到上原先生这样说，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工作怎么样？”

“不行。写什么都觉得无聊，心里悲哀得很。生命的黄昏。艺术的黄昏。人类的黄昏。这也叫人感到讨厌呐。”

“郁特里罗[1]呢？”

我几乎无意识地提出了这个名字。

“啊，郁特里罗，他好像还活着哩。酒精的亡魂。是一具死骸呀。那家伙近十年的画俗不可耐，毫无可取。”

“恐怕不仅是郁特里罗吧？其他的名人巨匠也全是……”

“对，都凋零啦。新芽也在萌芽时就凋零了。霜。Frost[2]。好像全世界都降了不合时宜的霜。”

上原先生轻轻地抱着我的肩膀，我的身子就像被上原先生的和服外套的袖子给裹了起来，但我没有拒绝，反而紧紧地挨在他身旁，慢慢地走。

路旁树木的树枝。一片树叶都没有的细长树枝，它们刺向夜空。

“树枝真美呀，”我情不自禁地嘟囔道。

“嗯，鲜花和黑树枝的调和，”他有点惶惑地说。

“不，我喜爱花、叶和芽什么都没有的树枝。尽管没有花，没有叶，可它还活着。不是枯枝。”

“只有自然不会凋零吧？”

---

① 莫里斯·郁特里罗（1883—1955），法国画家，曾是个酒徒。

② 英文，意为“霜”。

他说着又连续打了几个大喷嚏。

“是不是感冒了?”

“不，不，非也。其实这是我的怪癖，酒喝到饱和点便会马上打喷嚏。好像是喝醉不喝醉的晴雨计似的。”

“那么恋爱呢?”

“什么?”

“有对象吗? 差不多已经达到了饱和点的人?”

“咄，别嘲弄我啦。女人全一样，又难弄又麻烦得要命。咯罗噤，咯罗噤，咻噜咻噜咻! 不瞒你说，现在有一个，不，应该说有半个。

“我的信看了吗?”

“看了。”

“旧信呢?”

“我不喜欢贵族。不管怎样总有些令人讨厌的傲慢。你弟弟阿直君作为贵族，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但他也不时会突然露出很难交往的狂妄自大态度。我是个乡下农民的儿子，当我走过这样的小河畔时，我必定会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故乡的小河畔钓鲫鱼或捞鲻鱼的情景，心里便难过得受不了。”

我们正顺着在黑暗中潺潺响着的小河边走。

“然而，你们贵族不但绝不能理解我们的伤感心情，还瞧不起我们。”

“屠格涅夫[①]呢?”

“那个家伙是个贵族，所以我也不喜欢他。”

“可是他的《猎人笔记》却……”

“嗯，那还不错。”

“它也写农村生活的伤感……”

“那就算这家伙是乡下贵族，折中一下，好吗?”

---

① 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

“如今我也是个乡下人。我在种地呢，是个乡下的穷人。”

“到现在你还喜欢我吗？”他用粗暴的口气说。“你想有我的孩子？”

我没有回答。

他的脸像块岩石落下来一样一下子贴近我，把我乱吻。这是充满着性欲的吻。我一边让他吻，一边潸然泪下。其中也有屈辱或悔恨的眼泪，又苦又涩。泪如泉涌，不停地夺眶而出。

两个人又并排往前走去。

“失败啦。我也喜欢上了，”说罢，他呵呵地笑了。

然而我笑不起来。我缩起嘴角，紧皱着眉梢。

没有办法。

要用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这么一种心情。我注意到自己拖着木屐，步子都乱了。

“失策啦，”他又说，“只能走到哪儿算哪儿啦？”

“听着可有点儿刺耳。”

“你这小子！”

上原先生在我肩上打了一拳，又打了个大喷嚏。

福井先生的家到了，看样子他们一家人都睡了。

“电报，电报！福井先生，你的电报！”

上原先生拍着门大声喊叫着。

“是上原吗？”房内传来男人的声音。

“正是。王子和公主来求住一夜啦。天气这么冷，老叫人打喷嚏，眼看好容易私奔出来，都快变成喜剧了。”

大门从里边打开。一个年近六十的秃顶矮老头穿着一身华丽的睡衣，脸上露出奇怪的害羞笑容出来迎接我们。

“请帮个忙，”上原先生打了一声招呼，连斗篷都不脱便径直往屋子里走去。“画室太冷，不行。把二楼借给我吧。你来！”

他牵着我的手穿过廊子，在走廊尽头登上楼梯，走进一间黑咕隆

咚的房间。在房间一角咔嗒一声把开关打开。

"真像酒家的房间。"

"嗯，暴发户的爱好嘛。给他这个不高明的画家太可惜了。他贼运亨通，没有遭什么灾。这不可不利用呀。好啦，睡觉吧，睡吧。"

他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打开壁橱，取出被褥铺上了，然后说：

"你睡在这里。我要回去。明天早上我来接你。厕所一下楼梯右边就是。"

他像从楼梯上滚下去似的，轰轰隆隆地走下楼梯，接着一点声音也没有了。

我熄灯之后，脱下用父亲从国外带回来的料子做的天鹅绒大衣，解开腰带，和衣钻进了被窝。因为疲倦，加上喝了酒，浑身发酸，很快就蒙蒙眬眬地打起盹来了。

那个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睡在我身边……我默默地、拼命地抵抗了大约一小时，忽然觉得他可怜，就不再抗拒了。

"不这样您就不放心吧？"

"唔，也可以这么说。"

"您身体不好，对不？最近吐血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我不久前确实吐了很多血，可对谁也没说过。"

"因为有一股同我母亲去世前一样的气味。"

"我拼命在喝酒。活着使我感到无限悲哀。不是什么苦闷寂寞之类还有余地的东西，而是悲哀。当你听见四周墙上传来阴郁和忧愁的叹息时，哪能只顾自己的幸福呢？当一个人发现活着绝不会有自己的幸福和光荣时，他会怎么想呢？努力。这只会成为饥饿这头野兽的牺牲品。悲惨的人太多啦！听着刺耳吗？"

"不。"

"看来只有爱而已。正如你信上所主张的。"

"是的。"

我的爱消失了。

天亮了。

屋子里微明时，我仔细地凝视着睡在我旁边的他的脸。这是一张似乎垂死的人的脸。一张疲惫不堪的脸。

牺牲者的脸。尊贵的牺牲者。

我的人。我的彩虹。My Child。可憎的人。狡猾的人。

这时候我觉得他的脸美得举世无双，爱仿佛又苏醒了，心激动得扑通扑通地跳。我抚摸着他的头发，情不自禁地吻了他。

这是无限悲伤、极其悲哀的爱之实现。

上原先生闭着眼睛抱着我说：

“都怪我过去对你怀有偏见，我是农民的儿子。”

今后我怎么也不想离开他了。

“我现在真幸福。即使听见四周墙上传来阴郁和忧愁的叹息，我现在的幸福感也已达到了饱和点。简直幸福得都要打喷嚏了。”

上原先生听了呵呵笑着说：

“可是太晚啦。已经是黄昏了。”

“不，是早晨哩。”

我弟弟直治就在这天早晨自杀了。

七

直治的遗书。

姐姐：

我没有指望了，我先走啦。

我丝毫不理解，我为什么必须活下去。

只要想活下去的人活下去就得了。

人有生存的权利，同样也应该有死的权利。

我这种看法一点也不新，这么平常而且应该说是起码的事情，只不过是人们不知为什么不愿意而且害怕直接说出来罢了。

想活下去的人，不管怎么办也应该顽强地活下去，这是了不起的事，其中大概也有所谓人的荣誉吧，但我认为，死也不是什么罪过。

我，我这棵草，在这个世界的空气和阳光中是很难活下去的。要活下去似乎还缺少一样什么东西。能够活到今天，这已经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我进高等学校以后，第一次碰到了与培育我的阶级完全不同的阶级出身的友人，他们是又茁壮又坚强、势不可挡的草。为了不被那气势压倒，我服麻醉药，发疯似的抵抗。后来当了兵，在那儿我仍然使用鸦片作为生存下去的最后手段。姐姐，您大概不会理解我这种心

情吧？

我真想变成一个下流庸俗的人。我想变得坚强，不，我想变得强暴。我以为这是成为民众之友的唯一道路。这仅仅靠酒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它需要始终保持着头晕目眩的状态。为此除服用麻药外别无办法。我必须忘掉家庭，必须反抗父亲的传统，不能不拒绝母亲的爱抚，不能不对姐姐冷淡。否则，我以为我无法得到一张入场券可以进入民众的房间。

我变得下流了。说话也下流了。然而其中一半，不，百分之六十是假装出来的可怜相，是笨拙的花招。在民众看来，我仍然是个高傲而装模作样、古怪而拘谨的人。他们都不愿意推心置腹地跟我交往。可是事到如今，我又不能回到曾经抛弃的沙龙里来。因为我的下流尽管百分之六十是装出来的，其余的百分之四十却是真正的下流。我对上流沙龙那种臭不可闻的所谓文雅和高尚立即会感到恶心和呕吐，一时一刻也无法容忍；而另一方面，那些被人称为高官显贵的大人物对我的不规矩也可能感到十分惊讶，立刻把我驱逐出来吧。我不能回到已抛弃的世界，而民众却只恩赐我一个对我彬彬有礼但充满着恶意的旁听席。

不论哪个时代，像我这种缺乏生活能力并且有缺陷的草，什么狗屁思想也没有，它的命运也许只有自然消灭，但是我也有一些话要说。我感觉到有种情况使我怎么也难以活下去。

人都是一样的。

这究竟算不算思想呢？我以为发明这句奇怪的话的人不是宗教家，也不是哲学家和艺术家。这句话是民众在酒馆里产生的。不知谁先说出，不知什么时候便像蛆一般陆续涌现出来，并传遍了全世界，使世界上的人变得不和了。

这句奇怪的话同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全然没有关系。它一定是酒馆里丑男子骂美男子的话。那不是什么思想，而不过是发急，是嫉妒。

然而酒馆里这种嫉妒的怒骂声却装做带点思想的意味在民众中传播。本来是同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的一句话，不知什么时候却同这种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纠缠在一起而奇怪地造成了恶劣的状况。这种把毫无道理的信口开河偷换为思想的把戏，即便是靡菲斯特[1]恐怕也会感到良心责备而踌躇不肯做吧。

人都是一样的。

这是一句多么卑屈的话呀！这是一句既瞧不起别人也瞧不起自己、毫无自尊心而使人放弃一切努力的话。马克思主义主张劳动者的优越地位。它并不说人都是一样的之类的话。民主主义主张个人的尊严。它并不说人都是一样的之类的话。只有妓馆揽客的才说那样的话：

"嘿嘿，不管怎样装腔作势，人不都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要说是一样的呢？为什么不敢说是优越的呢？就是奴隶根性的报复。

这句话实在既猥琐又可怕，它使人相互感到戒惧，一切思想都遭到亵渎，所有努力都受到嘲笑，幸福被否定，美貌被糟蹋，名誉被玷辱，所谓"世纪之不安"，我认为都是由这一句奇怪的话引起的。

我讨厌这句话，但也受到这句话的威胁，害怕得直打战，不论想干什么事都感到难为情，总是战战兢兢，心扑通扑通地跳，只觉得没有置身之处，于是索性借助于喝酒或吸毒，在眼花缭乱中求得瞬息间的安宁，结果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了。

太懦弱了吧？是一棵有什么严重缺陷的草吧？尽管我列举这些小道理，妓馆揽客的会嘲笑说，你扯什么，你本来就是个喜欢玩乐的人，是个懒人、色鬼，是个只顾自己的享乐主义者。从前我听到这种话，只是不好意思地含含糊糊点点头，可如今在临死的时候，我却想留下一句带点抗议意味的话。

---

① 靡菲斯特，《浮士德》中的魔鬼。

姐姐。

请相信我吧。

我虽然玩乐，但一点也不快乐。这也许是快乐的“阳痿”吧。我不过是一味想摆脱自身的贵族影子才发疯而耽于酒色的。

姐姐。

我们究竟有罪吗？生为贵族，这难道是我们的罪过吗？仅仅由于出生在这个家庭，我们便不得不像犹太的亲属一样永远过着一种谢罪、惶恐而羞愧的生活。

按理我早就该死去。但一想到妈妈的爱，我就不能死了。人有自由活下去的权利，也有随时可以死去的权利，但我认为“母亲”还活着的时候，这死的权利就不能不加以保留。不然它也会同时把“母亲”害死的。

现在我死就不会有人难过得伤身体了，不，姐姐您听我说，我知道你们失去我会悲伤到什么程度。不，咱们丢开虚饰的伤感吧，你们知道我死一定会哭吧，但如果你们为我想想，想到我活着时的痛苦以及我从那讨厌的生命中完全解放出来的喜悦，那么我想，你们的悲伤就会逐渐消失。

对我的自杀大肆责难，说我应该活到底，但又不给我任何帮助，还得意洋洋地在口头上批评我，这样的人准是能满不在乎地劝天皇陛下开水果店的异想天开的大人物。

姐姐。

我还是死了好。我没有生活能力，无力在金钱上与人竞争，连敲竹杠都不会。我和上原先生一起玩的时候，我的账总是自己付的。上原先生认为这有点贵族的傲慢气味，非常不高兴，可我并不是因为傲慢才会钞的，而是怎么也不敢用上原先生工作得来的钱去喝酒，去玩女人。简单地说是因为尊敬上原先生的工作。不过那也是胡扯，实际上我自己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我只是觉得受人请客是非常可怕的。尤其是受到靠他双手所得的钱请客，这会使我更加难过和于心不安。

因此，我只管把家里的钱和东西拿出来，这叫妈妈和你感到伤心，而我自己也并不感到快乐。我之所以计划搞出版事业，完全是为了装饰门面，其实一点也不想认真去做。即使真心想做，对一个根本不敢受人请客的人来说，怎么也不会赚钱的，尽管我很愚蠢，这一点还是清楚的。

姐姐。

我们已经穷了。我本来想活着的时候款待别人，不料不靠别人款待便活不下去。

姐姐。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活下去呢？已经没有希望了。我决定死。我有一种药可以死得不痛苦，是在当兵的时候弄到手的。

姐姐是个漂亮贤惠的人（我一直以有这样漂亮的母亲和姐姐而感到自豪），因此我对姐姐的事并不担心。我甚至连担心的资格都没有，正如盗贼关怀受害者只会叫人觉得脸红。我想，姐姐准会结婚，生孩子，并依靠丈夫活下去吧。

姐姐。

我有一个秘密。

很久以来我一直把它藏在心里。即使在战场上我也一味想她，不时梦见她，醒来之后不知多少次想哭哩。

无论对谁，即使嘴巴烂了我也不敢说出她的名字来。我想到现在要死了，至少向姐姐讲讲清楚吧，可还是害怕得不能说出那个名字。

然而我如果把它作为绝对秘密藏在心里，始终不告诉任何人就死去，那么在我的身子火葬时，内心将会留下一股腥膻的气味，我感到非常不安，因此我准备像虚构那样模模糊糊、转弯抹角地讲给姐姐一个人听。虽说是虚构，姐姐听了一定马上就明白她是谁。因为说是虚构，也不过是用假名[1]把真名掩饰一下罢了。

姐姐不认识她吗？

---

① “假名”指日文字母。

照说姐姐是认识她的，不过大概不曾见过面吧？她比姐姐大几岁，单眼皮，眼梢往上吊，从来不烫头发，总是梳着朴素的发型，大概叫垂髻吧。服装也很寒酸，但不邋遢，不管什么时候都穿得非常整洁。她是战后用新画法一连发表了许多作品而一举成名的某中年西洋画画家的夫人。那位画家非常粗暴放荡，但他的夫人却装得若无其事，总是面带温柔的微笑。

我站起来说：

“恕我告辞啦。”

她也站起来，毫无戒心地走近我身旁，仰脸望着我，用普通的声音问道：

“为什么？”

她像真正不明白似的稍微歪着头凝视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神没有任何邪意，也毫无虚饰。我天生跟女人的视线一相遇就会慌张起来，立即将视线移开，可只有这一回我丝毫不觉得羞怯，两人的脸仅隔一尺左右，我心情愉快地注视着她的眸子，过了六十秒钟也许更长一些，不觉微微一笑，回答说：

“不过……”

“他马上就会回来的，”她依旧认真地说。

我忽地想到，所谓正直恐怕就是指这样一种表情吧。它不是修身教科书中讲的那种冠冕堂皇的品德，而用正直两字所表现的品德，本来不就是这么可爱的东西吗？

“我下次再来。”

“也好。”

自始至终是很平常的谈话。有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到公寓去拜访那位西洋画画家。画家不在，夫人说他马上就回来，建议我上屋里等一会怎么样，于是我走进了房间，翻阅了半小时左右的杂志，看样子还不会回来，便起身告辞了。仅仅是这么回事，然而我却痛苦地爱上了那一天那一个时刻的她那一双眼睛。

高贵，可不可以这样说呢？但是有一点我敢断言，在我周围的贵族当中，除妈妈外，眼睛能那样毫无戒心地现出“正直”表情来的人一个也没有。

后来在冬天一个傍晚，我深深地被她的侧影吸引住了。也是在那个画家的公寓，我从早晨起陪着画家坐在被炉里喝酒，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把日本的所谓文人一个一个骂得一钱不值，然后便捧腹大笑。画家喝醉，一躺下就呼噜呼噜睡着了，我躺下正要迷迷糊糊地睡着时，只觉有人轻轻给我盖毯子。我眯缝着眼睛一看，只见东京的冬天傍晚时分的天空清澈如水，夫人抱着小姐闲坐在窗旁，她那副端庄的侧影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侧面像一般，衬着远方浅蓝色的傍晚天空，轮廓分明地浮现出来。她悄悄地给我盖毯子，这一番好意丝毫不存在情欲，啊，“人性”这个词用在这种时候不是才有真正的意义吗？她像用理所当然的体贴心情几乎无意识地这样做，她那娴静的样子仿佛是画中的人像，默默地眺望着远方。

我闭着眼睛，恋慕得都要发狂了，热泪不觉夺眶而出，赶紧把毛毯一直蒙到头上。

姐姐。

我去那位画家家里玩，起初是被他作品的奇特画法和作品中蕴藏的狂热爱情所迷住。后来熟了，便因他的无教养、荒唐和卑鄙无耻而感到扫兴。相反，我却被画家夫人心灵的美所吸引，不，应该说是我爱慕和想念那位具有正确爱情的人。后来我只是为了希望和她见面才到画家那里去的。

如果说那位画家的作品多少表现了高贵的艺术风味，现在看来，我认为这也许是反映了那位夫人的美好心灵。

现在我要把我对那位画家的看法明确而如实地说出来。他不过是一个酒徒，一个喜欢玩乐的投机商。他只是想弄到玩乐的钱而在画布上乱涂颜料，趁流行时摆出一副了不起的姿态，以高价出售作品罢了。他身上除了具有粗人的厚颜无耻、愚蠢的自信和狡猾的商业才能

以外，并无别的。

依我看，他对别人的画，不论是外国人或日本人的画恐怕都不懂。而且对他自己的画大概也不懂。他只是为了弄到吃喝玩乐的钱而拼命在画布上乱涂乱抹而已。

更使人吃惊的是，他对于自己那种荒唐胡来似乎一点也不觉得羞耻、怀疑和恐怖。

他居然还得意洋洋。总之，这是一个连自己画的东西也不懂的人，哪里能理解别人工作的优点呢，但竟然一味地贬低别人。

也就是说，那个人过着颓废生活，尽管口头上也说怎样怎样痛苦，实际上是一个愚蠢的乡下佬到了憧憬已久的都市，出乎意料地获得成功，于是欢天喜地，一天到晚只顾饮酒作乐了。

我对他说过：

“朋友们都在玩，自己一个人用功也难为情，惶恐得很，因此虽然不想玩，还是跟大伙在一起玩了。”

那个中年画家听了，满不在乎地回答说：

“噢，这就是贵族脾气吧，真讨厌。我一看到人家玩，觉得自己不玩太吃亏，于是也拼命玩了。”

这时我对这位画家从心底里感到轻蔑。与其说他对放荡生活不感到苦恼，不如说他对无聊透顶的玩乐觉得很不错哩。真是个愚蠢的快乐主义者。

把这画家的坏话再一口气讲下去也与姐姐无关。但在我临死的时候回想起跟他的长期交往，也还是感到怀念，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再见他一面，一起玩玩，一点也不觉得他可憎，何况他也是一个具有许多优点而时常感到寂寞的人，所以我不想再说什么了。

我只是有一点想让姐姐知道，就是我非常想念他的夫人，为此难过得徘徊不已。姐姐知道后用不着告诉别人，更没有必要装模作样地多管闲事，即想实现弟弟生前的愿望什么的。姐姐知道以后，只要悄悄地在心里说声“啊，原来如此”就行了。如果说我有什么奢望的

话，那就是听了我这没脸见人的坦白后，哪怕只有姐姐一个人能更深地了解我生命中至今的痛苦，我就很高兴了。

我曾经梦见我和夫人握手，并且发现夫人也很早就喜欢我了，所以醒来觉得手心上还留有夫人手指的热气。我认为自己应该以此为满足，不能不死心了。我并不是害怕道德，而是对那个半疯子，不，对那个几乎全疯的画家怕得不得了。我想死掉心，想把心中的热火转向别处去。于是有一天晚上，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女人就跟她们玩，连那位画家看了都不能不紧皱眉头。我总得想个办法从夫人的幻影中摆脱出来，忘掉她，忘掉一切啊。然而办不到。归根到底，我是个只能恋慕一个女人的男人。我可以明确地说，我对夫人的其他女朋友一点也不觉得美丽可爱。

姐姐。

请让我在死前只写这么一次吧。

……スガ[1]女士。

这就是那位夫人的名字。

昨天我带了一个毫不喜欢的舞女（这个女人有些地方真蠢）到山庄来，但我绝不是想今天早上寻死才来的。我的确准备在最近期间寻死，不过昨天带那个女人来山庄，只因为她求我带她去旅行，而我也在东京玩腻了，觉得跟这个蠢女人在山庄里休息两三天也不坏，于是虽说对姐姐有些不方便，还是一起上这儿来了。可是姐姐却到东京的朋友那里去，就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得：要死就趁这个时候吧。

从前我希望死在西片町老家的里屋，因为我怎么也不愿意死在街上或是原野，让自己的尸体被那些看热闹的人摆弄。然而西片町的老家已经归别人所有，如今除了死在这山庄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但一想到第一个发现我自杀的人是姐姐，那时你会多么惊愕和恐怖，我的心情便沉重起来，怎么也不能在只跟姐姐两人在一起的夜里

---

① 日文字母，用拉丁字母拼写是 Suga。

自杀。

现在是一个多么好的机会啊。姐姐不在家，却由那位极其迟钝的舞女来发现我自杀。

昨夜两人在一起喝酒，然后我让她睡在二楼的西式房间里，我在楼下妈妈去世的屋子里铺好被褥，就开始写这篇惨痛的手记。

姐姐。

我对人世间不存在任何希望了。再见啦！

归根到底，我的死是一种自然死亡。仅仅由于思想，人是不可能死的。我还有一个很不好意思的请求。妈妈遗物中那件夏布衣服，就是姐姐说让直治明年夏天穿而特地为我改的衣服，请你把它放在我的棺内吧。我真想穿它啊。

天快亮了。让你长期操心啦。再见吧！昨夜的酒完全醒了。我不是喝醉酒寻死的。再一次向你告别了，再见！姐姐。我是贵族。

八

梦。

大家都离开我了。

我办好直治的后事以后，一个人在冬天的山庄里住了一个月。

我怀着清澈如水的心情给那人写了一封信，恐怕是最后一封了。

您好像也把我遗弃了。不，好像把我渐渐地忘掉了。

不过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似乎已经如愿以偿，怀孕了。我现在虽然好像失去了一切，但我肚子里的小生命却使我这个孤独的人发出微笑。

我怎么也不认为我做了肮脏的错事。这世界上为什么有战争、和平、贸易、工会、政治等等东西，最近我也逐渐明白了。您大概还不了解吧？所以您才老是不幸。让我来告诉您吧，那是为了让女人能生下好孩子。

我一开头就没有指望过您的人格和责任。问题是我那一心一意的恋爱冒险能不能成功。我这个愿望已经达到，我的心现在像森林中的沼泽一样恬静。

我认为我赢了。

即使玛利亚生了一个不是同自己丈夫生的孩子①，但只要玛利亚感到无比自豪，她们就会是圣母和圣子。

我为自己能满不在乎地无视旧道德而获得一个好孩子感到满足。

以后您大概还是“咯罗噤、咯罗噤”地跟绅士和小姐喝酒，继续过颓废生活吧。可我并不想叫您停止。那也是您最后的一种斗争形式吧？

我不想再对您说什么请戒酒吧，把病治好吧，争取长寿吧，干点出色的工作吧等等显而易见的敷衍话。与其干点“出色的工作”，不如拼命把所谓不道德的生活坚持到底，这样做说不定倒会受到后世人的感谢呢。

牺牲者。过渡期道德的牺牲者。您和我无疑都是这种人吧？

革命究竟在哪里进行着呢？至少在我们身边，旧道德仍旧毫无改变，还在拦住我们的去路。大海表面的波涛好像在翻滚，但大海底下的海水，别说革命，连动也不动一下，静悄悄地躺着，假装睡着了。

然而我相信，在过去战斗的第一个回合中，虽然奏效甚微，却也能够把旧道德推开了一点。今后我还准备同将要诞生的孩子一起进行第二个、第三个回合的战斗。

生自己钟情的人的孩子，并且抚养他，这就是我的道德革命的完成。

即使您忘了我，或者因酗酒而丧命，我想为了完成我的革命，我也能健康地活下去的。

不久前有人把您人格的卑下告诉了我，但是给予我这种坚强信念的是您。使我在心中出现一道革命彩虹的是您。把活下去的目标指引给我的也是您。

我为您感到自豪，并且想让将来生下的孩子也为您感到自豪。

私生子及其母亲。

---

① 指圣母玛利亚和耶稣的事。

但我们准备永远和旧道德斗争到底，决心像太阳那样活下去。

请您也把您的斗争继续下去吧。

革命还一点也没有进行。看样子还得有更多令人可惜而又尊贵的牺牲者。

今日世界中最美丽的是牺牲者。

这里还有一个小牺牲者。

上原先生。

我对您已经不想有什么请求了，不过为了这个小牺牲者，请您答应一件事。

那就是，请让您的夫人抱一下我生的孩子. 只抱一次就行，并且请允许我在那时候说一声：

"这是直治和某一个女人私下生的孩子呢。"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点我对任何人都不能说。不，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要求您答应我这么做。然而我怎么也不能不这样做，为了一个将要叫直治的小牺牲者，我无论如何不能不请您答应我这么做。

您会感到不高兴吗？即便觉得不高兴，也要请您容忍一下。请您把它当作一个被遗弃而又即将被忘却的女人提出的唯一而略微故意使人不痛快的事，务必答应这一请求。

致

M·C My Comedian[①]

昭和二十二年[②]二月七日

---

① 英语，意为"我的喜剧演员"。M·C是其缩写。

② 1947年。

维庸之妻

传来了慌里慌张打开大门的声音。那响声吵醒了我。想必又是丈夫在夜深人静时喝得个烂醉回家来了，所以我兀自一声不吭地继续躺着。

丈夫点亮了隔壁房间的电灯，一边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边打开桌子和书箱的抽屉，像是在东翻西找着什么。不久，又传来了“扑通”的一声响，大约是他一屁股坐在了榻榻米上面。随后便只能听见他呼哧呼哧的剧烈喘息了，也不知道他究竟在鼓捣什么。我就那样躺着说道：

“你回来啦！你吃过饭了吗？食橱里有饭团呐。”

“哦，谢谢。”他回答得从未有过的温柔。随即他又问道，“孩子怎么样了？还在发烧吗？”

他这样问也是颇为罕见的。明年孩子就满四岁了，或许是因为营养不足，或许是因为丈夫酒精中毒，也或许是病毒的缘故，他看起来比别人家两岁的孩子还小，走路也是一歪一倒的，说起话来至多也不外乎“好吃好吃”，“不要不要”之类的只言片语，甚至让人担心他是不是脑袋有什么毛病。我曾经带着孩子去公共澡堂洗澡，当我抱起他脱光衣服后的身体时，因为那身体过于丑陋和瘦小，我不由得难过万分，以致当着众人的面失声痛哭。而且这孩子还常常不是拉肚子，就是发高烧，可丈夫却从来不肯安安生生地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孩子在他眼里算是个什么，即使我告诉他孩子在发烧，他也只是嘟哝一句“哦，是吗？那就带他去看看医生吧”，随即便急匆匆地披上和服外套出门去了。就算我想带孩子去看医生吧，可手头也没有钱呀，所以只能够躺在孩子身边，默默地抚摩着他的头。

但今天夜里不知为什么，他竟出奇的温柔，还颇为少见地询问孩子的烧退了没有。见此情景，我与其说是感到高兴，不如说涌起了一种可怕的预感，仿佛整个脊梁骨都变得冷冰冰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就那样一直缄默着。在那以后的好一阵子里，都只能听到丈夫剧烈的呼吸声。

“有人吗？”

大门口传来了一个女人纤细的嗓音。我就如同被人泼了一身冷水一样打了个寒战。

“有人吗？大谷先生。”

这一次那女人的声调明显变得有些尖厉了。与此同时，又传来了开启大门的响声。

“大谷先生！您该是在家里的吧？”

能听出那女人的话音里分明带着愠怒。

估计这时候丈夫终于走到了大门口。他好像战战兢兢而又傻头傻脑地回答道：

“什么事呀？”

“还问什么事？！”女人压低声音说道，“您明明有一个好端端的家，可还做出偷盗之类的事情，究竟是为哪门子事儿呀？别再开那种让人为难的玩笑了，赶快把它还给我们吧。否则我这就去报警。”

“你说什么呀？不要再说那种失礼的话了。这儿可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回去！如果不回去，我才要去控告你们呐。”

这时又冒出了另一个男人的声音：

“先生，你真是好大的胆子呀！居然说什么不是我们该来的地方，简直让我吃惊得都说不出话来了。这可不同于别的事情。拿了别人的钱，你呀，开玩笑也该有个分寸吧。到今天为止，我们夫妇俩因为你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头。但你居然还干出了像今天晚上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先生，我真是看错人了啊。”

“这是敲诈。”尽管丈夫的声音又响又高，但却分明在颤抖，“这是恐吓！滚回去！如果有什么牢骚要发，我明天再洗耳恭听好啦。”

“你这话可就蛮不讲理了。先生，你是一个十足的恶棍。既然这样，除了报警便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句话的回音中充满了一种使我毛骨悚然的憎恨。

“随你的便好了！”丈夫大叫道。他的声音已经有些失常，让人觉得空虚乏力。

我连忙起身，在睡衣上披了件和服外套，来到大门口向那两个客人招呼道：

“你们来啦！”

“哎呀，您就是大谷夫人吗？”

一个五十多岁的圆脸男人一笑也不笑地点点头，向我打了声招呼。他穿着一件齐膝盖长的短外套。

而那女人约摸有四十岁左右，显得又瘦又小，但却穿戴得不失为整洁得体。

“深更半夜的，承蒙您特意出来，真是对不起。”那女人也同样是一笑也不笑的，取下披肩后向我躬身寒暄了一句。

这时，丈夫突然趿着木屐，企图夺路逃走。

“喂，这可不行。”

那男人抓住了丈夫的一只手。刹那间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

“放开我！不然我就刺你哟！”

只见丈夫的右手上一把水兵刀闪着寒光。那水兵刀是丈夫的珍藏品，曾经放在丈夫桌子的抽屉里。如此看来，刚才丈夫之所以一回家就翻箱倒柜，肯定是早就预计到了事态的发展，才找出水兵刀揣在怀里的。

那男人抽身闪开了。丈夫趁机像一只大乌鸦似的甩动和服外褂的双袖，朝门外飞奔而去了。

“抓强盗啊！”

那男人大声地呐喊道，想紧跟着飞跑而去。我光着脚下到土间[①]，紧紧抱住那男人阻拦道：

“算了吧。无论是谁，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都万万使不得呀。剩下的事情全都由我来处理好了。”

那四十开外的女人也在一旁劝解道：

---

① 和式房子内没有铺地板的土地房间或门廊。

"是啊，孩子他爹。俗话说'疯子身上揣把刀，鬼神也得让一让'，谁知他会干出什么事来呢?"

"畜生！我要报警！我再也不能容忍了。"那男人怔怔地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像是在自言自语地咕哝着。尽管如此，他的整个身子却一下子散了劲儿。

"对不起，请进屋里去吧。把事情的原委说给我听听。"说着，我走上通往内室的木板台阶，蹲了下来，"没准我能解决问题呐。请进来吧。请！尽管屋子里面邋遢得很。"

两个客人面面相觑，微微点了点头。然后，那男人改变了态度说道：

"无论您说什么，我们都主意已定。不过，还是暂且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夫人吧。"

"是吗，那就请进屋子里慢慢叙谈吧！"

"不，哪有闲工夫来慢慢叙谈呀，不过……"说着，那男人开始脱外套了。

"请不要脱外套，就那样进来吧！天气很冷，真的，拜托您就那样进来吧！因为我们家里连火也没有生……"

"那我就失礼了。"

"请吧，请那位夫人也那样进来吧！"

那男人和女人一前一后地走进了丈夫那间六铺席大的房间。映入他们眼帘的是房间里那一片荒凉的景象：已经开始腐烂的榻榻米，破旧不堪的纸糊拉窗，剥落的墙壁，糊纸早已破损而露出了木框骨架的隔扇，堆放在犄角的桌子和书箱，而且那书箱分明是空空如也。见此情景，两个人都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气。

我给他们俩各自递上一个棉花绽露在外的破旧坐垫。

"因为榻榻米太脏了，所以就请你们用这个东西垫着坐吧！"说罢，我又再一次郑重其事地向他们俩寒暄道，"初次见面，请多关照。迄今为止，我丈夫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尽管我不知道他今晚又做了些什么，但刚才他摆出那么一副可怕的样子，我真不知该怎样表

示歉意。反正他就是那样一个怪脾气的人……”

我刚一开口，便又是一阵语塞，不由得潸然泪下。

“夫人，冒昧问您一句，今年多大年纪?”那男人大大咧咧地盘腿坐在破旧的坐垫上，把手拄在膝盖上，用拳头支撑住下颏，探出上半身问我道。

“您是问我的年纪吗?”

“嗯。您丈夫该有三十岁了吧?”

“是呀。我嘛，比他小四岁。”

“那么说来，也就是二十六岁了。这可真是的。才那么年轻啊?不过，说来也该是如此啊。如果丈夫是三十岁，那么，您也该有那么大的岁数了。不过，我倒也的确是吃了一惊呐。”

“我呀，刚才也着实……”那女人从男人的背后探出脸来说道，“对您佩服得很呐。有这么好的一个夫人，大谷先生干吗还那样呢?”

“纯属是有病，有病啊。从前还不是那个样子，到后来就越变越坏了。”说着，那男人又长长地叹息了一声，改换成一本正经的腔调说道，“说实话，夫人，我们夫妇俩在中野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酒馆。我和她都是上州[1]人。我原本是一个老实厚道的生意人，但或许是因为不守本分吧，渐渐地对那种专与乡下农民打交道的小气生意感到厌烦了。算来是在二十年前吧，我带着老婆一起来到了东京，刚开始时我们夫妇俩是在浅草的一家餐馆里当帮工，后来和一般人一样，饱尝了时盛时衰的辛酸，才好歹有了点积蓄，所以，大约是在昭和十一年[2]吧，我们才在如今的中野车站附近租下了一间六铺席大的房子，那房子还带一个狭窄的土间。就是在这样一个简陋的房子里我们毫无把握地开办了一家小饭馆，专门接待那些一次消费最多不超过一两块钱的客人。虽然这样，我们夫妇俩也从不乱花钱，只顾埋头苦干，多

---

① 相当于现在的群马县。

② 相当于 1936 年。

亏了如此，我们才得以大量买进了烧酒呀、杜松子酒等等，以至于到了后来世上严重缺酒的时代，也能够避免像其他饮食店那样歇业转向，而顽强地坚持做饮食生意。这样一来，那些关照我们的老主顾们也诚心诚意地帮助我们，有人还为我们疏通渠道，让那些所谓专供军官的酒菜也辗转进入了我们的手中。即便是在对美英开战、空袭日趋紧张之后，由于我们既没有小孩的拖累，也不想疏散回故乡，所以，打定了主意一直留下来继续做饮食生意，直到这个家被战火烧毁为止。期间也没有遇到什么灾难，总算是熬到了战争结束。这下我们总算是松了口气，这一次是大量买进了黑市酒来贩卖。简单说来，我们的经历大抵如此了。话说起来很轻松，没准您会认为我们属于那种没有受多少苦、运气还并不差的幸运儿，可是，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座地狱呀。所谓'寸善尺魔'，真是一点不假。如果得到了一寸的幸福，必然会有一尺的魔物伴随其后。人的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子。倘若有哪一天或半天属于无忧无虑的日子，那就真算得上是幸运之人了。您丈夫，也就是大谷先生第一次到我们店里来，还是在昭和十九年的春天吧。那时候，对英美之战还没有败下阵来。不，正是接近败下阵来的时候了，不过，对于那场战争的实情，或许该说是真相吧，我们是一点也弄不明白的，只是想着再熬个两三年，就好歹能够以对等的资格迎来和平了吧。现在回想起来，大谷先生第一次出现在我们店里时，他身上穿着一件久留米地方出产的藏青碎白点花纹布的便装，外面还披了件和服外套。当然不光是大谷先生，那时节穿着防空服装东游西逛的人在偌大的东京也是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当时还处于人们大都可以穿着普通的服装无所顾忌地悠闲外出的时代，所以，对于大谷先生当时的那身装束，我们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邋遢的地方。那时大谷先生并不是只身一人来的，尽管在夫人面前不便说，但我还是一五一十毫不隐瞒地告诉您吧。您丈夫是被一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带着悄悄从店堂的厨房门进来的。那时候我们店的大门每天都是一直关闭着的，按当时的流行术语来说，就叫做'闭门营业'。只有极少数老

主顾从厨房门悄悄进来，而且，没有人在店堂土间的座位上喝酒，而是在里面的六铺席房间里把电灯开得暗暗的，压低嗓音说话，静悄悄地喝个酩酊大醉。那个上了点年纪的女人在此之前不久还一直在新宿的酒吧里当女招待。在她当女招待的时候，常常带一些有头有脸的客人来喝酒，那些客人成了我们店的常客。说来我们和她的交往也就是这样一种'惺惺相惜'的关系吧。由于她的公寓就在附近，所以，当新宿的酒吧关门停业，她不再当女招待以后，她依旧不时零零星星地带一些熟识的男人来。而这时我们店的存酒也渐渐少了，无论是多么有脸面的客人，如果一味增加喝酒的客人，我们也非但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宠若惊，反倒觉得有些麻烦多事了。但在此之前的四五年间，她介绍来的客人大都出手大方，看在这份情理之上，只要是她引荐来的客人，我们一直是毫无难色地端出酒来供他们享用。所以，在您丈夫由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的名字就叫阿秋吧——带着悄悄从后面的厨房门进来之后，我们也并不觉得有什么蹊跷，只是按照惯例，请他们进了六铺席的房间，拿出烧酒来给他们喝。那天晚上，大谷先生只是一个劲儿老老实实地喝酒，酒钱也是由阿秋付的，而后他们俩又一道从厨房门回去了，可是那天晚上大谷先生宁静而优雅的举止却出乎意料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当魔鬼初次出现在人的家里时，难道就是那样一副静悄悄、羞答答的模样吗？从那天夜里起，大谷先生便盯上了我们店。又过了十天左右，这一次大谷先生是一个人从后门进来的，只见他猛然间掏出一张一百块钱的纸币，哎呀，那时候一说起一百块钱，可算得上一大笔钱呐，起码相当于如今的两三千块钱，甚至于更多。他硬是要塞进我的手中，说了声'拜托你了'，脸上还露着羞怯的微笑。看来他已经喝过了不少，反正夫人您也是知道的，没有比他更海量的人了。当我正琢磨着他是不是已经醉了的时候，他突然又开始一本正经、头头是道地说起话来，而且无论他怎么贪喝我也从没看见他走路打过趔趄。尽管人到三十，正是所谓血气方刚，喝酒达到天量之时，但像他那样豪饮的人毕竟还是少有的。那天晚上他好像

也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喝过酒之后才来的，到了我们店里又一口气连喝了十杯烧酒，他几乎是一直缄默着，即使我们俩找话和他搭讪，他也只是腼腆地笑着，‘唔唔’地敷衍几声，含糊地点点头。突然间他问起现在几点了，然后站起身来。我说，‘我这就给您找头。’他说，‘不，不用了。’‘这可让我为难啦。’我坚决地说道。他吃吃地笑着，说了声‘那就替我保管到下一次吧，我会再来的’。然后就回去了。可是，夫人，我们从他那儿收到钱，前前后后也就只有那一次而已。那以后他总是找出种种理由来蒙混搪塞，三年来分文未给，我们家的酒几乎是被他一个人喝光的。这不是太让人吃惊了吗？”

我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来。一种莫名其妙的滑稽感顿时涌上了心头。我赶紧捂住嘴巴，偷偷看了看旁边那位夫人的脸。只见她也奇妙地笑了，把头埋得低低的。然后，那男老板又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道：

“虽说这事本身并不好笑，但又确实令人吃惊，忍不住想笑。实际上，如果把那样一种伎俩用在别的正经事上，恐怕不愁当不上大臣和博士，甚至想当什么就能当上什么吧。看来，被他乘虚而入，弄得一贫如洗，在这寒冷的日子里以泪洗面的人，不光是我们俩，恐怕还不在少数呐。就说那个阿秋吧，由于结交了大谷先生，结果原来出钱资助她生活的那个男人把她给甩了，害得她钱财和衣物都空空如也，据说如今正在大杂院中的某间肮脏屋子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不过话又说回来，在阿秋与大谷结识的那一阵子里，她可真是兴奋得头脑发昏，甚至还在我们面前大肆吹嘘他呐，首先说他的身份显赫无比，是四国某个诸侯的分支、大谷男爵的次子，如今因行为不够检点，被他老爹断绝了父子关系。不过，只要他老爹男爵一死，他照样还是会和长兄俩一起平分遗产的。他又聪明又伶俐，真可谓天才，二十一岁时就写成了一本书，比石川啄木[1]这个大天才写的书还要高明不少，那以后又写出了十几本书，年纪轻轻的，却已成了日本的头号诗人。而

[1] 石川啄木（1886—1912），日本歌人，岩手县人。代表作有《可悲的玩具》等。

且还是个大学者，从学习院[1]进了一高，然后又是帝大，法语德语样样精通。哎呀，行啦行啦，反正是吹得个天花乱坠，按照阿秋的说法，他简直就像是一个神灵般的人物。不过，那些话似乎也并非全是谎言，即使从旁人那儿打听，他也同样是大谷男爵的次子，有名的诗人，所以，就连我们家的这个老太婆，尽管年纪一大把了，却也和阿秋暗地里争风吃醋，被那家伙迷得个头脑发昏，说什么'出身不俗的人毕竟总有些与众不同呐'，一心期盼着大谷先生的到来，真让人受不了。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华族[2]不华族的了，可直到战争结束为止，如果想把女人骗到手，最好的一招似乎就是自诩为被逐出家门的华族子弟。奇怪的是，女人就像是昏了头似的，拿如今的流行语来讲，那归根结底也算是一种奴隶的劣根性吧。我等之辈也算得上经历过种种世面的老油子了，所以在我看来，尽管在夫人面前这样说有失体统，他至多不过属于华族中四国诸侯的一个分支，而且还只是个次子罢了，这与我们的身份根本没有什么差别，我怎么可能像她们那样不知廉耻地被他搞得头脑发热呢？尽管如此，不知为什么，那位先生对于我来说也还是不好对付的，虽说我早就打定了主意，无论他下一次怎么央求我，都绝对不给他酒喝了，可一看到他如同一个遭到追撵的人一般在意想不到的时刻里蓦然出现，走进我们店里后终于舒了口气的样子，我下定的决心也不由自主地动摇了，最终又给他端出了酒来。他即使喝醉了，也从不会胡闹一气的。要是他能够毫不含糊地付清酒钱，那倒不愧是一个好顾客呐。说来他自己也并没有吹嘘过自己的门第出身，也从没有愚蠢地自诩为天才什么的，一旦阿秋等人在他旁边大肆谈论起他的非凡之处，他就会嘀咕着什么'我想要钱'、'我要把这里的欠账全部付清'等等，总之，扯上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使在座的人大为扫兴。尽管迄今为止他没有付过酒钱，但阿秋她

① 学习院、一高（第一高等学校）、帝大（帝国大学）战前均为贵族子弟集中的学府。
② 有爵位的人及其家属，第二次大战后被取消。

倒是常常替他垫付的，除了阿秋，还有另一个不便让阿秋知道的保密的女人，她可能是某个地方的有夫之妇，有时与大谷先生一同来店里，常常为大谷先生留给店里一些多余的钱。我不过是一个生意人罢了，因此，如果没有那些女人为他付钱，无论是大谷先生也好，还是宫廷显贵也好，我都不可能让他一直那么白吃白喝的。不过，仅仅靠她们偶尔付付账，也无异于杯水车薪呀，我们早已是损失惨重。听说他的家在小金井，而且还有一个正经的夫人，所以一直寻思着前来拜访一次，商量一下大谷先生欠下的酒钱该怎么办。为此不露声色地向大谷先生打听过府上在哪儿，但他马上就发觉了，随即说出好些刺耳的话来：'钱没有就是没有呗，干吗那么瞎着急呢？吵起架来闹得不欢而散，对谁都没有好处哟！'话虽这么说，可我们琢磨着，至少得摸清先生的家在哪儿，于是盯了两三次梢，可每次都被他巧妙地甩掉了。不久，东京连续遭受了空中大轰炸，不知为什么，大谷先生竟然戴着一顶军人的帽子翩然而至，自个儿动手从壁橱中取出白兰地的酒瓶，就那么站着咕噜咕噜地喝了起来，然后又像一阵风似的飘然溜掉了，也不付什么钱。不久战争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无所顾忌地买进了黑市上的酒菜，在店门口挂出了崭新的布帘子招牌，为招揽客人还雇了一个女孩子。谁知那个魔鬼先生又出现了，如今他不是带着女人，而总是和两三个报刊记者一起驾到，那些记者说，从今以后军人就要没落了，而曾经一直贫穷寒碜的诗人则将受到世人的追捧等等。大谷先生当着那些记者的面，尽讲一些外国人的名字，什么英语呀、哲学呀，反正是一些不知所云的奇怪东西。然后他冷不防站起身走出店门，一去而不复返。记者们一脸失望的表情，猜测他去了哪儿，议论着他们自己是不是也该回去了，随即开始准备离开店里。我连忙说：'请等等。先生他常常是利用这一招来溜之大吉的，今天的账得由你们支付。'有时候其中一些人老老实实地凑足酒钱付清后才离开，有时候也有一些人勃然大怒着说道：'让大谷付吧，我们过的可是五百块钱的穷日子呐。'即使遭到他们的怒斥我也绝不罢休：'不，大谷

先生累计有多少欠账，你们知道吗？假如您们能从大谷那儿为我讨回欠账，无论金额是多少，我都将如数奉还一半。’听我这么一说，那些记者满脸惊讶的神情，说道：‘什么?! 没想到大谷是这样一个蛮横无理的家伙。从今以后再也不和那家伙一起喝酒了。今儿晚上我们手里的钱还不到一百块，明天再给你送钱来吧，现在就把这个留下作为抵押。’说着，豪爽地脱下大衣离去了。世上的人都说记者人品不好，可比起大谷先生来，却诚实和爽快得多，如果大谷先生是男爵的次子，那么，那些记者无疑够格当公爵的长子了。战后。大谷先生的酒量更是有增无减，面相也变得更加凶恶，还随口开起一些过去从未说出口来的下流玩笑，有时还冷不防对那些一同前来的记者大打出手，双方你推我搡，没完没了。而且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他好像把我们雇佣的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也骗到了手，让我们目瞪口呆，十分难堪。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也就只能忍气吞声了，还一个劲儿地劝那姑娘死了那条心，悄悄地把她打发回了她父母亲那儿。我说：‘大谷先生，我什么都不说了。只是拜托你，从今以后不要再来了。’可他却威胁我说：‘你靠黑市买卖赚了黑钱，却胆敢假装正经教训人，你休想！对你的所有底细，我都一清二楚呐。’而且他第二天晚上又若无其事地到店里来了。战争期间，我们是做过黑市生意，或许是受到报应吧，以致不得不与这个妖魔似的人物打交道，但他干出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缺德事情，已经不是什么诗人和先生了，而是十足的强盗。他偷了我们家的五千块钱以后溜走了。如今我们进货花了不少钱，家里最多也就只有五百块或是一千块的现金，说实话，每天营业赚来的钱通常都得马上投入到进货中去的，今天晚上之所以有五千块这一大笔款子，是因为大年三十快到了，我四处到老主顾的家中去讨债收款，好容易才凑足了那笔钱的。而且，如果这笔钱不在今天晚上拿去进货，那明年的正月就无法继续做生意了。因为是这么一笔重要的款子，所以，我老婆在里面的六铺席房间中点了数以后才放进了橱柜的抽屉中，没想到他坐在土间的椅子上一边独自喝酒，一边看

见了里面的情形。他突然站起身，随随便便就钻进六铺席的房间，一声不响地推开我老婆，打开抽屉，一把抓起那五千块的一扎纸币，塞进和服外套的口袋里，就在我们吓得瞠目结舌之时，飞快地跳下土间，溜到了店门外。于是我大声地喊叫，想让他停下，随即和老婆一起紧追不舍。我想，事到如今，只有大声地呼喊捉贼，才能把过往的行人召集拢来一并抓住他。但大谷先生与我们并非一日之交，那样做未免太过绝情。我思忖着，今夜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让大谷先生溜掉了，一定要跟踪到底，找到他最终的落脚之地，跟他好好地理论一番，让他把钱还给我。因为我们经营的不过是小本生意罢了，所以夫妇俩齐心协力，今天晚上终于找到了这个家，克制着忍无可忍的情绪，压低嗓门请求他把钱还给我们，可这算哪门子事呢？他居然掏出水兵刀威胁说要刺伤我。"

又是一阵莫名其妙的滑稽感涌上了心间。我情不自禁地放开嗓门笑了起来。旁边的那位夫人也红着脸微笑了。而我竟一笑不可收拾，尽管觉得这样做对不起那位店老板，可不知为何却又感到特别地好笑，以至于笑个不停，眼泪都流出来了。我突然想起丈夫的诗中有一句叫做"文明的结果是大笑"，或许它正是描述的这样一种心情吧。

但这并不是一件可以一笑了之的事情，因此我也颇费了一番踌躇。那天夜里，我对他们俩承诺道："以后的事情就由我来负责解决好了。所以，关于报警的事，务必请你们再等一天。明天我会去拜访你们的。"说罢，我还详细打听了他们在中野的酒馆所处的具体位置，死乞百赖地请他们答应我的要求，打发他们那天夜里暂且先回去了。然后我兀自一人呆坐在冰冷的六铺席房间的中央，陷入了沉思里，但却没能想出什么好主意。于是我站起身，脱下外褂，一头钻进了儿子躺着的被窝里，一边抚摸着儿子的头，一边祈求着，但愿黎明永远不要来临。

我父亲从前在浅草公园的瓢箪池旁边摆了个摊点专卖素什锦。母亲老早就过世了，只有我和父亲俩相依为命，住在简陋的大杂院

里，摆摊的事也是由我和父亲俩一起操持。那时候，现在的他时不时上我们的摊上来，不久，我便瞒着父亲开始与他在别的地方约会了。因为肚子里怀上了孩子，所以在历经了种种波折以后，终于在形式上成了他的妻子，不过，并没有正式入籍，因而生下的孩子也就成了私生子。他一出家门，就常常是连着三四个晚上不回家，不，有时甚至连续一个月也不回家，而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和干些什么。他回来时总是醉成了一摊烂泥，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一言不发地凝视着我的脸，眼泪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有时会冷不防钻进我躺着的被窝里，紧紧地搂抱着我的身体，颤抖着说道：

“啊，不行不行，好害怕，我好害怕呀。真恐怖啊！快救救我！”

即使是在睡着了之后，他也是忽而梦话连篇，忽而长吁短叹。而第二天早晨，他就像个灵魂出了窍的人一样傻愣着，可不一会儿便又踪影全无了。这一去又是连着三四个晚上都不回家。倒是丈夫在出版界的两三个老朋友惦记着我和孩子的境况，不时地送些钱来接济我们，才使我们母子俩免于饿死，平安地活到了今天。

我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等我睁开眼睛一看，早晨的阳光已透过木板套窗的缝隙照射了进来。我起身做好准备，背上孩子出门了。我感到自己再也不能闷声不响地待在家里了。

我漫无目的地朝着车站方向走去，在车站前面的摊铺里买了点糖果给孩子含在嘴里，然后突发奇想地买了张去吉祥寺的车票，坐上了电车。我用手抓住车厢里的吊带，心不在焉地瞅了一眼挂在车厢顶上的广告画，发现上面有丈夫的名字。那是一本杂志的广告画，好像丈夫在上面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朗索瓦·维庸①》的长篇论文。就在我凝望着《弗朗索瓦·维庸》这个标题与丈夫的名字时，不知为何，眼眶里竟盈满了酸楚的泪水，以至于广告画变得模糊起来，最终什么都看不

① 弗朗索瓦·维庸（1431—1463），法国中世纪的抒情诗人。其一生是逃亡、入狱、流浪的一生，诗歌充满了自嘲、悔恨、绝望和祈愿。

见了。

我在吉祥寺下了车，到了久违多年的井头公园。池边的杉树早已被砍伐殆尽了，看来某个工程即将开工，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荒凉感，和过去已经是判若两样了。

我把孩子从背上卸下来，和他并排坐在池畔有些朽烂的长凳上，拿出家中带来的山芋给孩子吃。

“宝贝，这儿该是一个漂亮的水池吧？从前啊，在这水池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鲤鱼和金鱼呐。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多无聊啊。”

也不知道孩子他想了些什么，只见他一边满嘴嚼着山芋，一边莫名其妙地傻笑了。尽管是自己的亲骨肉，可我还是觉得他傻头傻脑的。

无论在池边的长凳上待多久，事情也是不会凭空了断的。于是我又背上孩子，慢吞吞地踅回吉祥寺车站，在熙熙攘攘的摊贩街东游西逛。然后又在车站买了张去中野的车票，不加思考，也没有计划，就像是被稀里糊涂地牵引到某个可怕的魔鬼深渊中似的，跨上了电车。在中野车站下车后，按照昨天打听的路线，来到了他们那家小酒馆外面。

正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于是我拐到背后从厨房门走了进去。店老板不在，只有老板娘一个人在打扫店堂的清洁。一见到老板娘，我便随口撒了个谎，这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喂，大婶，看来我能还清欠账呐，不是在今晚，就是在明天，反正已经有眉目了，因此您大可不必操心。”

“哎呀，那可真是太好了。”

说着，老板娘的脸上泛起了些许高兴的神色。尽管如此，在那张面孔的某个地方依旧残留着半信半疑的不安阴影。

“大婶，这可是真的。确实会有人送钱来的。在此之前，我就作为人质一直待在这儿。如此一来，您总该放心了吧？在筹措到钱之前，就让我一直在店里帮帮忙吧。”

我把孩子从背上卸了下来，让他一个人在里面的六铺席房间玩。我

拼命地干起活来表现给老板娘看。孩子本来就一个人玩惯了，所以一点也不碍事。或许是脑袋不好使吧，天生就不大认人，所以还一个劲儿冲着老板娘发笑。当我替老板娘出门去领取配给他们家的食物时[1]，老板娘把美国造的空罐头盒拿出来代替玩具给孩子玩。孩子把那些空罐头拿在手中又是敲又是滚，在六铺席房间的一角乖乖地玩耍着。

正午时，老板拿着采购的鱼和蔬菜回来了。一看见老板的脸，我就马上撒了一通刚才对老板娘撒过的谎。

老板一脸惊讶的表情，用教训人的口吻说道：

“真的吗？不过，夫人啦，钱这玩意儿，只要不是攥在自己的手心里就是靠不住的。”

“不，这可是真的，请相信我吧。至于报警嘛，就请再等一天吧。在此之前，我就在店里帮帮忙。”

“只要钱能还回来，那些就不必了。”老板像是自言自语似的嗫嚅道，“反正今年这个年头也就只剩下五六天了。”

“是啊，也正因为如此，就让我……哎呀，来客人了。欢迎光临！”我朝着三个走进店来的工匠模样的客人微笑着招呼道，然后又小声地对老板娘说道，“大婶，对不起，请把围裙借给我吧。”

“哎呀，还雇了个美人呐。这家伙长得真是漂亮啊！”一个客人说道。

“千万别引诱她哟！”老板用一副并不是纯粹开玩笑的口吻说道，“她的身上可是押着一大笔钱呐。”

“是一匹价值一百万美元的名马吗？”另一个客人说了句猥亵的俏皮话。

“据说即便是名马，母的也只值半价啊。”我一边给他们烫酒，一边毫不示弱地用同样猥亵的俏皮话回敬了一句。

“别谦虚嘛！从今以后呀，在日本，不管是马还是狗，都是男女

---

① 二战刚结束时，由于物资匮乏，日本曾实行过配给制。

平等呐。”其中那个最年轻的客人就像是在大声斥责似的嚷嚷道，“大姐，我可是迷上你了，算得上一见钟情呐。不过，你已经有孩子了吧?”

“还没有呐，”老板娘从里面抱着孩子走了出来说道，“这孩子是我刚从亲戚家领养的。这样一来，我们也总算是有自己的后嗣了。”

“而且还有了钱。”一个客人开了个玩笑。

听罢这话，老板一本正经地嘀咕道：“既有了情人，还欠下了债务。”然后，他又陡然改变语气，问客人道：“你们想要点什么？来个汤锅怎么样?”

这时我才豁然明白了一件事。“果然如此!”我暗自点着头，表面上却若无其事地给客人们送上了酒壶。

那一天正值圣诞节前夕，所以，来店的客人真是络绎不绝。我从一大早起就什么也没有下过肚，但心事满腹，所以，当老板娘劝我吃点什么时，我也只是回答道：“不，我肚子还饱着呐。”我就像是身穿一层羽衣在翩翩起舞一般，只顾着手脚麻利地干活。或许是我自鸣得意吧，那天店堂里洋溢着非同寻常的活跃气氛，走过来打听我的名字，要求跟我握手的顾客哪里才只有两三个人呐。

但这样下去，事情又会怎么样呢？我的内心一片茫然。我只是笑着，应付着客人们猥亵的玩笑，自己也回敬一两句，来回忙着给客人们斟酒。其间我只是琢磨着，但愿自个儿的身体就如同冰激凌似的彻底溶化掉。

有时候，在这个世上也是会出现奇迹的。

大约是九点刚过的时候吧，只见一个头上戴着圣诞节的纸制三角帽，脸上像罗平[①]一样罩着一副遮住了上半边脸的黑色假面的男人，与一个年纪三十四五岁、身体偏瘦的漂亮妇人一起出现在店堂里。那男人背对着我，在土间角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但就在他刚一走进店

---

① 法国侦探小说家莫里斯·勒布朗（1864—1941）作品中一个绅士怪盗的名字。

堂的瞬间里，我便一眼认出了他是谁。是我的强盗丈夫。

但他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因此我佯装不知地照样和其他客人搭讪调笑。那个妇人与丈夫相对坐下后，叫我道：

“大姐，请来一下。”

“来了。”我应声道，并来到了他们俩的桌子旁，说道，“欢迎光临，要酒吗？”

这时，丈夫透过假面瞅了瞅我，看来他很是吃了一惊。我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肩头，说道：

“是该说圣诞节快乐吧？还是该说什么别的呢？看来您还能喝下一升酒呐。”

那妇人对我的话不加理睬，只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大姐，对不起，我们有些保密的事情要对这里的老板说，劳驾你叫老板到这里来一下。”

老板正在里间做油炸食品。我走到他面前说道：

“大谷已经来了。请您去见见他。不过，可别对和他一起来的女人提起我的事儿。我不想让大谷觉得没有脸面。”

“到底还是来了。”

看来店老板对我撒的谎尽管一直半信半疑，但毕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相信了，所以，他单纯地认定：丈夫回来一事也是出于我的旨意和安排。

“我的事儿可千万别说哟！”我再一次叮嘱道。

“如果不说为好的话，那我就不说吧。”他爽快地答应了，然后向外面的土间走去。

老板环视了一周土间的客人，然后径自走到丈夫就座的桌子旁，与那个漂亮妇人交谈了两三句话之后，他们仨一起走出了店门。

“已经没事了。一切都已解决。”不知为何，我竟如此相信着。我兴奋不已，猛然紧紧攥住那个身穿藏青碎白点花纹布衣服、年纪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客人的手腕，说道：

"喝吧，来，一起喝吧。因为明天是圣诞节呀！"

只过了三十分钟，不，甚至还不到三十分钟，老板很快——快得让人难以置信——就一个人回来了。他来到我旁边说道：

"夫人，谢谢您，钱已经还回来了。"

"是吗？那太好了。全部如数奉还了吗？"

老板有些怪异地笑着说道：

"是的，不过，仅限于昨天的那部分钱。"

"加上以前的，一共欠您多少钱？粗略算一下吧，不过，请尽量往少里算。"

"二万块呗。"

"那么多就够了吗？"

"我尽量往少里算的呀。"

"就由我来还给您吧。大叔，从明天起，就让我在店里干活吧。喂，请答应我吧。我靠干活来还债。"

"真的？夫人，没想到你也成了'阿轻'[1]呐。"

我们齐声笑了。

那天夜里十点过后，我才离开中野的酒馆，背着孩子回到了小金井的家里。丈夫依旧没有回来，而我已经满不在乎了。假如明天又去那个店里，没准还会见到丈夫的。以前我干吗没有发现这等好事呢？到昨天为止我饱尝了苦头，说到底全都是因为自己傻，没有想到这个好主意罢了。过去在浅草父亲摆出的摊铺上，我接待顾客也还不算拙劣，所以，从今以后在中野的店堂里我一定能周旋得更好。今天晚上我不是就得到了五百块钱的小费吗？

听老板讲，丈夫昨天晚上从家里逃走后去某个熟人家过了夜。今天清晨突然闯进那个漂亮妇人在京桥经营的酒吧，一大早就喝开了威

---

① 日本传统说唱曲艺"木偶净琉璃"中著名剧目《忠臣藏》中的女主人公。她卖身为妓，替丈夫筹款还债。

士忌酒，而且还硬是塞钱给在店里干活的五个姑娘，说是送给她们的圣诞礼物，然后在正午时分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去了某个地方。不大一会儿，他便抱回来了圣诞节的三角帽啦、假面具啦、豪华大蛋糕啦、还有火鸡等等。他四处挂电话，招来各方好友，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酒吧的老板娘好生奇怪，心想：这个人平常不总是身无半文的吗？于是暗地里问了问他，结果丈夫泰然自若地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老板娘和他似乎原本就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就像亲骨肉似的劝告他道，不管怎么说要是闹到警察那儿去，事情可就严重了，那多没意思呀，必须得把钱还给别人。说罢，老板娘先垫上那笔钱，让丈夫带着她来到了中野的酒馆里。中野的店老板对我说道：

“我也琢磨着大概是那么回事吧，不过，夫人，您倒是也留意到了这个方面呐。是您拜托了大谷先生的朋友帮忙的吧？”

听他的那副口吻，就像是认定，我打一开始便估计到丈夫会这样回来，所以才先到这个店里来等着他似的。我笑着只回答了一句话：

“嗯，那些事是早已……”

从第二天开始，我的生活与从前截然不同，变得令我兴奋和惬意了。我赶紧去电烫理发店做了头发，还备齐了化妆品，重新缝制了衣服，并且从老板娘那儿得到了两双崭新的白袜子。我感到从前那积压在胸中的沉闷心绪已蓦然被一扫而光了。

早晨起床后，和孩子一起吃过早饭，随即做好盒饭，背上孩子去中野上班。大年三十和正月恰恰是店里最忙碌的时节。“椿屋的阿幸”，便成了我在店里的名字。就是这个“阿幸”，每天都忙得个头昏眼花的。丈夫每隔一天都要到店里来喝一次酒，酒钱都是由我支付的。喝过酒以后他便又突然不知去向了。夜阑人静时，他有时会朝店堂里探头望一望，悄悄问我：

“还不回去吗？”

我点点头，开始作回家的准备，然后一起结伴愉快地踏上回家的

路。而这已成了常事。

“干吗一开始没有这样做呢？我好幸福呀。”

“女人既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

“真的吗？被你这么一说，觉得也不无道理，不过，男人又怎么样呢?”

“男人只有不幸，总是与恐惧搏斗。”

“这我可不懂了。不过，我倒是希望一直过现在的这种生活呐。椿屋的大叔和大婶也都是上好的人。”

“他们都是些傻瓜，是些乡巴佬，因此也贪得无厌。他们让我喝酒，最终无非是想赚钱罢了。”

“人家是做生意的，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并非仅仅如此吧。没准你还占过那老板娘的便宜吧?”

“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那老头子怎么样？他也有所察觉吧?”

“好像他心里有数呐。他曾经半带叹息地说道，既有了情人，还欠下了债务。”

“我呀，尽管这样说不免有些矫揉造作，真的是想死得不得了。打我一出生，就尽想着死的事情。也为了大家，我还是死去为好呐。这一点早已是明摆着的了。尽管如此，却又怎么也死不了。有一种如同神灵般的东西阻止了我去死。”

“因为你有工作呀。”

“工作算不了什么。既没有什么杰作，也没有什么劣作，别人说它好它就好，别人说它坏它就坏，这就像是呼吸时的呼气与吸气一样。可怕的是，在这个世上的某个地方有神灵存在呐。该是有，对吧?”

“哎?!”

“该是有吧?”

“我可不知道呐。”

“是吗?”

就在我在店里干了十天、二十天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来椿屋喝酒的客人无一例外全都是罪犯。我渐渐觉得，丈夫在他们中间算是非常善良的了。而且不光是店里的客人，就连路上的行人也全都隐瞒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罪孽。一个穿戴华贵、年纪五十多岁的太太，来椿屋的厨房门口卖酒，明明讲好一升三百块钱，因为按现在的行情来说是相当便宜的，所以老板娘马上全都买了下来，谁曾想到全都是兑了水的假酒。就连那样优雅华贵的太太也不得不干出这种缺德事。我认为，在这样的世上，要想自个儿毫无愧疚地生存下去，其实是不可能的。就跟玩扑克牌一样，一旦把负的全都收齐了，也就变成了正的，此类事情在这个世上的道德中难道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

假如有神灵存在，就请站出来吧！我在正月的某一天，被店里的一个客人奸污了。

那天夜里天上下着雨。丈夫没有出现。丈夫在出版社的一个老朋友，也就是有时给我送来生活费的矢岛先生，与另一个客人一同来到了店里。那另一位先生好像也是干出版行业的，年纪同矢岛先生差不多，大约有四十来岁。他们一边呷着酒，一边半开玩笑地高声议论着，大谷的夫人在这种地方干活到底是好还是坏。我一边笑着，一边故意问道：

“他的那位夫人在哪儿呢?”

矢岛先生说道：

“虽说不知道她在哪儿，但至少比椿屋的阿幸要优雅和漂亮。”

我接着搭讪道：

“真叫我嫉妒呐。像大谷先生那样的人，我真想陪他睡一觉呐，哪怕只是一夜也行。我喜欢他那种狡诈的人。”

“真是没办法呀。”矢岛先生把脸转向同伴，撇了撇嘴巴。

我便是诗人大谷的妻子这件事，早已被那些与丈夫一同来店的记者们知道了。甚至有些多事的人听说之后，还专门来店里凑热闹，所以，店里变得越来越红火，而老板的心情也自然是好极了。

那天夜里，矢岛先生要去谈一笔纸张的黑市交易。他回去时已是十点过了。天上正下着雨，丈夫又没有出现，所以尽管店里还留着个把客人，我还是开始做回家的准备了。我把睡在里面六铺席房间一角的孩子抱起来背在背上，小声地对老板娘说道：

“我又要借您的伞用一下了。”

“伞嘛，我拿着呐。让我送您吧。”留在店里的那个客人一本正经地站起身来说道。他二十五六岁，瘦削而矮小，模样像是个工人。他是今晚才初次来店的新顾客。

“谢谢。我习惯于一个人走路。”

“不，您家远着呐。这我知道。我也是小金井附近的人。让我送送您吧。大婶，请您结账。”

他只在店里喝了三瓶酒，好像并没有怎么醉。

一起坐上电车，在小金井下了车，然后合用一把伞在下着雨的漆黑路面上并排走着。那年轻人刚才还一直一言不发，现在却一点点地开始说话了：

“我全都知道。我嘛，是大谷先生的诗歌迷呐。我也在写诗。我一直寻思着，想请大谷先生看看我的诗。不过我很怕大谷先生，所以……”

我已经到家了。

“谢谢您了。那么，店里再见吧。”

“嗯。再见。”年轻人在雨中回去了。

深夜，大门口咯吱咯吱的开门声惊醒了我。我想，又是丈夫喝醉后回家来了，所以一声不响地继续躺着。

“有人吗？大谷先生，有人吗？”

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起身打开电灯走到大门口，只见刚才那个年轻人已经醉得一塌糊涂，连脚跟都站不稳了。

“夫人，对不起，回去的途中我又在摊铺上喝了一杯。事实上，

我的家是在立川呐。我去车站一看，电车已经收车了。夫人，求求您，让我住一夜吧。我不要被子，什么都不要。我就睡在大门口的木板台阶上也行。在明天一大早的始发列车开车之前，就让我胡乱地躺一夜吧。如果不是下着雨的话，我可以睡在那边的屋檐下。可这么大的雨，那也不成啊。求求您了。”

“丈夫又不在家，所以，如果那木板台阶您不介意的话，那就请吧。”说着，我把两个破旧的坐垫给他拿到了木板台阶那儿。

“对不起，我喝醉了。”他似乎有些不好受，小声地说道。然后他马上倒在木板台阶上睡了。当我返回自己的被窝时，早已传来了很响的打鼾声。

第二天拂晓，我轻而易举地落入了那个男人的手中。

那天我表面上和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背着孩子去店里上班。

在中野酒馆的土间里，丈夫把盛着酒的杯子放在桌子上，一个人读着报纸。早晨的阳光照射在酒杯上，我觉得漂亮极了。

“没有人在吗?”

丈夫回头看着我说道：

“嗯。老板采购东西去了还没回来，大婶刚才还一直在厨房里呐。怎么，不在那儿吗?”

“昨晚你没来?”

“来了的。这一阵子，见不到椿屋阿幸的脸，我就睡不着了。所以，十点过后来这儿看了看，说是你刚才才回去了。”

“然后呢?”

“我就在这儿住下了。因为雨下得好大。”

“那我从明天起也住进这个店里吧。”

“那也行啊。”

“那就这样办吧。老是租下家里的那房子，也没什么意义。”

丈夫又沉默着把视线转向了报纸。他说道：

“哦，又在骂我的坏话呐。骂我是享乐主义的假贵族。这可骂得

不对。其实他该骂我是畏惧神灵的享乐主义者。阿幸，瞧，这儿还骂我是人面兽心的人呐。不对不对，事到现在我才告诉你，去年年底我从这儿拿走了五千块钱，其实是想用那笔钱让阿幸和孩子过一个许久都没有过的好新年。因为不是人面兽心的丧失为人，所以才干出了那种事呀。”

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高兴，只是嗫嚅道：

“管他是不是人面兽心。我们只要活着就行了。”

人间失格

序言

我曾经看见过那个男人的三张照片。

第一张，可以说是他幼年时代的相片，想必是在十岁前后拍下的。只见照片上这个男孩子被众多的女人簇拥着（看来，这些女人是他的姐姐、妹妹，抑或堂表姐、堂表妹），他站在庭院的水池畔，身穿粗条纹的裙裤，将脑袋向左倾斜了近三十度，脸上挂着煞是丑陋的笑容。丑陋?! 殊不知即使感觉迟钝的人（即对美和丑漠不关心的人们）摆出一副冷淡而麻木的表情，不负责任地夸奖他是“一个怪可爱的孩子呐”，也不会让人觉得这种奉承纯属空穴来风。在那孩子的笑脸上并不是找不到那种人们通常所说的“可爱”的影子来。但倘若是一个哪怕才接受过一丁点审美训练的人，也会在一瞥之间立刻发出“哎呀，一个多讨厌的孩子”之类的牢骚，甚至或许会用掸落毛虫时的那种手势，一下子把照片扔在地上吧。

说真的，不知为什么，那孩子的笑脸越看越让人觉得讨厌、发憷。其实那本来就不是一张笑脸。这男孩一点儿也没有笑。其证据是，他攥紧了两只拳头站立在那儿。人是不可能一边攥紧拳头一边微笑的。唯有猴子才会那样。那分明是猴子的笑脸。他只不过是把丑陋的皱纹聚集在了脸上而已。照片上的他，一副奇妙的神情，显得猥琐，让人恶心，谁见了都忍不住想说“这是一个皱巴巴的小老头”。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看到过哪个孩子做出这样一种奇怪的表情。

第二张照片上的他，脸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让人不由得大吃一惊。那是一副学生的打扮。尽管很难断定是高中时代的照片，还是大学时代的照片，但他已经出落为一个相当英俊的学生了。不过有一点

让人觉得蹊跷，这张照片上的他竟然没有一点那种活生生的人的感觉。他穿着学生服，从胸前的口袋处露出白色的手绢，交叉着双腿坐在藤椅上，并且还在笑着。然而，这一次的笑容，不再是那种皱巴巴的猴子的笑，而是变成了颇为巧妙的微笑，但不知为何，总与人的笑容大相径庭，缺乏那种可以称之为鲜血的凝重或是生命的涩滞之类的充实感。那笑容不像鸟，而像羽毛一般轻飘飘的，他就那么笑着，恰似一张白纸，总之，让人觉得那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人工制品，即便把它斥之为"矫饰"，斥之为"轻薄"，斥之为"女人气"都嫌不够，称之为"喜好刀尺"就更不解气了。仔细打量的话，也会从这个英俊学生身上找到某种近似于怪诞的可怕东西。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看到过如此怪异的英俊青年。

第三张照片是最为古怪的，简直让人再也无法判定他的年龄。头上像是已经有了些许的白发。那是在某个肮脏无比的房间中的一隅（照片上清晰可见，那房间的墙壁上有三处已经剥落），他把双手伸到小小的火盆上烤火，只是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就那么坐着，把双手伸向火盆，俨然已经自然而然地死去了一般。这分明是一张弥漫着不祥气氛的照片。但奇怪的还不只这一点。照片上把他的脸拍得比较大，使我得以仔细端详那张脸的结构。额头长得很平庸，额头上的皱纹也很平庸，还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巴和下颏。哎呀，这张脸岂止是毫无表情，甚至不能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它缺乏特征，比如说，一旦我看过照片后闭上双眼。那张脸便顷刻间被我忘在了九霄云外。尽管我能回忆起那房间的墙壁以及小小的火盆等等，可对于那房间中的主人公的印象，却一下子云消雾散，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那是一张不可能成其为画面的脸，一张甚至不可能画成漫画的脸。于是我又睁开眼看了看这张照片，哦，原来是这样一张脸啊。我甚至没有那种回想起了这张脸以后的愉悦感。如果采用一种极端的说法，那么可以说，即使我睁开双眼再次端详那张照片，我也同样无法回忆起那张脸来，而只能变得越发怏怏不乐、焦躁不安，最后

索性把视线调向一边了事。

即使是所谓的“死相”，也应该再多一些表情或是印象吧？或许把驽马的脑袋硬安在人的身体之上，就会产生与此类似的感觉吧。总之，那照片无缘无故地让看的人毛骨悚然，心生厌恶。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看见过像他这样不可思议的脸。

手记之一

我过的是一种充满耻辱的生活。

对于我来说，所谓人的生活是难以捉摸的。因为我出生在东北的乡下，所以初次见到火车，还是在长大了以后的事情。我在火车站的天桥上爬上爬下，完全没有察觉到天桥的架设乃是便于人们跨越铁轨，相反认为，其复杂的结构，仅仅是为了把车站建成像外国的游乐场那样又过瘾又时髦的设施。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这么想。沿着天桥上上下下，这在我看来，毋宁说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俏皮游戏，甚至我认为，它是铁路的种种服务中最善解人意的一种。尔后，当我发现它不过是为了方便乘客跨越铁轨而架设的极其实用性的阶梯时，不由得大为扫兴。

另外，在孩提时代，我从小人书上看到地铁时，也以为它的设计并非出自于实用性的需要，而是缘于另一个好玩的目的：即比起乘坐地面上的车辆，倒是乘坐地下的车辆更显得别出心裁，趣味横生。

从幼年时代起，我就体弱多病，常常卧床不起。我总是一边躺着，一边思忖到：这些床单、枕套、被套、全都是无聊的装饰品。直到自己二十岁左右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它们都不过是一些实用品罢了。于是，我对人类的节俭不禁感到黯然神伤。

还有，我也从不知道饥肠辘辘是何等滋味。这倒并不是故意炫耀

自己生长在不愁吃穿的富贵人家。我绝不是在那样一种愚蠢而浅薄的意义上这么说的，只是我真的对“饥肠辘辘”的感觉一无所知而已。或许我这样说有点蹊跷，但是，即使我两腹空空，也真的不会有所察觉。在上小学和中学时，一旦我从学校回到家里，周围的人就会七嘴八舌地问道：“哎呀，肚子也该饿了吧，我们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呐。放学回家时的那种饥饿感，可真要人的命啦。吃点甜纳豆怎么样？家里还有蛋糕和面包哟。”而我只顾着发挥自己与生俱来的那种喜欢讨好人的禀性，一边嗫嚅着“我饿了我饿了”，一边把十粒甜纳豆一股脑儿塞进嘴巴里。正因为如此，我对所谓的“饥饿感”是何等滋味，一点也不了解。

当然，我也吃很多东西，但我不曾记得，有哪一次是因为饥饿才吃的。我吃那些看起来珍奇的东西，看起来奢华的东西。还有去别人家时，对于主人端上来的食物，我即使勉为其难也要咽下肚去。在孩提时代的我看来，最痛苦难捱的莫过于自己家吃饭的时候。

在我乡下的家中，就餐时，全家一共有十个人左右，大家各自排成两列入座。作为最小的孩子，我当然是坐在最靠边的席位上。用餐的房间有些昏暗，吃午饭时只见十几个人全都一声不响地嚼着饭粒，那情景总是让我不寒而栗。再加上这是一个古板的旧式乡下家族，所以，每顿端上饭桌的菜肴几乎都是一成不变的，不可能奢望出现什么稀奇的山珍，抑或奢华的海味，以致我对用餐的时刻充满了恐惧。我坐在那幽暗房间的末席上，因寒冷而浑身颤抖。我把饭菜一点一点地勉强塞进口中，不住地忖度着：“人为什么要一日三餐呢？大家都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吃饭，这也似乎成了一种仪式。一家老小，一日三餐，在规定的时间内聚集到一间阴暗的屋子里，井然有序地并排坐着，不管你有没有食欲，都得一声不吭地咀嚼着，还一边伛着身躯埋下头来，就像是在对着蛰居于家中的神灵们祈祷一样。”

“不吃饭就会饿死”，这句话在我的耳朵听来，无异于一种讨厌的恐吓。任这种迷信（即使到今天，我依旧觉得这是一种迷信）却总是

带给我不安与恐惧。“人因为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才不得不干活，不得不吃饭。”——在我看来，没有比这句话更晦涩难懂，更带有威吓性的言辞了。

总之，也就意味着，我对于人类的营生仍然是迷惑不解。自己的幸福观与世上所有人的幸福观风马牛不相及，这使我深感不安，并因为这种不安而每夜辗转难眠，呻吟不止，乃至精神发狂。我究竟是不是幸福呢？说实话，尽管我打幼小时起，就常常被人们称之为幸福的人，可是，我自己却总是陷入一种置身于地狱的心境中，反倒认为那些说我是一个幸福者的人比我快乐得多，我和他们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我甚至认为，自己背负着十大灾难，即使将其中的任何一个交给别人来承受，也会将他置于死地的。

反正我是弄不明白的。别人苦恼的性质和程度，都是我捉摸不透的谜。实用性的苦恼，仅仅依靠吃饭就此一笔勾销的苦恼，或许这才是最为强烈的痛苦，是惨烈得足以使我所列举的十大灾难显得无足轻重的阿鼻地狱。但我对此却一无所知。尽管如此，他们却能够不思自杀，免于疯狂，纵谈政治，竟不绝望，不屈不挠，继续与生活搏斗。他们不是并不痛苦吗？他们使自己成为一个彻底的利己主义者，并虔信那一切属于理所当然的事情，曾几何时怀疑过自己呢？这样一来，不是很轻松惬意吗？然而，所谓的人不是全都如此，并引以满足吗？我确实弄不明白……或许夜里酣然入睡，早晨就会神清气爽吧？他们在夜里都梦见了什么呢？他们一边款款而行，一边思考着什么呢？是金钱吗？绝不可能仅仅如此吧？尽管我曾听说过“人是为了吃饭而活着的”，但却从不曾听说过“人是为了金钱而活着的”。不，或许……不，就连这一点我也没法开窍。……越想越困惑，最终的下场就是被“唯有自己一个人与众不同”的不安和恐惧牢牢攫住。我与别人几乎无从交谈。该说些什么，该怎么说，我都不知道。

在此，我想到了一个招数，那就是扮演滑稽角色来逗笑。

这是我对人类最后的求爱。尽管我对人类满腹恐惧，但却怎么也没法对人类死心。并且，我依靠逗笑这一根细线保持住了与人类的一丝联系。表面上我不断地强装出笑脸，可内心里却是对人类拼死拼活地服务，命悬一线地服务，汗流浃背地服务。

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对家里人每天思考些什么，又是如何艰难地求生，不得而知。我只是对其中的隔膜心怀恐惧，不堪忍受。以至于不得不采取了扮演滑稽角色来逗笑的方式。即是说，我在不知不觉之间已变成了一个不说真话来讨好卖乖的孩子。

只要看一看当时我与家人们一起拍下的留影，就会发现：其他人都是一本正经的脸色，唯独我一个人总是莫名其妙地歪着脑袋发笑。事实上，这也是我幼稚而可悲的一种逗笑方式。

而且，无论家里人对我说什么，我都从不还嘴顶撞。他们寥寥数语的责备，在我看来就如同晴天霹雳一般，使我几近疯狂，哪里还谈得上以理相争呢？我甚至认为，那些责备之辞乃是万世不变的人间"真谛"，只是自己没有力量去实践那种"真谛"罢了，所以才无法与人们共同相处。正因为如此，我自己既不能抗争也不能辩解。一旦别人说我坏话，我就觉得像是自己误解了别人的意思一样，只能默默地承受那种攻击，可内心却感到一种近于狂乱的恐惧。

不管是谁，如果遭到别人的谴责或是怒斥，都是不会感到愉快的。但我却从人们动怒的面孔中发现了比狮子、鳄鱼、巨龙更可怕的动物本性。平常他们总是隐藏起这种本性，可一旦遇到某个时机，他们就会像那些温文尔雅地躺在草地上歇息的牛，蓦然甩动尾巴抽死肚皮上的牛虻一般，暴露出人的这种本性。见此情景，我总是不由得毛骨悚然。可一旦想到，这种本性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格之一，便只能对自身感到由衷地绝望了。

我一直对人类畏葸不已，并因这种畏葸而战栗，对作为人类一员的自我的言行也没有自信，因此只好将独自一人的懊恼深藏在胸中的小盒子里，将精神上的忧郁和过敏密闭起来，伪装成天真无邪的乐天

外表，使自己一步一步地彻底变成了一个滑稽逗笑的畸形人。

无论如何都行，只要能让他们发笑。这样一来，即使我处于人们所说的那种“生活”之外，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吧。总而言之，不能有碍他们的视线。我是“无”，是风，是空。诸如此类的想法日积月累，有增无减，我只能用滑稽的表演来逗家人们发笑，甚至在比家人更费解更可怕的男佣和女佣面前，也拼命地提供滑稽小丑的逗乐服务。

夏天，我居然在浴衣里面套上一件鲜红的毛衣，沿着走廊走来走去，惹得家里人捧腹大笑，甚至连不苟言笑的长兄也忍俊不禁：

“喂，阿叶，那种穿着不合时宜哟！”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限的爱怜。是啊，无论怎么说，我都不是那种不知冷暖，以至于会在大热天里裹着毛衣四处窜动的怪人呐。其实，我是把姐姐的绑腿缠在两只手臂上，让它们从浴衣的袖口中露出一截，以便在旁人眼里看来，我身上像是穿了一件毛衣似的。

我的父亲在东京有不少的公务，所以，他在上野的樱木町购置了一栋别墅，一个月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回到家里时，总是给家中的人，甚至包括亲戚老表们，都带回很多的礼物。这俨然是父亲的一大嗜好。某一次，在上京前夕，父亲把孩子们召集到客厅里，笑着一一问每个小孩，下次他回来时，带什么礼物才好，并且把孩子们的答复一一写在了记事本上。父亲对孩子们如此亲热，还是很罕有的事情。

“叶藏呢？”

被父亲一问，我顿时语塞了。

一旦别人问起自己想要什么，那一刹那间里反倒什么都不想要了。怎么样都行，反正不可能有什么让我快乐的东西——这种想法陡然掠过我的脑海。同时，只要是别人赠与我的东西，无论它多么不合我的口味，也是不能拒绝的。对讨厌的事不能说讨厌，而对喜欢的事呢，也是一样，如同战战兢兢地行窃一般，我只是咀嚼到一种苦涩的

滋味，因难以名状的恐惧感而痛苦挣扎。总之，我甚至缺乏力量在喜欢与厌恶之间择取其一。在我看来，多年以后，正是这种性格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造成了我自己所谓的那种“充满耻辱的生涯”。

见我一声不吭，扭扭捏捏的，父亲的脸上泛起了不快的神色，说道：

“还是要书吗？……浅草的商店街里，有一种狮子卖，就是正月里跳的狮子舞中的那一种呐。论大小嘛，正适合小孩子披在身上玩。你不想要吗？”

一旦别人问起我“你不想要吗”，我已是黔驴技穷了，再也不可能作出逗人发笑或是别的什么回答了。逗笑的滑稽演员至此早已是徒有虚名了。

“还是书好吧。”长兄一副认真的表情说道。

“是吗？”父亲一脸扫兴的神色，甚至没有记下来就“啪”的一声关上了记事本。

这是多么惨痛的失败啊！我居然惹恼了父亲。父亲的报复必定是很可怕的。眼下如果不想想办法，不是就不可挽回了吗？那天夜里，我躺在被窝里一边打着冷战，一边思忖着，然后蹑手蹑脚地站起身走向客厅。我来到父亲刚才放记事本的桌子旁边，打开抽屉取出记事本，啪啦啪啦地翻开，找到记录着礼物的那一页，用铅笔写下“狮子舞”后才又折回去睡了。对于那狮子舞中的狮子，我提不起一星半点的欲望，毋宁说倒是书还强一点。但我察觉到，父亲有意送给我那种狮子，为了迎合父亲的意志，重讨父亲的欢心，我才胆敢深夜冒险，悄悄溜进了客厅。

果然，我的这种非同寻常的手段取得了预料之中的巨大成功。不久，父亲从东京归来了。我在小孩的房间里听到父亲大声地对母亲说道：

“在商店街的玩具铺里，我打开记事本一看，嗨，上面竟然写着‘狮子舞’。那可不是我的字迹呐。那又是谁写的呢？我想来想去，总

算是猜了出来。原来是叶藏那个孩子的恶作剧哩。这小子呀，当我问他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吃吃笑着，默不作声，可事后却又想要得不得了。真是一个奇怪的孩子呐。装做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自个儿却一板一眼地写了上去。如果真是那么想要的话，直接告诉我不就得了吗？所以呀，我在玩具铺里忍不住笑了。快把叶藏给我叫来吧。"

我把男女佣人们召集到西式房间里，让其中的一个男佣胡乱地敲打着钢琴的琴键（尽管这是偏僻的乡下，可在这个家里却几乎配备了所有的家什）。我则伴随着那乱七八糟的曲调，跳起了印第安舞蹈供他们观赏，逗得众人捧腹大笑。二哥则点上镁光灯，拍摄下了我的印第安舞蹈。等照片冲洗出来一看，从我围腰布的合缝处（那围腰布不过是一块印花布的包袱皮罢了），竟露出了一个小雀雀。顿时这又引来了满堂的哄笑。或许这也可以称之为意外的成功吧。

每个月我都订购了不下十种新出版的少年杂志，此外，还从东京邮购了各种书籍，默默地阅读。所以，对麦恰拉克恰拉博士呀，还有纳贾蒙贾博士呀，我都颇为熟悉。并且，对鬼怪故事、评书相声、江户笑话之类的东西，也相当精通。因此，我能够常常一本正经地说一些滑稽的笑话，令家人们为之捧腹大笑。

然而，呜呼，学校！

在学校里我也开始受到了众人的尊敬。"受人尊敬"，这种念头本身也就令我畏葸不已。我对"受人尊敬"这一状态进行了如下的定义：近于完美无缺地蒙骗别人，尔后又被某一个全智全能之人识破真相，最终原形毕露，被迫当众出丑，以至于比死亡更难堪更困窘。即使依靠欺骗赢得了别人的尊敬，无疑也有某个人熟谙其中的真相。不久，那个人必定会告知其他的人。当人们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之后，那种愤怒和报复将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即使稍加想象，也不由得毛发竖立。

我在学校里受到众人的拥戴，与其说是因为出生于富贵人家，不如说是得益于那种俗话所说的"聪明"。我自幼体弱多病，常常休学

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曾经卧床休息过一学年。尽管如此，我还是拖着大病初愈的身子，搭乘人力车来到学校，接受了学年末的考试，殊不知比班上的所有人都考得出色。即使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也毫不用功，纵然去上学，也只是在上课时间里一直画漫画，等到下课休息时，再把它们展示给班上的同学看，说明给他们听，惹得他们哄堂大笑。而上作文课时，我尽写一些滑稽的故事，即使受到老师的提醒，也照写不误。因为我知道，其实老师正悄悄地以阅读我的滑稽故事为乐呐。有一天，我按照惯例，用特别凄凉的笔调描写了自己某一次丢人现眼的经历。那是在我跟随母亲去东京的途中，我把火车车厢里通道上的痰盂当成了尿壶，把尿撒在了里面（事实上，在去东京时，我并不是不知道那是痰盂才出的丑。而是为了炫耀小孩子的天真无知，故意那么做的）。我深信，这样的写法肯定能逗得老师发笑。所以就轻手轻脚地跟踪在走向教员休息室的老师背后。只见老师一出教室，就随即从班上同学的作文中挑选出我的作文，一边走过走廊，一边开始读了起来。他“哧哧”地偷偷笑着，不久便走进了教员休息室。或许是已经读完了吧，只见他满脸通红大声笑着，劝其他老师也立刻浏览一遍。见此情景，我不由得心满意足。

淘气鬼的恶作剧。

我成功地让别人把这视为“仅仅是一个淘气鬼的恶作剧罢了”。我成功地从受人尊敬的恐惧中逃离了出来。成绩单上所有的学科都是十分，唯有品行这一项要么是七分，要么是六分，这也成了家里人的笑料之一。

事实上，我与那种淘气鬼的恶作剧在本质上是恰恰相悖的。那时，我被男女佣人教唆着做出了可悲的丑事。事到如今我认为，对年幼者干出那种事情，无疑是人类所能犯下的罪孽中最丑恶最卑劣的行径。但我还是忍受了这一切，并萌生了一种感觉，仿佛由此而发现了人类的另一种特质似的。我只能软弱地苦笑。如果我有那种诉说真相的习惯，那么，或许我就能够毫不胆怯地向父母控诉他们的罪行吧，

可是，我却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可能完全了解。我一点也不指望那种“诉诸于人”的手段。无论是诉诸于父亲，还是母亲，也不管是诉诸于警察，抑或是政府，最终难道不是照样被那些深谙世故之人的强词夺理击败了吗？

不公平现象是必然存在的，这一点是明摆着的事实。本来诉诸于人就是徒劳无益的。所以我依旧对真实的事情一言不发，默默忍耐着除了继续扮演滑稽角色进行逗笑之外已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嘲笑道：“什么，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不信任吗？嘿，你几时当上了基督教徒？”事实上在我看来，对人类的不信任，并不一定与宗教之路直接相通。包括那些嘲笑我的人在内，难道人们不都是在相互怀疑之中，将耶和华和别的一切抛在脑后，若无其事地活着的吗？记得是在自己幼小时发生的事情。当时，父亲所属的那个政党的一位名流来到我们镇上发表演说，于是男佣人带着我去剧场听讲。听讲的人密密匝匝地挤在那里，我看见了镇上所有与父亲关系密切的人们的面孔。这使我兴奋不已。演讲结束后，听众们三五成群地沿着雪夜的道路踏上了归途，信口开河地议论着演讲会的不是，其中还掺杂着一个和父亲过从甚密的人的声音。那些所谓的“同志们”用近于愤怒的声调大肆品头论足，说什么我父亲的开场白拙劣无比，那位名人的演讲让人云里雾里，不得要领等等。更可气的是，那帮人居然顺道拐入我家，走进了客厅，脸上一副由衷的喜悦表情，对父亲说，今晚的演讲会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甚至当母亲向男佣们问起今晚的演讲会如何时，他们也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真是太有趣了。”而正是这些男佣们刚才还在回家的途中叹息着说道：“没有比演讲会更无聊的了。”

而这仅仅是其中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相互欺骗，却又令人惊奇地不受到任何伤害，甚至于就好像没有察觉到彼此在欺骗似的，这种不加掩饰从而显得清冽、豁达的互不信任的例子，在人类生活中比比皆是。不过，我对相互欺骗这类事情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就连我自己

也是一样，依靠扮演滑稽角色来整天欺骗人们。对于那种教科书式的正义呀、道德之类的东西，我不可能抱有太大的兴趣。在我看来，倒是那些彼此欺骗，却清冽而开朗地生存着，抑或是有信心清冽而开朗地生活下去的人，才是令人费解的。人们最终也没有教给我其中的妙谛。或许如果明白了那些妙谛，我就不必再这么畏惧人类，并且不必拼命地提供逗笑服务了吧。或许也就犯不着再与人们的生活相对立从而体验那种每个夜晚的地狱所带来的痛楚了吧。总之，我没有向任何人控诉那些男女佣人们所犯下的可恨罪愆，并不是出于我对人类的不信任，当然更不是缘于基督教的影响，而是因为人们对我这个名叫叶藏的人关闭了信誉的外壳之缘故。因为就连父母也不时向我展示出他们令人费解的部分。

然而，众多的女性却依靠本能，嗅出了我无法诉诸于任何人的那种孤独的气息，以至于多年以后，这成了我被女人们乘虚而入的种种诱因之一。

即是说，在女人眼里，我是一个能够保守恋爱秘密的男人。

手记之二

在海岸边被海水侵蚀而成的汀线附近，并排屹立着二十多棵伟岸粗大的山樱树。这些树皮呈黑色的山樱树，每到新学年伊始，便与浓艳的褐色嫩叶一起，在蓝色大海的背景映衬下，绽放出格外绚丽的花朵。不久，待等落英缤纷的时节，无数的花瓣便会纷纷落入大海，在海面上随波漂荡，然后又被浪涛冲回到海岸边。东北地区的某所中学，正是在这长着樱树的沙滩上就势建起了学校的校园。尽管我并没有好好用功备考，却也总算顺利地考进了这所中学。无论是这所中学校帽上的徽章，还是校服上的纽扣，都缀着盛开的樱花图案。

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就住在那所中学的附近。也正因为这个原因，父亲为我选择了那所面对大海和开满樱花的中学。我被父亲寄养在那个亲戚家里，因为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总是在听到学校敲响朝会的钟声之后，才飞快地奔向学校。我就是这样一个懒惰的中学生，但我却依靠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日益受到了同学的欢迎。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远走他乡，但在我眼里，陌生的他乡，比起自己出生的故乡，是一个更让我心旷神怡的环境。这也许是因为我当时已把逗笑的本领掌握得天衣无缝，以至于在欺骗他人时显得更加轻松自如的缘故。当然，做这样的解释又何尝不可，但是，更为致命的原因分明还在于另一点：面对亲人还是面对陌生人，身在故乡还是身在

他乡，其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演技上的难度差异。而且这种难度差异无论对哪一位天才而言——即便是对于神灵之子耶稣而言——不也都同样存在吗？在演员看来，最难进行表演的场所莫过于故乡的剧场。如果是在五亲六戚聚集一堂的房间里，再有名的演员恐怕也会黔驴技穷吧。然而我却在那里一直进行了表演，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所以像我这样的老油子，来到他乡进行表演，必然是万无一失的。

我对人的恐惧与先前相比，倒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我的内心深处剧烈地蠕动着，而我的演技却在日渐长进。我常常在教室里逗得同班同学哄然大笑，连老师也不得不一边在嘴上感叹着“这个班要是没有大庭，该是一个多好的集体啊”，一边却用手掩面而笑。我甚至还能够轻而易举地让那些惯于发出雷鸣般厉声的驻校军官也扑哧大笑。

当我正要开始为自己彻底掩盖了本人的真实面目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却出乎意料地被人戳了背脊骨。那个戳了我背脊骨的人，竟然是班上身体最为羸弱、面色铁青而且浮肿的家伙。他身上的衣服让人觉得像是父兄留给他的破烂货，其过于长大的衣袖恍若圣德太子①的衣袖一般。他的功课更是一塌糊涂，在军事训练和体操课时，总是像一个在旁边见习的白痴似的，就连一贯小心翼翼的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有提防他的必要。

一天上体操课的时候，那个学生（他的姓氏我早已忘了，只记得名字叫竹一），也就是那个竹一，照旧在一旁见习，而我们却被老师吩咐着进行单杠练习。我故意尽可能做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哎——”地大叫一声，朝着单杠飞身一跃，就像是跳远那样向前猛扑过去，结果一屁股摔在了沙地上。这纯属是一次事先预谋好的失败。果然成了众人捧腹大笑的引子。我也一边苦笑着，一边爬将起来，撢掉裤子上

① 圣德太子（574—622），日本古代著名政治家，对日本文化、宗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的沙粒。这时，那个竹一不知何时已来到了我旁边，捅了捅我的后背，低声咕哝道：

“故意的，故意的。”

我感到一阵震惊，做梦也没有想到，竹一竟然识破了我故意失败的真相。我仿佛看见世界在一刹那间里被地狱之火裹挟着，在我眼前熊熊燃烧起来。我“哇”地大叫着，使出全身的力量来遏制住近于疯狂的心绪。

那以后，我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与恐惧之中。

尽管我表面上依旧扮演着可悲的滑稽角色来博得众人的发笑，但有时候却也情不自禁地发出重重的叹息。无论我干什么，都肯定会被竹一彻底识破真相，并且他还会很快向每个人透露这一秘密———想到这儿，我的额头上就会直冒汗珠，像是狂人一般用奇怪的眼神审视着四周。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巴不得从早到晚二十四小时一直跟踪监视竹一，以免他随口泄露了秘密。而且就在我纠缠着他不放的时候，为了让他觉得我的滑稽行为并不是所谓的“故意之举”，而是货真价实的东西，我真可谓殚思竭虑，倾注了所有的努力。我甚至打定主意，希望一切顺利的话，成为他独一无二的密友。倘若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话，那我便只能祈盼他的死亡。但我却怎么也无法萌生杀死他的念头。在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我曾经无数次祈望过自己被人杀死，却从来也没有动过杀死别人的念头。这是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只会给可怕的对手带来幸福的缘故。

为了使他驯服就范，我首先在脸上堆满伪基督徒式的“善意”的微笑，将脑袋向左倾斜三十度左右，轻轻地搂抱住他瘦小的肩膀，用嗲声嗲气的肉麻腔调，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我寄宿的亲戚家中去玩，但他却总是一副发呆的眼神，闷声不响着。不过，一个放学之后的傍晚（我记得是在初夏时节），天上陡然下起了骤雨，学生们都为如何回家大伤脑筋。因为我的亲戚家离学校很近，所以我正要无所畏惧地飞身外出，这时，我猛然看见了竹一，他正满脸颓丧地站在门口木屐

箱的后面。“走吧，我把伞借给你。”我说道，一把拽住怯生生的竹一的手，一起在骤雨中飞跑起来。到家以后，我请婶婶替我们俩烘干淋湿的衣服，在此期间我把竹一领到了自己在二楼上的房间里。我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我的这个亲戚家是一个三口之家，有一个年过五十的婶婶，一个三十岁左右、戴着眼镜、体弱多病的高个子表姐（她曾经出嫁过一次，后来又回到娘家来了。我也学着这个家里其他人的样子，管她叫“阿姐”），和一个最近才从女子学校毕业，名叫“雪子”的表妹。她和姐姐大不相同，个头很小，长着一张圆脸。楼下的店铺里，只陈列着少量的文具和运动用品等等，其主要的收入似乎来源于过世的主人所留下的那五六排房屋的房租。

“我耳朵可疼呐。”竹一就那么一直站着说话。

“可能是雨水灌进耳朵才发疼的吧。”

我一看，只见他的两只耳朵都害了严重的耳漏病，眼看着脓水就要流到耳朵的外面了。

“这怎么行呢？很疼吧？”我有些夸张地流露出惊诧的神色，“大雨中把你拽出来，害你落得这个样子，真是对不起你。”

我用那种近于女人腔的“温柔”语调向他道歉道，然后到楼下拿来棉花和酒精，让竹一的头枕在我的膝盖上，体贴入微地给他清理耳朵。就连竹一好像也没有察觉到这是一种伪善的诡计。

“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竹一头枕着我的膝盖，说了一句愚蠢的奉承话。

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的这句话就像是恶魔的预言一样，其可怕的程度是竹一也没有意识到的。什么“迷恋”、“被迷恋”，这些措辞本身就是粗俗不堪而又戏弄人的说法，给人一种装腔作势的感觉。无论是多么“严肃”的场合，只要让这些词语抛头露面，那么，忧郁的伽蓝就会顷刻间分崩离析，变得索然无味。但如果不是使用“被迷恋上的烦恼”之类的俗语，而是使用“被爱的不安”等文学术语，似

乎就不至于破坏忧郁的伽蓝了。想来可真是奇妙无比。

我给竹一揩拭耳朵里的脓血时，他说了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的奉承话，当时，我听了之后，只是满脸通红地笑着，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可实际上我私下里也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然而，对于“被迷恋”这样一种粗俗的说法所产生的装腔作势的氛围，我竟然说他的话不无道理，无异于愚昧地表述自己的感想，其糊涂的程度甚至远远超过相声里的傻少爷的台词。事实上，我是绝不会以那种戏谑的、装腔作势的心情来“认为他的话不无道理”的。

在我看来，人世间的女性不知比男性要费解多少倍。在我们家里，女性的数量是男性的好多倍，而且在亲戚家中也是女孩子居多，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些“犯罪”的女佣人。我想甚至可以说，自幼时起，我便几乎是在女人堆中长大的。尽管如此，我却一直是怀着如履薄冰的心情与女人们打交道的。我对她们一无所知，如同坠入云里雾中似的，不时遭受惨重的失败。这种失败与从男性那儿受到的鞭笞截然不同，恍若内出血一般引人不快，具毒性攻心，难以治愈。

女人有时和你形影不离，有时又对你弃之不理。当着众人的面她蔑视我，羞辱我，而一旦背着大家，她又拼命地搂紧我。女人的睡眠酣甜得宛若死去了一般，甚至让人怀疑她们是否是为了酣然入眠才存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我从幼年时代起就对女人进行了种种观察，尽管同属于人类，可女人却分明是一种与男人迥然相异的生物。而就是这种不可理喻、需要警惕的生物，竟出人意料地呵护着我。无论是“被迷恋”的说法，还是“被喜欢”的说法，都完全不适用于我，或许倒是“受到呵护”这一说法更贴近于我的实际情况。

在对待滑稽的逗笑上，女人似乎比男人更显得游刃有余。当我扮演滑稽角色进行逗笑时，男人们从不会哈哈大笑。而且我也知道，如果自己在男人面前搞笑时随着兴致得意忘形的话，肯定会招致失败的，所以总是惦记着在恰到好处时中止表演。可女人却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适可而止”，总是无休无止地缠着我要我继续搞笑。为了满

足她们那毫无节制的要求，我累得精疲力竭。事实上她们确实能笑。女人似乎能够比男人更贪婪地吞噬快乐。

在我中学时代寄宿的亲戚家中，一旦表姐表妹闲下来，总爱跑到我二楼上的房间里来，每次都吓得我差一点跳将起来。

“你在用功吗？”

“不，没有呐，”我胆战心惊地微笑着，合上书本说道，“今天啦，学校里一个名叫‘棍棒’的地理老师，他……”

从我嘴里进出的都是一些言不由衷的笑话。

“阿叶，把眼镜戴上给我们看看！”

一天晚上，表妹雪子和表姐一起来到我房间来玩。在我被迫进行了大量的搞笑之后，她们冷不防提出了戴眼镜给她们看看的要求。

“干吗？”

“甭管了，快戴上看看吧。把阿姐的眼镜借来戴戴看！”

平常她总是用这种粗暴的命令口吻对我说话。于是，我这个滑稽小丑老老实实地戴上了表姐的眼镜。刹那间两个姑娘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一模一样！和劳埃德[①]简直是一模一样！”

当时，哈罗德·劳埃德作为一名外国喜剧电影演员，在日本正风靡一时。

我站起身，举起一只手说道：

“诸位，此番我特向日本的影迷们……”

我尝试着模仿劳埃德的样子作了一番致辞，这更是惹得她们捧腹大笑。那以后，每当劳埃德的电影在这个镇上上演，我都是每部必看，私下里琢磨他的表情举止。

一个秋日的夜晚，我正躺着看书。这时，表姐像一只鸟儿似的飞快跑进我的房间，猛地倒在我的被子上啜泣起来。

---

① 劳埃德（1893—1971），美国电影喜剧演员。代表作有《只不过有点神经病》、《安全放在最后》等。

"阿叶，你肯定会救我的，对吧。这种家，我们还是一起出走的好，对不？救救我，救救我。"

她嘴里念叨着这些怪吓唬人的话，还一个劲儿地抽噎着。不过，我并不是第一次目睹女人的这种模样，所以，对表姐的夸张言辞并不感到惊讶，相反，倒是对她那些话的陈腐和空洞感到格外的扫兴。于是，我悄悄地从被窝中抽身起来，把桌子上的柿子剥开，递给了表姐一块。只见表姐一边啜泣着，一边吃起柿子来了。

"有什么好看的书没有？借给我看看吧。"她说道。

我从书架上给她挑选了一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

"谢谢你的款待。"

表姐有些害羞地笑着，走出了房间。其实不光是表姐，还有所有的女人，她们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活着的呢？思考这种事情，对于我来说，甚至比揣摩蚯蚓的想法还要棘手和费事，更让人产生一种阴森可怖的感觉。不过，唯有一点是我依靠幼时的经验而明白的：当女人像那样突然哭诉起来时，只要递给她什么好吃的食物，她就会吃起来，并因此而改变心境。

表妹雪子有时甚至会把她的朋友也带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按照惯例，公平地逗大家发笑。等朋友们离去之后，雪子必定会对朋友的不是大肆数落一番。诸如"她是一个不良少女，你可得当心呐"之类的。倘若果真如此，不是用不着特意带到这里来吗？也多亏了雪子，我房间的来客几乎全都是女性。

不过，竹一所说的那句"你呀，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的奉承话，却绝对没能兑现。总之，我不过是日本东北地区的哈罗德·劳埃德罢了。竹一那句愚蠢的奉承话，作为可憎的预言，活生生地呈现出不祥的兆头，还是在那以后过去了很多年的事情。

竹一还赠送给了我另一个重大的礼物。

"这是妖怪的画像呐。"

曾几何时当竹一到我楼上的房间来玩时，得意洋洋地拿出一张

原色版的卷头画给我看，并这样说道。

“哎?!”我大吃一惊。多年以后我才清醒地意识到：就是在那一瞬间里，我未来的道路被彻底改变了。我知道，其实那不过是凡·高的自画像而已。在我们的少年时代，所谓法国印象派的绘画正广为流行，大都是从印象派的绘画开始学习鉴赏西洋绘画的，所以，一提起凡·高、高庚、塞尚、雷诺阿等人的画，即使是穷乡僻壤的中学生，也大都见到过它们的照相版，凡·高的原色版绘画我也见过不少，对其笔法的有趣和色彩的鲜艳颇感兴趣，但却从来没有想过，他的自画像是什么妖怪的画像。

“那这种画又怎么样呢？也像妖怪吗?”

我从书架上取下莫迪里阿尼①的画册，把其中一幅古铜色肌肤的裸体妇人画像拿给竹一看。

“这可了不得呀。”竹一瞪圆了眼睛感叹道。

“就像一匹地狱之马呐。”

“不，还是像妖怪吧。”

“我也想画一画这种妖怪呐。”

对人感到过分恐惧的人，反倒更加迫切地希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到更加可怕的妖怪；越是容易对事物感到胆怯的神经质的人，就越是渴望暴风雨降临得更加猛烈……啊，这一群画家被妖怪所伤害所恫吓，以至于最终相信了幻影，在白昼的自然之中栩栩如生地目睹了妖怪的存在。而且，他们并没有使用“滑稽的逗笑”来掩饰自身的恐惧，而是致力于原封不动表现自己的所见。正如竹一所说的那样，他们勇敢地描绘出了“妖怪的画像”。原来，在这里竟然存在着未来的我的同伴，这使我兴奋得热泪盈眶。

“我也要画，画那种妖怪的画像，画那种地狱之马。”我压低嗓音

---

①莫迪里阿尼（1884—1920）出生于意大利，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巴黎画派的重要画家。

对竹一说道。

我从小学时代起就喜欢上了画画和看画。但我画的画不像我写的作文那样受到周围人的交口称赞。因为我压根儿就对人类的语言毫不信任，所以，作文在我眼里就如同搞笑的寒暄语一般。尽管我的作文在小学和中学都逗得老师们前仰后合，但我自己却并不觉得有趣。只有绘画（漫画等则另当别论）让我在如何表现其对象上殚思竭虑，尽管这种殚思竭虑采用的是我自己的一套独特方式。学校绘画课的画帖实在无聊透顶，而老师的画又拙劣无比，所以我不得不靠自己来摸索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进入中学以后，我已经拥有了一套油画的画具，尽管我试图从印象派的画风中寻找出绘画技巧的范本，可自己画出的东西却俨然像儿童手工做的彩色印花纸一般呆滞乏味，不成样子。不过，竹一的一句话却启发了我，使我意识到自己以前对绘画的看法是完全谬误的，它表现在竭力想把觉得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为美的幼稚和愚蠢上。而绘画大师们利用主观的力量，对那些平淡无奇的东西加以美的创造，虽说他们对丑恶的东西感到恶心呕吐，却并不隐瞒自己对它们的兴趣，从而沉浸在表现的愉悦之中。换言之，他们丝毫也不为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我从竹一那儿获得了这种画法的原始秘诀。于是，我瞒着那些女性来客，开始着手制作自画像了。

一幅阴惨的画诞生了，甚至让我自己都大为震惊。可这就是隐匿在内心深处的自己的真实面目。表面上我在快活地欢笑，并引发人们的欢笑，可事实上，我却背负着如此阴郁的心灵。“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好暗自肯定现状。但那幅画除了竹一之外，我没有给任何人看过。我不愿被人看穿自己逗笑背后的凄凉，也不愿别人突然之间开始小心翼翼地提防起我来，我担心他们甚至没有发现这便是我的本来面目，而依旧视为一种新近发明的搞笑方式，从而把它当做一大笑料。这是最让我痛苦难堪的事情，所以，我立刻把那幅画藏进了抽屉的深处。

在学校的绘画课上，我也收敛起了那种“妖怪式画法”，而使用

先前那种将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描绘成美的东西的平庸技法。

以前我便一直只是在竹一面前才若无其事地展示出自己动辄受伤的神经，因此，这一次的自画像也放心大胆地拿给了竹一看，结果竟然得到了他的啧啧称赞。于是，我又接连不断地画了第二张、第三张妖怪的画像。竹一又送给了我另一个预言：

“你呀，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呐。”

“肯定会被女人迷恋上”的预言与“肯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画家”的预言，是傻瓜竹一在我的额头上镌刻下的两种预言。随后不久，我便来到了东京。

我本来想进美术学校，但父亲对我说，早就打定了主意让我上高中，以便将来做官从政，所以，作为一个天生就不敢跟大人顶嘴的人，我只好茫然地遵从父命。父亲让我从四年级开始考东京的高中，而我自己也对濒临大海和满是樱花的中学感到了厌倦，所以不等升入五年级，在四年学业结束之后便考入了东京的高中，开始了学生宿舍的生活。对宿舍的肮脏和粗暴我不胜畏葸，哪里还顾得上扮演丑角逗笑。我请医生开了张“肺浸润”的诊断书，搬出了学生宿舍，移居到上野樱木町父亲的别墅里。我根本无法过那种所谓的集体生活，什么青春的感动，什么年轻人的骄傲等等之类的豪言壮语，只会在我的耳朵里唤起一阵凛冽的寒气，使我与那种“高中生的蓬勃朝气”格格不入。我甚至觉得，不管教室，还是宿舍，都无非是被扭曲了的性欲的垃圾堆而已。我那近于完美无缺的逗笑本领在这里没有用武之地。

父亲在议会休会时，每个月只在别墅里待上一周或两周，所以，当父亲不在时，这栋庞大的建筑物中便只剩下了作为别墅管家的一对年迈夫妇和我三个人。我时常逃学，也没心思去游览东京（看来，我最终也看不成明治神宫、楠木正成[1]的铜像、泉岳寺的四十七志士之墓了），成天闷在家里读书画画。等父亲上东京之后，我每天早晨都

① 日本南北朝时期的武将。

匆匆地奔赴学校，但有时去的却是本乡千驮木町的西洋画画家安田新太郎的画塾，在那里连续三四个小时进行素描练习。一旦从高中的学生宿舍搬了出来，即使我坐在学校的课堂上听讲，也会有一种颇为败兴的感觉，仿佛自己是处在旁听生的那种特殊位置上似的。尽管这或许只是自己的一种偏见，但却使我更加害怕去学校了。在我看来，通过小学、中学、高中，我最终也没有能够懂得所谓的爱校之心是什么东西，我甚至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要去记住学校的校歌。

不久，在画塾里，我从一个学画的学生那儿得知了诸如酒、香烟、娼妓、当铺以及左翼思想之类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摆在一起，是一种奇妙的组合，但却是事实。

那个学画的学生名叫堀木正雄，出生在东京的庶民居住区，比我年长六岁，从私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因家里没有画室，才上这所画塾来继续学习西洋画的。

“能借我五元钱吗?”

在此之前，只是打过照面而已，还从没有说过话。所以我有些张皇失措地掏出了五元钱。

“走啊，喝酒去吧。我请你喝。你这个象姑。”

我无法拒绝他，被他拽进了画塾附近蓬莱町的酒馆中。而这就是我与他交往的开始。

“我早就注意到你了。瞧，你那种腼腆的微笑，正好是大有前途的艺术家所特有的表情呐。为了纪念我们的相识，干一杯吧。——阿绢，这家伙该算得上是个美男子吧。你可不要被他迷住了哟。自从这小子来了画塾之后，害得我降格成了第二号美男子呐。”

堀木长着一张黝黑的端庄面孔，身上穿着一套整齐的西装，脖子上系着一根素雅的领带，这种装束在学画的学生中是颇为罕见的。他的头发还抹了发油，从正中间齐齐整整地向两边分开着。

身处在酒馆这样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我心中只有恐惧。我局促地把两只胳膊一忽儿抱紧，一忽儿松开，露出一脸腼腆的微笑。可

就在两三杯啤酒落肚之后，我却感到了一种奇妙的、获得了解放似的轻松。

“我曾琢磨着想进美术学校呐，可是……”

“哎呀，可没劲儿呐，那种地方真是没劲儿透了！我们的老师乃是存在于自然之中！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激情之中！”

但我对他所说的东西却没有感到半点的敬意，只是暗自思忖到：这是个蠢货！他的画必定蹩脚透顶，但作为一个玩耍的伙伴，或许倒是最好的人选。这时，我才生平第一次见识了什么是真资格的都市痞子。尽管与我表现形式大相径庭，但在彻底游离于人世的营生之外、迷惘而徬徨这一点上，毕竟属于同类。而且，他是在无意识之中实施着逗笑的丑角行为，并全然没有觉察到这种丑角行为的悲惨。而这正是他与我在本质上迥然相异的地方。

仅仅是在一块玩玩，仅仅是把他当做玩的伙伴来交往——我总是这样蔑视他，耻于与他交往。但在与他结伴而行的过程中，我自己却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最初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大好人，一个难得的大好人。就连对人感到恐惧的我，也彻底放松了警惕性，以为找到了一个领着我见识东京的好向导。说实话，我这个人要是去乘坐电车吧，就会对售票员犯怵；要是想进歌舞伎剧场去瞧瞧吧，一看见大门口并排伫立在铺着红色地毯的阶梯两侧的引路小姐，就又会顿生畏惧；要是进餐馆吧，一瞥见悄悄站在自己身后等着收拾盘子的侍应生，就又会胆战心惊。天哪，特别是付钱的时候，我那双颤颤巍巍的手！还有在买了东西之后，把钱递给对方时，不是因为吝啬小气，而是因为过度的紧张、过度的害臊、过度的不安与恐怖，只觉得自己头昏眼花，世界蓦然变得漆黑一团，以至于我的心几乎处在了半疯狂的状态，哪里还顾得上讨价还价，有时甚至忘记了接过找零钱，抑或拿走买下的商品。我根本无法独自一人在东京街头上漫步，只好整日蜷缩在家中打发光阴。

可一旦把钱包交给堀木再一起去逛街，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只见

堀木大肆砍价杀价，俨然是玩耍的行家，使极少的钱发挥出最大的功效。而且，他对街头昂贵的出租汽车一概敬而远之，因地制宜地乘坐电车、公共汽车，抑或小型汽艇，表现出一种利用最短的时间来抵达目的地的本领。他还对我实施现场示范教育，比如清晨从妓女那儿回家的途中，顺路拐到某个旅馆，泡一个晨澡后，再一边吃豆腐汤锅，一边喝少量的酒，这不仅便宜划算，还显得阔气奢华。他还告诉我，摊贩卖的牛肉盖浇饭和烤鸡肉串不仅价钱便宜而且富于营养。他还满有把握地断言道，在所有的酒中间，要数白兰地的酒劲儿上来得最快最猛。在结账买单时，他从来也没有让我感到一星半点的不安和畏惧。

和堀木交往的另一大好处在于：堀木完全无视谈话对方的想法，只顾自己听凭所谓激情的驱使（或许所谓的“激情”，就是要无视对方的立场），成天到晚地絮叨着种种无聊的话题，所以，完全用不着担心我们俩在逛街疲倦了之后会陷入尴尬的沉默之中。在与人交往时，我最介意的，就是唯恐出现那种可怕的沉默局面，所以，天生嘴笨的我才会拼命地扮演丑角以渡过难关。然而。眼前这个傻瓜堀木却无意中主动担当起了那种逗笑的滑稽角色，所以，我才能够对他的话置若罔闻，毋需多加搭理，只要适时地插科打诨便足以应付了。

不久，我也渐渐地明白了：酒、香烟和妓女，是能够帮助人暂时忘却人的可怕性的绝妙手段。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想法：为了寻求这些手段，我甚至可以不惜变卖自己的所有家当。

在我眼里，妓女这个种类，既不是人，也不是女性，倒像是白痴或者狂人。在她们的怀抱里，我反而能够高枕无忧，安然成眠。她们没有一丁点儿的欲望，简直达到了令人悲哀的地步。或许是从我这里发现了一种同类的亲近感吧，那些妓女常常向我表示出自然天成的好意，而从不让人感到局促不安。毫无算计之心的好意，绝无勉强之嫌的好意，对萍水相逢之人的好意，使我在漫漫黑夜之中，从白痴或狂人式的妓女们那儿，真切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的神圣光环。

为了摆脱对人的恐惧，获得一夜之间的休憩，我前往她们那里。可就在与那些属于自己“同类”的妓女玩乐的过程中，一种无意识的讨厌氛围开始不知不觉地弥漫在四周，这就是连我自己也全然没有设想到的那种所谓“添加的附录”。渐渐地那“附录”鲜明地凸现到表面之上，以至于被堀木点穿了其中的玄机。我不禁在愕然之余，深感厌恶。在旁人看来，如果说得通俗一点，我是在通过妓女进行有关女人方面的修炼，并且有显著的长进。据说，通过妓女来磨炼与女人交往的本领，是最为严厉也最富有成效的。我的身上早已漂漾着一种“风月场上的老手”的气息，女人们（不仅仅限于妓女）凭借本能嗅到了这种气息，并趋之若骛。人们竟把这种猥亵的、极不光彩的氛围当做了我“添加的附录”，以至于它比我试图获得休憩的本意显得更加醒目。

或许堀木是半带奉承地说出那番话的，但却大有不幸而言中的势头。比如说，我就曾经收到过酒馆女人写给我的稚拙的情书；还有樱木町邻居将军家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会在每天早晨专挑我上学的时间，无事可做，却故意略施粉黛踯躅于自己家的门前；还有当我去吃牛肉饭时，即使我一言不发，那儿的女佣也会……；还有我经常光顾的那家香烟铺子的小姑娘，在递给我的烟盒中竟然也……还有，在去观赏歌舞伎时，那个邻座的女人……还有，当我在深夜的市营电车上因酩酊大醉而酣然入睡之时……还有，从乡下亲戚家的姑娘那儿出乎意料地寄来了缱绻缠绵的相思信件……还有，某个不知何许人也的姑娘，在我外出时留给我一个手工制作的偶人……由于我相当消极退避，所以，每一次的罗曼史都是蜻蜓点水，停留于一些残缺的断片，没有任何更大的进展。但是，有一点却并非信口雌黄的无稽之谈，而具有不可否定的真实性，即在我身上的某个地方萦绕着某种可以供女人做梦的氛围。当这一点被堀木那样的家伙点破时，我感到一种近于屈辱的痛苦，同时，我对妓女的兴趣也倏然间随之消失了。

堀木出于爱慕虚荣和追赶时髦的心理（至今我也认为，除此之

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别的理由了），某一天带着我去参加了一个叫做共产主义读书会的秘密研究会（大概是叫 R·S 吧，可我已记不清了）。也许对堀木这样的人来说，出席共产主义的秘密集会，也只是他领着我“游览东京”的一环罢了。我被介绍给那些所谓的“同志”，还被迫买下了一本宣传册子，听坐在上席的那个长相丑陋的青年讲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然而，那一切在我看来，却是再明白不过的内容了。或许他的确言之有理，但在人的内心深处，分明存在着一种更加难以言喻的东西。称之为“欲望”吧，又觉得言不尽意，谓之曰“虚荣心”吧，也觉得语不及义，即使统称为“色情与欲望”，也仍旧词不达意。总之，尽管我也是云里雾里，但我总认为，在人世的底层毕竟存在着某种绝不单纯是经济的、近于怪诞式的东西。我是一个对那种怪诞式的东西极端害怕的人，所以，尽管我对唯物论，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而然地加以肯定，但却不能仰仗着它来摆脱对人的恐惧，从而放眼绿叶感受到希望的喜悦。不过，我却从不缺席地参加 R·S（仅凭记忆，可能有误）。“同志”们俨然大事临头似的，紧绷着面孔，沉浸在诸如“一加一等于二”之类的初等算数式的理论研究中。见此情景，我觉得滑稽透顶，于是，利用自己惯用的逗笑本领，以活跃集会上的气氛。或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渐渐地研究会上那种拘谨古板的氛围被缓解了，以至于我成了那个集会上不可或缺的宠儿，这些貌似单纯的人们认为我和他们一样单纯，甚至把我看成一个乐观而诙谐的“同志”。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我便是从头到尾地彻底欺骗了他们。我并不是他们的“同志”。但我却每次必到，为大家奉献出作为“丑角”的逗笑服务。

这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喜欢他们。但这并不一定就可以归结为依靠马克思主义而建立起来的亲密感。

不合法。这带给了我小小的乐趣，不，毋宁说使我心旷神怡。其实，倒是世上称之为“合法”的那些东西才更加可怕（对此我预感到某种无比强烈的东西）。其中的复杂构造更是不可理喻。我不可能死

守在一个没有门窗的寒冷房间里，即便外面是一片不合法的大海，我也要纵身跳将进去。哪怕是马上死去，我也心甘情愿。

有一个说法叫做“见不得人的人”。它指的是那些人世间悲惨的败北者、背德者。我觉得自己打一出生便是一个“见不得人的人”，所以一旦遇到那些被世人斥之为“见不得人的人”，我的心就不由分说地变得善良温柔了。而且我的“温柔”足以使我自己也如痴如醉。

还有一种说法叫做“狂人意识”。身在这个世上，我一生都被这种意识所折磨，但它却又是我休戚与共的糟糠之妻。和它厮守在一起，进行凄寂的游戏，已构成了我生存方式的一种。俗话里还有一种说法叫做“腿上有伤痕，没脸来见人”。当我还在襁褓中时，我的伤痕便已赫然出现在我的一只腿上，随着长大成人，非但没有治愈，反而日渐加剧，甚至扩展到了骨髓深处。每夜的痛苦就如同千变万化的地狱，但是（说来也怪），那伤口却逐渐变得比自己的血肉还要亲密无间。伤口的疼痛，在我看来就仿佛是伤痕活生生的情感，抑或爱情的呢喃一般。对我这样的男人来说，地下运动小组的那种氛围显得出奇地令人安心和惬意。总之，与其说是那运动本身的目的，不如说是那运动的外壳更适合于我。堀木仅仅是出于闹着好玩的心理，把我带到那个集会上向大家介绍了我。其实他也就只去过那一次。他曾说过一句拙劣的俏皮话：“马克思主义者在研究生产这一方面的同时，也有必要观察消费这一方面嘛。”所以他不去参加集会，倒是一门心思想着拽住我到外面去考察消费状况。回想起来，当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像堀木那样出于爱慕虚荣、追赶时髦的心理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有像我一样仅仅因为喜欢那种“不合法”的氛围，便一头扎入其中的人。倘若我们的真实面目被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信徒识破的话，那么，无论是堀木还是我自己，都无疑会遭到他们的愤怒斥责，并作为卑劣的叛徒而受到驱逐吧。但我和堀木却没有遭受开除的处分，特别是我在那不合法的世界中，居然比在绅士们的合法世界中更显得悠然自得和游刃有余，更显得所谓的“健康”，以至于

作为前途无量的“同志”，被委派了种种工作。他们夸张地给那些工作披上一层过于神秘的色彩，真让人忍俊不禁。事实上，我一次也没有拒绝过那些工作，泰然自若地接受了那一切，从不曾因为举止反常而受到“狗”（同志们都这样称呼警察）的怀疑或审讯。我总是一边逗人发笑，一边准确无误地完成他们所谓的“危险”任务（那帮从事运动的家伙常常是如临大敌一般地高度紧张，甚至蹩脚地模仿侦探小说，显得过分警惕。他们交给我的任务全都是一些无聊透顶的东西，可是，却煞有介事地制造出紧张的气氛）。就我当时的心情而言，成为共产党员而遭到逮捕，即使终生身陷囹圄，也绝不反悔。我甚至认为，与其对世上人的“实生活”感到恐惧，在每个夜晚辗转难眠的地狱中呻吟叹息，还不如被关进牢房来得畅快和轻松。

在樱木町的别墅里，父亲忙于接待客人，或是外出有事，所以即使同住一个屋檐之下，我和他有时接连三四天也见不上一面。我总觉得父亲很难接近，严厉而可怕，因此琢磨着是不是该离开这个家搬到某个宿舍去住。就在我还没有说出口的时候，从别墅的老管家那儿听说了父亲有意出售这栋房子的事情。

父亲的议员任期就要届满了，想必其中还有种种理由吧，他无意继续参加选举。他打算在故乡建一个隐居的地方，似乎对东京并不留恋。我充其量是一个高中生而已，为了这样的我保留住宅和佣人，在他看来或许是一种不必要的浪费吧（父亲的心事与世上所有人的心事一样，是我无法明白的）。总之，那个家不久就转让给了别人，而我则搬到了本乡森川町一栋名叫仙游馆的旧公寓中的阴暗房间里。过了一阵子，我便在经济上陷入了窘境。

在此之前，我总是每月从父亲那儿得到固定金额的零花钱。即使这笔钱马上告罄，可香烟、酒、乳酪、水果等家里随时都有，而且，书、文具、衣服等其他的一切也可以采用所谓的赊账方式在附近的店铺里买到，所以，即便是款待堀木吃荞麦面或者炸虾盖浇饭，只要是在父亲经常光顾的这条街道上的餐馆，我都可以在吃完后一声不响地

甩手而去。

可现在一下子变成了宿舍的独居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必须在每个月的定额汇款中开销。我真是一筹莫展。汇款依旧是在两三天内便花个精光，我不寒而栗，因心中无底而变得几近发狂，交替着给父亲、哥哥、姐姐又是打电报，又是写长信，催他们快点寄钱给我（信中所写之事，几乎纯属逗人发笑的虚构。窃以为，要想求助于他人，其上策乃是引人发笑）。另一方面，我在堀木的教唆下，开始频繁地出入于当铺，可照样手头拮据。

总而言之，我缺乏那种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到兀自一人待在宿舍的房间里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是暗算似的，不由自主地飞奔到大街上，要么去帮助那种"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到处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荒废了。在进入高中后翌年的十一月份，发生了我和一个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之间的殉情事件，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奇怪的是，在考试答题时却颇得要领，所以，一直瞒过了老家的亲人。然而不久，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地通知了身在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带给了我更直接、也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带游戏的心境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了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地区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子（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把纤细得甚至无法削好铅笔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的口袋中四处奔走，以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忆有误）不停地下达了任务，使我甚至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我这副孱弱多病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仅仅是出于对"不合法"的兴趣才参与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一旦

变成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再也没法控制自己了，不禁暗自在心中恨恨地对P内的人嘀咕道：恐怕是你们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好吗？——于是，我逃走了。尽管逃走了，却并没有换来好的心境，我决定去死。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在参加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了下来时，那姑娘总是会拿着便笺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们吵死人了，害得我都没法写信了。”

说罢，她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又发挥了惯用的那种被动的服务精神。尽管事实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可还是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趴在那儿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应付着。

“听说呀有这种男人呐，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呐。是你吧？”

“不，我嘛，只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你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个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是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道：“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为扫兴。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道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呢？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却反倒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深谙，打发女人去干活，是不会惹她讨厌

的。也就是说，如果男人拜托女人做事，她会高兴的。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运动的关系，我和她不管愿意与否，都得每天碰头见面。等碰头会结束以后，这个女人总是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作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呐。”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作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竟厚颜无耻得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日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囿于那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有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毋需再借助堀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

面上可以和其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总算好歹逐渐磨炼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悸动的心。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解消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解消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悒郁凄惨，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的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

它原来与那个时候的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至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了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美味无比的寿司店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吗?)。

她在本所①租借了木匠家二楼上的一个房间。在这儿，我一点也用不着隐匿自己平常那颗悒郁的心灵，就像是受到剧烈牙痛的袭击一样，我一边用一只手捂住脸颊，一边喝茶。我的这种姿势似乎反倒赢得了她的欢心。她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完全孤立的女人，周遭刮着凛冽的寒风，只有落叶枯枝在四处飞舞。

我一边躺着休息，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身世。她比我年长两岁，老家在广岛。她说道："我是有丈夫的人呐。原本他在广岛开了个理发店。去年的夏天，一起背井离乡来到了东京，可丈夫在东京却没干什么正经事。不久，被判了诈骗罪，现在还待在监狱里呐。我呀，每天都要去监狱给他送点东西，但从明天起，我就再也不去了。"不知为什么，我这个人天生就对女人的身世毫无兴趣，不知是因为女人的叙述方式拙劣，还是因为她们的谈话不得要领，反正对于我来说，她们所说的话都不过是耳旁风。

真是寂寞啊。

比起女人连篇累牍的痛说家世，倒是这样一句短短的叹息更能引发我的共鸣。尽管我一直期待着，却从来没有从这个世上的女人那儿听到过这样的叹息。不过，眼前的这个女人尽管没有用言语说过一句"真是寂寞啊"，但是，她身体的轮廓中却流淌着一种剧烈而无言的寂寞，就像是一股一寸见方的气流一样，我的身体一旦靠近她，就

---

① 东京的一个地名。

会被那股气流牢牢地包围住，与我自己所拥有的那种多少有些阴郁的气氛，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宛若“枯叶落在水底的岩石之上”，使我得以从恐惧和不安中抽身逃遁。

与躺在那些白痴妓女的怀中安然酣睡的感觉截然不同（首先，那些妓女是快活的），跟这个诈骗犯之妻所度过的一夜，对于我来说是获得了解放的幸福之夜（不假思索地在肯定意义上使用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我想，这在我的整篇手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但也仅仅只有一夜。早晨，我睁眼醒来翻身下床，又变成了原来那个浅薄无知、善于伪装的滑稽角色。胆小鬼甚至会惧怕幸福。棉花也能让人受伤。幸福有时也能让人受伤。趁着还没有受伤，我想就这样赶快分道扬镳。我又放出了惯用的逗笑烟幕弹。

“有句话叫‘钱一用完，缘分就断’，其实对这句话的解释恰好被人颠倒了。并不是说钱一用光，男人就会被女人甩掉。而是说，男人一旦没有钱，自个儿就会意志消沉，变得颓废窝囊。甚至连笑声都缺乏力量，而且性情出奇的乖戾，最终破罐子破摔，自个儿主动甩了女人。就是说近于半疯狂地彻底甩掉女人。据《金洋大辞林》上解释，就是这个意思呐。真可怜呀。我也多少懂得点那种心境。”

的确，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上述的那些蠢话，把常子逗得哈哈大笑。我觉得不宜久留，脸也没洗就跑了出来，可没想到我当时编造的关于“钱一用完，缘分就断”的胡言乱语，后来竟与我自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关联。

在此后的一个月里我都没有去见那一夜的恩人。分手之后，随着日子的流逝，喜悦之情也逐渐淡漠，倒是蒙受了她恩惠这一点让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感到了一种沉重的束缚。甚至对酒吧里的所有消费都是由常子结的账这种世俗的事情，也开始耿耿于怀了。常子最终也和房东的女儿、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那个女人一样，成了仅仅是胁迫着我的女人，所以即使相距甚远，我也会对常子感到恐惧，而且我觉得，一旦再遇到那些与自己睡过觉的女人，她们就会对我勃然大

怒，所以，对再见到她们颇为胆怯心虚。正因为我性格如此，所以，我对银座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这种胆怯心虚的性格绝不是源于我的狡黠，而是因为我还不大明白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女人这种生物在生存时，是把晚上一起睡觉与第二天早晨起床之后这两者严格区分开来的，就像是彻底忘却了其间的关联一样，干净利落地斩断了那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

十一月末，我和堀木在神田的露天摊铺上喝廉价的酒。这个恶友主张离开现在的摊铺去另一个地方喝酒。可我们已经花光了手头的钱，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硬是吵嚷着“喝呀，喝呀”。此时的我早已喝得醉醺醺的，胆子也变大了，说道：

“好吧，那我就带你去一个梦的国度。可别大惊小怪，那儿真可谓‘酒池肉林’……”

“是一个酒馆？”

“对。”

“走吧。”

事情就这样定了，两个人一起坐上了市营电车。堀木兴奋得欢蹦乱跳着说道：

“今夜我可是好想要个女人呐。在那儿可以亲女招待吗？”

平常我是不大愿意让堀木演出那种醉态的。堀木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又特意问了一句：

“我亲她，行吗？坐在我旁边的女招待，我一定要亲给你瞧瞧。行不行？”

“不要紧吧？”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想要女人了。”

在银座四丁目下车后，仗着常子的关系，我们身无半文地走进了那家所谓酒池肉林的大酒馆。我和堀木挑了一个空着的包厢相对而坐，只见常子和另一个女招待迅速跑了过来。那个女招待坐在了我的身边，而常子则一屁股坐在了堀木的身边。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常子

眼看着就要被堀木亲吻了。

那并不是一种觉得可惜的感觉。我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太强的占有欲，即使偶尔也有可惜的感觉，但也绝对没有那种大胆主张自己的所有权，奋起与人抗争的力量，以致在后来的某一天，我甚至默不作声地眼睁睁看着一个与自己同居的女人遭到了别人的玷污。

我竭力避免介入人与人之间的芥蒂，害怕卷入那样的漩涡之中。常子与我只不过是一夜的交情。她并不属于我。我不可能有觉得可惜的欲望，不过我毕竟还是吃了一惊。

常子就在我的面前接受着堀木猛烈的亲吻。我为常子的境遇感到可怜。这样一来，被堀木玷污过的常子或许就不得不与我分手了吧。而且我也不具备足够的热情来挽留住常子。啊，事情被迫到此结束了。我对常子的不幸涌起了瞬间的惊愕，但随即又如同流水一般老老实实地彻底绝望了。我来回瞅着堀木与常子的面孔，嗤笑了起来。

但事态却意想不到地恶化了。

"算了吧！"堀木歪着嘴巴说道，"就连我也竟然和这种穷光蛋的女人……"

他就像是困窘至极似的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盯着常子，苦笑了。

"给我酒，我身上没有钱。"我小声地对常子说道。我真想喝个烂醉。从所谓的世俗眼光来看，常子的确是一个不值得醉汉亲吻的、丑陋而贫穷的女人。我感到自己就像是意外地遭受了雷击一样。我喝呀，喝呀，从没喝过这么多酒，一直喝到烂醉如泥，与常子面面相觑，悲哀地微笑着。经堀木那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她不过是一个疲惫不堪而又贫穷下贱的女人，可与此同时，一种同病相怜的亲近感却又油然而生（我至今仍旧认为：贫富之间的矛盾尽管貌似陈腐，但却是戏剧家笔下永恒的主题之一）。我发现常子是那么可爱，以至于我生平第一次觉察到自己萌发了一种虽然微弱但却积极主动的恋爱之心。我吐了，吐得不省人事。喝酒喝得不省人事，这还是第一次。

醒来一看，常子坐在我的枕边。原来我是睡在了本所木匠家二楼的房间里。

“你说过‘钱一用完，缘分就断’，我还以为是开玩笑来着。莫非你是真心说的？要不，你干吗不来了？要断绝缘分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难道我挣钱给你用，还不行吗？”

“不，那可不行。”

然后女人也躺下睡了。拂晓时分，从女人的口中第一次迸出了“死”这个字眼。她早已被人世的生活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我一想到自己对人世的恐惧和生存的烦忧，还有金钱、女人、学业、运动等等，似乎就再也无法忍耐着活下去了。于是不假思索地赞同了她的提议。

但当时我却并没有真正作好去“死”的思想准备。其中的确隐含着某种“游戏”的成分。

那天上午，我和她双双徜徉在浅草六区，一块儿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各自喝了一杯牛奶。

“账你先结了吧。”

我站起身，从袖口里掏出小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仅有三块铜币。一种比羞耻更凄烈的情愫一下子攫住了我。我的脑海里一闪而过的是自己在仙游馆的那个房间，那个只剩下了学生制服和被褥，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进当铺典当的荒凉房间。除此之外，我所有的家当就只有此刻穿在身上的碎花布和服与斗篷了。这便是我的现实。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看见我不知所措的样子，那女人也站了起来，瞅了瞅我的钱包问道：

“哎?！就这么点钱?！”

尽管这句话有口无心，但分明有一种疼痛感穿透了我的骨髓。这是我第一次因自己所爱的人所说的话而体验到痛苦。三枚铜币说到底算不得钱，它带给我从未咀嚼过的奇妙的屈辱感，一种没脸再活下去

的屈辱感。归根到底，那时的我还尚未彻底摆脱有钱人家的纨绔子弟这一种属性吧。也就在这时候，我才真正地为一种实感作出了去死的决定。

那天夜里我们俩一块儿跳进了镰仓的海面。那女人嗫嚅着“这腰带还是从店里的朋友那儿借来的呐”，随即解了下来叠放在岩石上面。我也脱下斗篷放在了同一块岩石上，然后双双纵身跳进了海水里。

女人死掉了，而我却得救了。

或许因为我是一个高中生，再加上父亲的名字多少具有一些所谓的新闻效应吧，情死的事儿被当做一个重大事件登载在报纸上。

我被收容在海滨的医院里，一个亲戚还专程从故乡赶来，处理种种后事。故乡的父亲和一家人都勃然大怒，有可能就此与我断绝关系，那个亲戚这样告诉我以后就回去了。但我哪有心思顾及这些，我只是想念着死去的常子，禁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在我迄今为止所交往的人中间，我只喜欢那个贫穷下贱的常子。

房东的女儿给我寄来了一封长信，里面是她写下的五十首短歌。这些短歌的开头一句全都是清一色的“为我活着吧”这样一种奇特的句子。护士们快活地笑着到我的病房里来玩，其中有些护士总是在紧紧握过我的手之后才转身离去。

在这所医院里检查出了我左肺上有毛病。这对我来说，倒是一件好事。不久，我被警察以“协助自杀罪”为名带到了警察局。在那里他们把我作为病人对待，收容在特别看守室里。

深夜，在特别看守室旁边的值班室内，一个通宵值班的年迈警察悄悄拉开两个房间中央的门，招呼我道：

“冷吧。到这边来烤烤火吧。”

我故作无精打采地走进值班室，坐在椅子上烤起火来。

“到底还是舍不得那个死去的女人吧。”

“嗯。”我故意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

“这就是所谓的人情吧。”

接着他渐渐摆开了架势，俨然一副法官的样子装腔作势地问道。

“最初和那女人搞上关系是在哪儿?”

他当我是个小孩子，摆出一副审讯主任的派头，为了打发这个秋天的夜晚，企图从我身上套出什么近于猥亵的桃色新闻。我很快察觉到了这一点，拼命地强忍住想笑的神经。尽管我也知道，对警察的这种“非正式审讯”我有权拒绝作出任何回答，但为了给这漫长的秋夜增添一点兴致，我始终在表面上奇妙地表现出一片诚意，仿佛从不怀疑他就是真正的审讯主任，以至于刑罚的轻重彻底取决于他的意志似的。我还进行了一番适当的“陈述”，以多少满足一下他那颗色迷迷的好奇心。

“唔，这样我就大体上明白了。如果一切都从实回答。我嘛，自然会酌情从宽处理的。”

“谢谢。还请您多多关照。”

真是出神入化的演技。这是一种对自己毫无益处的卖力表演。

天色已经亮了。我被署长叫了过去。这一次是正式审讯。

就在打开门走进署长室的当口，署长便发话了：

“哦，真是个好男儿啊。这倒怪不了你。怪只怪你的母亲，生下了你这样一个好男儿。”

这是一个皮肤微黑、像是从大学毕业的年轻署长。听他突如其来地这样一说，我不禁萌发了一种悲哀的感觉，就像自己是一个半边脸上长满了红斑的、丑陋的残疾人一样。

这个署长的模样就像是一个柔道选手或者剑道选手，他的审讯方式也显得干练而爽快，与那个老警察在深夜所进行的隐秘而执拗的好色审讯相比，真可谓天壤之别。审讯结束后，署长一边整理送往检察局的文件，一边说道：

“你得好好爱惜身体呐。你吐血了吧?”

那天早晨我有些反常地咳嗽。一咳嗽，我就用手巾掩住嘴巴。只见手巾上就像是降了红色的霰子一般沾满了血。但那并不是从喉咙里

咯出来的血，而是昨天夜里在我抠耳朵下面的小疙瘩时流出来的血。我突然意识到，不挑明其间的真相或许对我更为有利，所以只是低下头，机敏地回答道：

“是的。”

署长写完文件后说道：

“至于是否起诉，得由检察官来决定。不过，还是得用电报或电话通知你的担保人，让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总该有一个吧，诸如你的担保人或监护人之类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经常出入于父亲的别墅、名叫涩田的书画古董商是我学校的担保人。这个叫涩田的人，和我们是同乡，常常拍我父亲的马屁，是一个长得又矮又胖、年届四十的独身男人。他的脸，特别是眼睛，与比目鱼十分相似，所以父亲总是叫他“比目鱼”，而我也跟着那么叫惯了。

我借助警察的电话簿，查到了“比目鱼”家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请他到横滨检察局来一趟。没想到“比目鱼”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说起话来竟然装腔作势的，但还是答应了下来。

“喂，那个电话话筒还是消一下毒为好。没看见他吐血了吗?”

当我回到特别看守室坐下之后，听见署长正用大嗓门吩咐警察给电话话筒消毒。

午饭以后，我被他们用细麻绳绑住胳膊，与一个年轻警察一起乘坐电车向横滨出发了。尽管它们准许我用斗篷遮住捆绑的痕迹，但麻绳的一端却被年轻警察牢牢地握在手中。

不过，我并没有丝毫的不安，倒是对警察署的特别看守室和那个老警察依依不舍。呜呼，我怎么会沦落到这步田地呢? 被作为犯人捆绑起来，竟然反而使我如释重负，万般惬意。即使此刻当我追忆当时的情形时，我也不由自主地变得心旷神怡了。

但在那一段时期所有令人怀念的往事中，唯有一次悲惨的失败记录，它令我不胜汗颜，终生难忘。我在检察局一个阴暗的房间里接

受了检察官简单的审讯。检察官年纪有四十岁左右，看起来像是一个性情温和、不乏气度的人（倘若说我长得漂亮的话，那也无疑是一种邪恶淫荡的漂亮，但这个检察官的脸上却萦绕着一种聪慧而且宁静的氛围，使你不得不承认那才是一种真正的漂亮）。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彻底放松了警惕，只是心不在焉地叙述着。突然我又咳嗽了起来。我从袖口掏出手巾，蓦地瞥见了那些血迹。顿时我涌起了一个浅薄的念头，以为或许我能够把这咳嗽作为一种筹码来进行讨价还价。"咯，咯，"我夸张地大声假咳了两下，用手巾捂住嘴巴，顺势悄悄乜斜了检察官一眼。

"你是在真咳吗？"

他的微笑是那么宁静。我直冒冷汗。不，即使现在我回想起来，依旧会紧张得手足无措。中学时代，当那个傻瓜竹一说我是"故意的，故意的"，戳穿了我的把戏时，我就像被一脚踢进了地狱里一样。可如果说我这一次的羞愧远远超过了那一次，也绝没有言过其实。那件事和这件事，是我整个生涯中演技惨败的两大纪录，我有时甚至想：与其遭受检察官那宁静的侮辱，还不如被判处十年的徒刑。

我被予以缓期起诉，但我却高兴不起来。心中满是悲凉地坐在检察局休息室的长凳子上，等待着担保人"比目鱼"来领我出去。

透过背后高高的窗户能望见晚霞燃烧的天空，一大群海鸥排成一个"女"字形飞走了。

手记之三

一

竹一的两大预言，兑现了一个，落空了一个。“被女人迷恋上”这一并不光彩的预言化作了现实，而“肯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画家”的这一祝福性的预言却归于泡影。

我仅仅当上了给粗俗杂志投稿的无名的蹩脚漫画家而已。

由于镰仓的殉情自杀事件，我遭到了学校的除名。于是，我不得不在“比目鱼”家二楼上一间三铺席大的房子里起居生活。每月从家里寄来极少金额的一点钱，并且不是直接寄给我，而是悄悄寄到“比目鱼”这儿来的（好像是老家的哥哥们瞒着父亲寄来的）。除此之外，我与老家之间便被断绝了所有的联系。而“比目鱼”也总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无论我怎样对着他讨好地笑，他也一笑也不笑，使我不得不怀疑：人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地变得面目全非呢？这令我感到可耻，不，毋宁说是滑稽。“比目鱼”一改过去的殷勤，只是对我反复絮叨着这一句话：

“不准出去。总之，请你不要出去。”

看来，“比目鱼”认为我有自杀的嫌疑，换言之，存在着我跟随女人再度跳进大海的危险性，所以对我的外出严加禁止。我既不能喝

酒，也不能抽烟，而只能从早到晚地蛰伏在二楼三铺席房间的被炉里翻一翻旧杂志，过着傻瓜一样的生活，甚至于连自杀的力气也丧失殆尽了。

“比目鱼”的家位于大久保医专的附近，尽管招牌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书画古董商”、“青龙园”等等，可毕竟只占了这一栋房子两户人家中的一户。而且，店铺的门面也相当狭窄，店内落满了尘埃，堆放着很多的破烂货（本来“比目鱼”就不是靠着店里的破烂货在做生意，而是大肆活跃于另一些场合，比如将某个所谓老板的珍藏品的所有权出让给另一个所谓的“老板”以从中渔利）。他几乎从不呆坐在店里，而大清晨就板起个脸，急匆匆地走出店门去了，只留下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计守店。当然他也是负责看守我的人了。一有闲工夫，他就跑到外面去，和邻近的孩子们一起玩投球游戏，俨然把我这个二楼上的食客当做了傻瓜或是疯子，甚至有时像大人一样对我进行说教。我天生就是一个不会与人争辩的人，所以只得作出一副疲惫不堪或是感激涕零的表情，聆听并服从他的说教。这小伙计是涩田的私生子，只是其间有一些蹊跷的内幕，使得涩田没有和他以父子相称。而且，涩田一直独身未娶，似乎与此也不无关系。我记得过去也从自己家里人那儿听到过一些有关的传闻，但我对别人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太大的兴趣，所以对其中的详情一概不知。但那小伙计的眼神确实让人联想起那些鱼的眼睛来，所以，或许真的是“比目鱼”的私生子……倘若果真如此，他们俩倒也的确算得上一对凄凉的父子。夜深人静之时，他们常常瞒着二楼上的我，一声不响地偷吃着荞麦面什么的。

在“比目鱼”家里，一直是由这个小伙计负责主厨的。我这个二楼上的食客的饭菜，通常是由小伙计盛在托盘里送上来，而“比目鱼”和小伙计则在楼下四铺半席大的阴湿房间里匆匆忙忙地用餐，还一边把碗碟鼓捣得咔嚓作响。

在三月末的一个黄昏，或许是“比目鱼”找到了什么意料之外的赚钱门道，抑或是他另有计谋（即使这两种推测都没有错，至少也还

有另一些我等之辈所无法推断的琐屑原因吧），他破例把我叫到了楼下的餐桌旁。桌子上竟然很罕见地摆放着酒壶和生鱼片，而且那些生鱼片不是廉价的比目鱼，而是昂贵的金枪鱼。就连款待我的主人家也大受感动，赞叹不已，甚至还向我这个茫然不知所措的食客劝了点酒。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这以后?”

我没有回答，只是从桌子上的盘子里夹起了一块干沙丁鱼片。看着那些小鱼身上银白色的眼珠子，酒劲便渐渐上来了。我开始怀念起那些四处乱转的时光，还有堀木。我是那么痛切地渴望起“自由”来了，以致差一点脆弱得掩面哭泣。

我搬进这个家以后，甚至于丧失了逗笑的欲望，只是任凭自己置身于“比目鱼”和小伙计的蔑视之中。“比目鱼”似乎也竭力避免与我进行推心置腹的长谈，而我自己也无意跟在他后面向他诉说衷肠，所以我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傻乎乎的食客。

“所谓缓期起诉，今后是不会成为人的前科的。所以，就单凭你自己的决心便可以获得新生。若是你想洗心革面，正经八百地征求我的意见，那我自会加以考虑的。”

“比目鱼”的说法，不，世上所有人的说法，总是显得转弯抹角，含糊不清，其中有一种试图逃避责任似的微妙性和复杂性。对于他们那种近于徒劳无益的严加防范的心理和无数的小小计谋，我总是感到困惑不已，最后只得听之任之，随他而去。要么我以滑稽的玩笑来敷衍塞责，要么我用无言的首肯来得过且过，总之，我采取的是一种败北者的消极态度。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其实当时要是“比目鱼”像下面这样简明扼要地告诉我，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子，可是……我为“比目鱼”多此一举的用心，不，为世人们那不可理喻的虚荣心和面子观念，感到万般的凄凉和阴郁。

“比目鱼”当时要是这么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就好了：

"不管是官立的学校还是私立的学校，反正从四月开始，你得进一所学校。只要你肯进学校读书，老家就会寄来更充裕的生活费。"

后来我才了解到，事实上，当时情况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样的话，我是会言听计从的吧。但是，由于"比目鱼"那种过分小心翼翼、过分转弯抹角的说法，我反倒闹起了别扭，以至于我的生活方向也全然改变了。

"如果你没有诚心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我就无可奈何了。"

"征求什么意见?"我就像丈二和尚一样摸不着头脑。

"关于你心中想的一些事情罢了。"

"比如说?"

"比如，你自己打算今后怎么办?"

"还是找点活儿来干好吧?"

"不，我是问你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

"不过，即使我想进学校，也……"

"那也需要钱。但问题不在钱上，而在于你的想法。"

他为什么不挑明了说一句"老家会寄钱过来"呢？仅此一句话，我就会下定决心的。可现在我却坠入了云里雾中。

"怎么样？你对未来是否抱有希望之类的东西呢？照顾一个人有多难，这是受人照顾者所无法体会的。"

"对不起您。"

"这确实让我担心呐。我既然答应了照顾你，也就不希望你半途而废。我希望你拿出决心来给我看看，走上一条重新做人的道路。至于你将来的打算，如果你诚心诚意地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是愿意与你一同商量着办的。当然，我'比目鱼'是个穷光蛋，但还是愿意资助你的。可是，如果你还奢望过从前那种阔绰的生活，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不过，要是你的想法切实可行，明确地制定出了将来的方案，并愿意与我商量，那我也会不厌其烦地帮助你获得新生。你明白吗，我的这种心情？你究竟以后打算怎么办?"

“如果您不愿意收留我，我就出去找点活儿来干……”

“你是真心那么说的吗？在如今这个世上，就算是帝国大学的毕业生也还……”

“不，我又不是去做什么白领阶层。”

“那做什么呢？”

“当画家。”我狠了狠心说了出来。

“嘿?!”

我无法忘记当时“比目鱼”缩着脖子嗤笑的狡黠面影。那嗤笑的面影里潜藏着一种近于轻蔑却又不同于轻蔑的东西。倘若把人世间比做一片大海，那么，在大海的万丈深渊里就分明曳动着那种奇妙的影子。我正是透过那种嗤笑，管窥了成年人生活的深层奥秘。

最后他说道：“想当画家的想法真是太荒唐了，你的情绪一点也不稳定。你再考虑考虑吧，今天晚上你就好好地考虑一晚上吧。”被他这样一说，我就像是被人追撵着似的赶紧爬上了二楼。无论怎样辗转反侧地思考，也想不出什么别的主意。再过了一阵子，天开始拂晓了。在黎明时分，我从“比目鱼”家逃了出来。

“傍晚时我肯定回来。关于将来的打算，我这就去找下面所记的一位朋友商量商量，所以，请您不必为我担心。真的。”

我用铅笔在便笺上写了上面的一番话。然后，又记下了浅草堀木正雄的住址和姓名，随即悄悄地溜出了“比目鱼”家。

我并不是因为讨厌“比目鱼”的说教才偷跑出来的。正如“比目鱼”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男人。对于将来的打算，我则是一无所知，而且，如果是一直待在“比目鱼”家当食客的话，未免又对不起“比目鱼”。即便我想发愤图强，立下宏志，可一想到自己每个月都得从并不富裕的“比目鱼”那儿接受经济上的援助，不禁顿时黯然神伤，痛苦不堪。

不过，我并不是真的想去找堀木之流商量什么“将来的打算”，才逃离“比目鱼”家的。哪怕是片刻也好，我希望能先让“比目鱼”

放下心来（而在他放宽心的这段时间里，我便可以逃得再远一点，正是出于这种侦探小说式的策略，我才写下了那张留言条。不，不对，尽管不无这种心理，但更准确的说法是：我害怕自己冷不防带给“比目鱼”太大的打击，使得他惊惶失措。尽管事情的真相迟早是要败露的，但我还是惧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因而必然要进行某种掩饰。这正是我可悲的性格之一，尽管它与世人们斥之为“撒谎”而百般鄙弃的那种性格颇为相似，但我却从来也没有为了牟取私利而那么做，我只是对那种气氛的骤然变化所造成的扫兴感到一种窒息感的恐惧，所以，即使明知事后将对自己不利，也必定会进行那种拼死拼活的服务。纵然这种“服务”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微不足道而又愚蠢至极的东西，但恰恰是出于这种为人“服务”的心理，我才在许多场合下不由自主地添加上一句漂亮的修饰语。但这种习惯却常常被世上所谓的“正人君子”们大肆利用），所以，就任凭记忆的驱使，把当时浮现在脑海中的堀木的住址和姓名随手写在便笺的一隅。

我离开了“比目鱼”的家，一直步行着来到了新宿，卖掉了口袋里的书。这下我真是走投无路了。尽管我在朋友中人缘不错，可却一次也没有真切地体会到过那种所谓的“友情”。像堀木这样的要要朋友暂且不论，甚至所有的交往都只给我带来过痛楚。为了排遣那种痛楚，我拼命地扮演丑角，累得精疲力竭。即使是在大街上看到熟识的面孔，哪怕只是与熟人相似的面孔，我都会大吃一惊，在一刹那间里被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痛苦的战栗牢牢地裹挟住。即使知道有人喜欢自己，我也缺乏去爱别人的能力（当然，我对世上的人们是否真的拥有爱别人的能力这一点持怀疑态度）。这样的我是不可能拥有所谓的“亲密朋友”的，而且，我甚至缺乏走访朋友的能力。对于我来说，他人的家门比《神曲》[1]中的地狱之门还要阴森可怕。这并非危言耸听，我真有这样一种感觉：似乎有一种像可怕的巨龙一般散发出腥臭的怪

① 指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

兽，正匍匐在别人家门的深处蠕动着。

我和谁都没有往来，我哪里都去不了。

还是去堀木那儿吧。

这是一种典型的假戏真做。我决定按照留言条上所写的那样去走访浅草的堀木。在这之前，我一次也没有主动去走访过堀木家，而大都是打电报叫堀木上我这儿来。眼下我甚至连电报费也掏不出来了，更何况凭我这副落魄潦倒之身，光发个电报，堀木恐怕是不会出来见我的吧。我决定做一次自己并不擅长的"走访"，于是叹息着坐上了电车。对于我来说，难道这个世上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那个堀木吗？一想到这儿，一种冷彻脊梁的凄凉感便一下子笼罩住了我。

堀木在家。他的家是一栋位于肮脏的胡同深处的两层建筑。堀木占有的是二楼上一间仅有六铺席大的房间。堀木年迈的父母和三个年轻的工匠正在楼下制作木屐，一会儿敲敲打打，一会儿缝制木屐上的带子。

那天，堀木向我展示了他作为都市人的崭新一面。即俗话所说的老奸巨猾的一面。他是一个冷酷狡诈的利己主义者，令我这个乡巴佬瞠目结舌。他远远不是一个像我这样永远漂泊流转的男人。

"你真是让我吃了一惊呐。你家老爷子原谅你了吗？还没有?!"

我没敢说自己是逃出来的。

我像平常那样搪塞着。尽管马上就会被堀木察觉，但我还是搪塞着说道：

"那总会有办法的。"

"喂，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就算是我对你的忠告吧，干傻事也该到此收手了。我嘛，今天还有点事呐，这阵子真是忙得不可开交。"

"有事?! 什么事?!"

"喂，喂，你可别把坐垫上的带子扯断啦。"

我一边说话，一边无意识地用指尖鼓捣着铺在下面的坐垫的四个边上那穗子模样的绳子，也不知道那是坐垫上的线头子还是扎绳

儿，我只是一个劲儿地扯拉着玩。只要是家里的东西，堀木似乎连坐垫上的一根细绳子都爱惜无比，甚至于不惜横眉竖眼，义正词严地责备我。回想起来，堀木在以前与我的交往中从来也没有吃过什么亏。

堀木的老母亲把两碗年糕小豆汤放在托盘上送了上来。

“哎呀，您这是……”

堀木俨然一副不折不扣的孝顺儿子的模样，在老母亲面前显得诚惶诚恐的，就连说话的腔调也毕恭毕敬得有些不自然了：

“对不起，是年糕小豆汤吗？真是太阔气了。原本用不着这么费心的，因为我们有事得马上出去呐。不过，一想到这是您特意做的拿手的年糕小豆汤，要是不吃又未免太可惜了。那我们就喝了吧。你也来一碗吧，怎么样？这可是我母亲特意做的呐。啊，这玩意儿真好喝。太阔气啦！”

他兴奋无比，津津有味地喝着，那神情也不完全像是在演戏。我也啜了一口小豆汤，只闻到一股白开水的味道。我又尝了尝年糕，觉得那压根儿就不是年糕，而是一种我所全然不知的莫名物体。当然，我绝对不是在这里蔑视他们家的贫穷（其实当时我并不觉得难吃，而且老母亲的心意也令我大为感动。即使我对贫穷有一种恐惧感，也绝没有什么轻蔑感）。多亏了那年糕小豆汤和因年糕小豆汤而兴高采烈的堀木，我才清楚地看到了都市人那节俭的本性，看到了东京人家庭那种内外有别、惨淡经营的真实面貌。我发现唯有愚蠢的我不分内外，接二连三地从人的生活中四处逃窜，甚至还遭到了堀木这种人的嫌弃。这怎不令我惶恐？我鼓捣着涂漆剥落的筷子，一边喝年糕小豆汤，一边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种难以忍受的寂寞和凄凉之中。我只想把这一点记录下来。

“对不起，我今天有点事，”堀木站起身，一边穿上衣一边说道，“太失礼了，真是对不起。”

这时，一个女客人来找堀木。谁知我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剧变。

堀木一下子精神大振，说道：

“哦，真是对不起。我正寻思着要去拜望您呐。可谁知来了个不速之客。不过没关系，喂，请吧。”

他一副方寸大乱的样子。我把自己垫着的坐垫腾出来翻了个面递给他。他一把夺过去，又翻了个面放好，请那女人就座。房间里除了堀木的坐垫之外，就只剩下了一张客人用的坐垫。

女人是一个瘦高个儿。她把坐垫往旁边挪了挪，在门口附近的角落边坐了下来。

我茫然地听着他们俩的谈话。那女人像是某个杂志社的人，看样子不久前约请了堀木画什么插图，这一次是来取稿的。

“因为很急，所以……”

“已经画好了。而且是早就画好了的。这里就是。请过过目吧。”

这时送来了一封电报。

堀木看了看电报。只见他那原本兴高采烈的面孔一下子变得阴森可怖起来了。

“喂，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比目鱼”发来的电报。

“总之，请你赶快回去。要是我能送你回去那固然好，可我眼下实在没那工夫。瞧你，从家里逃跑出来，还一副大摇大摆的模样。”

“您住在哪儿？”

“大久保。”我不由得脱口而出道。

“那正好是在敝公司的附近。”

那女人出生在甲州，今年二十八岁。带着一个年满五岁的女儿住在高圆寺的公寓里。据说她丈夫已去世快三年了。

“您看起来像是吃了很多苦头才长大成人的呐。看得出您很机敏。真够可怜的。”

从此我第一次过上了男妾似的生活。在静子（这就是那个女记者的名字）去新宿的杂志社上班时，我就和她那个名叫繁子的五岁女儿一起照看家里。在此之前，当母亲外出时，繁子总是在公寓管

理员的房间里玩耍，而现在有了一个“机敏”的叔叔陪着她玩，让她很是高兴。

我在那儿稀里糊涂地待了一周左右。透过公寓的窗户，能看见一只风筝绊在了不远的电线上。裹挟着尘土的春风把风筝吹得七零八落，但它却牢牢地缠在电线上不肯离去，就像是在点头首肯似的。每当见此情景，我就忍不住苦笑起来，面红耳赤，甚至被噩梦所缠住。

“我想要点钱。”

“……要多少？”

“要很多……俗话说‘钱一用完，缘分就断’，可真是一点不假啊。”

“你真傻。那不过是一句从前的老话而已……”

“是吗？不过你是不会明白的。照这样下去，没准我会逃走的。”

“到底是谁更没有钱呢？到底是谁要逃走呢？你真是奇怪呐。”

“我要自己挣钱，用挣来的钱买酒，不，是买烟。就说画画吧，我也自认为比堀木画得好呐。”

这种时候，我的脑子里会情不自禁地浮现出自己中学时代所画的那几张自画像，就是被竹一说成是“妖怪的画像”的那些自画像。那是一些丢失了的杰作。尽管它们在三番五次的迁徙中被丢失了，但我总觉得，唯有它们才称得上优秀的画作。那以后我也尝试着画过各种各样的画，但都远远抵不上那记忆中的杰作，以至于我总是被一种懒倦的失落感折磨着，恍若整个胸膛都变成了一个空洞。

一杯喝剩了的苦艾酒。

我就这样暗暗地描述着那永远无法弥合的失落感。一提到画，那杯喝剩了的苦艾酒就会在我眼前忽隐忽现。我被一种焦躁感搅得心神不宁。啊，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看看。我要让她相信我的绘画才能！

“哼，怎么样？你竟然还会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势开玩笑，真是可爱呀。”

这不是在开玩笑，而是真的！啊，我真想把那些画拿给她瞧瞧。

我就这样徒劳地焦灼着。突然我改变了主意，断了那个念头，说道：

“漫画，至少画漫画，我自认为比堀木强。”

这句骗人的玩笑话，谁知她倒信以为真了。

“是啊，其实我也蛮佩服你的。你平常给繁子画的那些漫画，让我看了都禁不住捧腹大笑。你就试着画画看，怎么样？我也可以向我们社的总编引荐引荐你呐。”

她们那家杂志社发行的是一种面向儿童的没有名气的月刊杂志。

“……一看到你，大部分女人都巴不得为你做点什么呐……因为你总是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却又是一个出色的滑稽人物。……有时候你是那么茕茕孑然、郁郁寡欢，那模样更是让女人为之心动呐。”

除此之外，静子还唠唠叨叨地说很多话来给我戴高帽子，可一想到那恰恰是隶属于男妾的可鄙特征，我就变得越发“郁闷消沉”、萎靡不振了。我暗地里忖度到：金钱比女人更重要，我迟早都要离开静子去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可事实上，我却是越来越依赖于静子了。包括我从“比目鱼”家出走之后的所有事情，我都受到了这个胜过男性的甲州女人的关照，结果，我在静子面前更是不得不“战战兢兢”的了。

在静子的安排下，“比目鱼”、堀木以及静子三人进行了三方会谈，达成了协议：我与老家彻底决裂，而与静子“堂堂正正”地同居。在静子的多方奔走之下，我的漫画也意外地赚了些收入，我用那些钱来买酒和烟。谁知我的不安和悒郁却反而有增无减。郁郁不乐之至，使我在为静子他们的杂志画每月的连载漫画《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时，情不自禁地回想起故乡的家人来。由于过分的凄寂，手中的画笔有时会戛然停止运作，而我伏在桌子上早已是泪流满面了。

这种时候，能稍稍安慰我的就只有繁子了。繁子已经毫不忌讳地把我叫做“爸爸”了。

“爸爸，有人说只要一祈祷，神什么都会答应的，这话可当真？”

说来我倒是正需要这样的祈祷呐。

啊，请赐给我冷静的意志！请告诉我“人”的本质！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加以排挤欺侮，难道也不算罪过吗？请赐给我愤怒的面罩！

“嗯，是的，对繁子嘛，神什么都会答应的。可是对爸爸呢，恐怕就不灵验了。”

我甚至对神也充满了恐惧。我不可能相信神的宠爱，而只相信神的惩罚。信仰，我觉得它只是为了接受神的鞭笞而低着头走向审判台而已。纵然地狱的存在是可信的，但天国的存在也是难以置信的。

“为什么不灵验呢？”

“因为爸爸违抗了父母之言。”

“是吗？可大家都说，爸爸是个大好人呐。”

那是因为我欺骗了他们。我也知道，这公寓里的人都向我表示出好感，可事实上，我是多么畏惧他们啊！我越是畏惧他们，就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而越是博得他们的喜欢，我就越是畏惧他们，并不得不远离他们而去。可是，要向繁子讲明我这种不幸的怪癖，分明是一件困难至极的事情。

“繁子，你究竟想向神祈祷些什么呢？”我漫不经心地改变了话题。

“繁子我想要自己真正的爸爸呐。”

我吃了一惊，眼前一片晕眩。敌人。我是繁子的敌人？还是繁子是我的敌人？总之，这里也有一个威胁着我的可怕大人。他人，不可思议的他人，尽是秘密的他人。顷刻间在我眼里，繁子一下子变成了那样的一个他人。

原以为只有繁子是一个例外，没想到她的身上也隐藏着“无意中抽死牛虻的牛尾巴”。打那以后，我甚至在繁子面前也不得不提心吊胆了。

“色魔！在家吗？”

堀木又开始上这儿来找我了。在我从“比目鱼”家出走的日子里，他曾经那么冷漠地对待我，可现在我却无法拒绝他，而只能微笑

着迎接他。

“不是听人说你的漫画很受欢迎吗？像你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倒很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量啊。不过，也万万大意不得呀。你的素描就一点也不成样子呐！”

他在我面前摆出一副绘画大师的架势。要是把我那些“妖怪的画像”拿给他看，他会是怎样一种表情呢？我又像平常那样开始徒劳地焦虑不安起来。我说道：

“你别那么说我，要不我会大哭一场的。”

堀木越发得意了：

“如果仅仅依靠为人处世的才能，迟早总会露馅的哟。”

为人处世的才能……听他这么一说，我除了苦笑无以对答。我居然具有为人处世的才能！莫非在别人眼里，我那种畏惧他人、躲避他人、搪塞他人的性格，竟然与遵从俗话所说的那种“明哲保身，得过且过”的处世训条的做法，在表现形式上是相同的吗？啊，人们彼此并不了解，相互截然不同，却自以为是亲密无间的挚友，一辈子也没有察觉彼此的殊异。待等对方死去，不是还哭哭啼啼地念一番悼词吗？

堀木是处理我离开“比目鱼”家之后各种问题的见证人（他肯定是在静子的央求之下才勉强答应下来的），所以，他摆出一副像是我重新做人的大恩人抑或月下老人的派头，要么煞有介事地对我进行说教，要么深更半夜喝得烂醉跑来借宿，要么从我这儿借走五块钱（每次都无一例外地是五块钱）。

“不过，你玩女人也该到此为止了吧。再玩下去的话，世间是不会容忍的。”

所谓世间，又是什么呢？是人的复数吗？可哪儿存在着“世间”这个东西的实体呢？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它是一种苛烈、严酷、而且可怕的东西，并一直生活在这种想法之中，如今被堀木那么一说，有句话差一点就迸出了我的喉咙口：

“所谓的世间，不就是你吗？”

我害怕激怒了堀木，所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世间是不会容许那么做的。)

(不是世间，而是你不会容许那么做吧。)

(如果那么做，世间会让你头破血流的！)

(不是世间，而是你吧。)

(你不久就会被世间埋葬。)

(不是被世间，而是被你埋葬吧。)

(对自己的可怕、怪异、恶毒、狡诈和诡谲，你要有点自知之明！)

诸如此类的话语在我胸中你来我往。尽管如此，我却只能用手巾揩拭着汗涔涔的脸庞，笑着嗫嚅道：

“冷汗，冷汗！”

打那时候起，我开始萌发了一种可以称之为“思想”的念头：所谓的世间，不就是个人吗？

从我萌发了这个念头之后，与以前相比，我多多少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了。借静子的话来说，我变得有点任性了，不再像以前那样战战兢兢了。再借堀木的话来说，我变得出奇地吝啬小气了。而借繁子的话来说，我不大宠着她了。

我变得不苟言笑了，每天一边照看繁子，一边应各家杂志社之约（渐渐地，静子他们以外的出版社也开始向我约稿了，不过，那都是一些比静子他们更低级的所谓三流出版社的约稿）画一些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以自暴自弃为题的连载漫画，诸如《金太郎与小太郎的冒险》，还有明显是模仿《悠闲爸爸》而作的《悠闲和尚》，以及《急性子小阿乒》等等。我满心忧郁，慢条斯理地画着（我的运笔速度算是相当迟缓的），以此来挣点酒钱。当静子从杂志社回到家里来之后，这下轮到我外出了。我阴沉着脸走出家门，在高圆寺车站附近的摊铺上，或者是简易酒馆里，啜饮着廉价而烈性的酒，等待心情变得快活之

后，才又回到公寓里。我对静子说道：

“越看越觉得你的长相怪怪的。其实啊，悠闲和尚的造型就是从你睡觉时的模样中得到灵感的呐。”

“你睡觉时的模样，也显得很苍老哟。就像是个四十岁的男人。”

“还不是都怪你。我都被你吸干了。俗话说‘河里的水流，人的身体’，有什么闷闷不乐想不开的呢？”

“别瞎嚷嚷了，早点休息吧。要不，你先吃点饭吧。”她是那么平心静气的，根本不理睬我那一套。

“如果是酒的话，我倒想喝一点……河里的水流和人的身体，人的水流和……不，是河里的水流和流水的身体……”

我一边哼哼唧唧的，一边让静子给我脱下衣服。然后我就把额头埋在静子的胸脯里睡了过去。这便是我的日常生活。

第二天也重复着同一件事情
只需遵从与昨天相同的习性
倘若愿意避免狂喜狂乐
大惊大悲就不会降临
躲开前方的挡路巨石
像蟾蜍一般迂回前进

当我读到由上田敏[①]翻译，由夏尔·库洛所作的这首诗时，整个脸庞羞赧得就像火苗在燃烧一样。

蟾蜍。

（这就是我。世间对我已无所谓容忍与不容忍，埋葬与不埋葬了。我是比狗和猫更劣等的动物。蟾蜍。只会趴在地上窸窣蠕动的蟾蜍。）

我的酒量越来越大了。不仅到高圆寺车站附近，还到新宿、银座

---

① 上田敏（1874—1916），日本诗人、翻译家，在介绍西欧文学上成绩卓著。

一带去喝酒，甚至有时还在外面过夜。为了避免“遵从与昨天相同的习性”，我要么在酒吧里装出无赖汉的模样，要么接二连三地乱亲女人，总之，我又回复到了情死之前的那种状态，不，甚至成了比那个时候更粗野更卑贱的酒鬼。被钱所困时，我还把静子的衣服拿出去当掉。

自从我来到这个公寓，对着那被大风刮得七零八落的风筝露出苦涩的微笑之后，已经过去了一年多的时间。当樱花树长出嫩叶的时节，我悄悄偷走静子和服上的腰带和衬衫，拿到当铺去典当，然后用换来的钱去银座喝酒。我连续在外面过了两夜，到第三天的晚上，我感到身体不适，不知不觉地又蹑手蹑脚地来到了静子的房门前。只听到里面传来了静子与繁子的谈话声：

“干吗要喝酒?”

“爸爸可不是因为喜欢酒才喝的。只因为他人太好了，所以……”

“好人就要喝酒吗?”

“倒也不是那样，不过……”

“爸爸准会大吃一惊的。”

“没准会讨厌呐。瞧，瞧，又从箱子里跳出来了。”

“就像是急性子小阿乒一样。”

“说得也是。”

能听到静子那压低了嗓门但却发自肺腑的幸福笑声。

我把门打开了一个缝瞅了瞅里面，原来是一只小白兔。只见小白兔在房间里欢蹦乱跳着，而静子母女俩正追着它玩。

(真幸福啊，她们俩。可我这个混蛋却夹在她们中间，把她们俩的生活搅得一塌糊涂。节俭的幸福。一对好母女。啊，倘若神灵能够听见我这种人的祈求的话，那么，我会祈求神灵赐给我一次幸福，哪怕只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幸福也罢。)

我蹲在那里，真想合掌祈祷。我轻轻地拉上门，又回银座去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公寓。

而我却又一次以男妾的形式寄宿于离京桥很近的一家简易酒吧的二楼上了。

世间。我开始隐隐约约地明白了世间的真相。它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而且是即时即地的争斗。人需要在那种争斗中当场取胜。人是绝不可能服从于他人的。即使是奴隶，也会以奴隶的方式进行卑屈的反击。所以，人除了当场一决胜负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生存方式。虽然人们提倡大义名分，但努力的目标毕竟是属于个人的。超越了个人之后依旧还是个人。世间的不可思议其实也就是个人的不可思议。所谓的汪洋大盗，实际上并不是世间，而是个人。想到这里，我多少从对所谓的世间这一汪洋大海的幻影所感到的恐惧中解放了出来。不再像以前那样漫无止境地劳心费神了。即是说，为了适应眼前的需要，我多少学会了一些厚颜无耻。

离开高圆寺的公寓后，我来到了京桥的一家简易酒吧。“我和她分手了。”我只对老板娘说了这一句话，但仅凭这一句话我已经决出了胜负。从那天夜里起，我便毫不客气地住进了那里的二楼。尽管如此，那本该十分可怕的“世间”却并没有施加给我任何伤害，而我自己也没有向“世间”进行任何辩解。只要老板娘不反对，一切的一切便不在话下了。

我既像是店里的顾客，又像是店里的老板，也像个跑腿的侍从，还像是某个亲戚。在旁人眼里，我无疑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但“世间”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而且店里的常客们也“阿叶、阿叶”地叫我，对我充满了善意，还向我劝酒。

慢慢地我对世间不再小心翼翼了。我渐渐觉得，所谓的世间这个地方并非那么可怕了。换言之，迄今为止的那种恐怖感很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就好比担心春风里有成千上万的百日咳细菌，担心澡堂里隐藏着成千上万导致人双目失明的细菌，担心理发店里潜伏着秃头病的病菌，担心火车车厢的吊带上蠕动着疥癣的幼虫，担心生鱼片和生烤的猪肉牛肉里埋伏着绦虫的幼虫啦、肝蛭啦、还有什么虫卵等等，

担心赤脚走路时会有小小的玻璃碴扎破脚心，而那玻璃碴竟会进入体内循环，刺破眼珠，使人失明等等，总之，我就像是被那种所谓的“科学的迷信”吓破了胆似的。的确，所谓“成千上万的细菌在那儿蠕动”，或许从“科学”的角度看是正确无误的吧。但同时我也开始懂得了：只要我彻底抹杀它们的存在的话，那么，它们也就成了与我毫无关联，并且转瞬即逝的“科学之幽灵”。人们常说，如果饭盒里剩下三粒饭，一千万人一天都剩三粒，那就等于白白浪费了好几袋大米；还有如果一千万人一天都节约一张擤鼻涕的纸，那么，就会汇聚成多大的一池纸浆啊。这种“科学的统计”曾经使我多么胆战心惊啊。每当我吃剩一粒米饭时，或是擤一次鼻涕时，我就觉得自己白白浪费了堆积如山的大米和纸浆。这种错觉死死地攫住我，使我黯然神伤，仿佛自己正犯下了重大的罪孽一样。但这恰恰是“科学的谎言”、“统计的谎言”、“数学的谎言”。在黑灯瞎火的厕所里，人们踩虚脚掉进粪坑里的事，会在多少次中出现一次呢？还有，乘客不小心跌进车站出入口与月台边缘的缝隙中的事，又会是在多少人中有一个人发生呢？统计这种可能性是愚蠢可笑的，与此相同，三粒米饭也是不可能被汇集一处的，即使作为乘法除法的应用题，这也是过于原始而低能的题目。尽管它的确有可能发生，但真正在厕所的毛坑上踩虚脚受了伤的事例，却从没有听说过。不过，那样一种假设却被作为“科学的事实”灌输进了我的大脑，直到昨天为止，我还完全把它作为现实来加以接受并担惊受怕。我觉得自己是那么天真可爱，忍不住想笑。我开始一点一点地了解“世间”的实体了。

尽管如此，人这种东西在我眼里仍旧十分可怕，在下去见店里的顾客时，我必须得先喝干一杯酒才行。可我又是多么想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啊，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到店堂里去，就像小孩子总是把自己害怕的小动物紧紧捏在手中一样，我开始在喝醉了之后向店里的客人吹嘘拙劣的艺术论。

漫画家。啊，我只是一个既没有大悲也没有大喜的无名漫画家。

我内心中焦灼地祈盼着狂烈的巨大欢乐，即使再大的悲哀紧随而来，我也在所不惜。可是，眼下我的乐趣却不外乎与客人闲聊神吹，喝客人请我喝的酒。

来到京桥以后，我已过了近一年如此无聊的生活。我的漫画也不再仅仅限于儿童杂志，而开始登载在车站上贩卖的粗俗猥亵的杂志上。我以“上司几太”（情死未遂）[1]这个诙谑的笔名，画了一些龌龊的裸体画，并大都插入了《鲁拜集》[2]中的诗句：

停止做那种徒劳的祈祷，
不要再让泪水白白流掉。
来，干一杯吧，只想美妙的事情，
忘记一切多余的烦恼。
那用不安和恐怖威胁人的家伙，
惧怕自己制造的弥天罪恶，
为防备死者愤然复仇，
终日算计，不得安卧。
叫喊吧！我的心因醉意而充满欢欣，
今早醒来却只有一片凄清。
真是怪哉，相隔一夜，
我的心竟然判若两人！
别再想什么恶有恶报。
如同远方喧嚷的鼓声
他莫名其妙地不安和烦恼。
又怎能得救，假如放个屁也算罪行？
难道正义是人生的指针？

---

① “上司几太”与“情死未遂”在日语中谐音。
② 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所著诗集，赞美肉欲之乐。

那么，在血迹斑斑的战壕
瞧那暗杀者的刀锋上
又是何种正义在喧嚣？
哪里有真理给予我们指示？
又是何种智睿之光在照耀闪烁？
美丽与恐怕并存在于浮世，
软弱的人子背负起不堪忍受的重荷。
因为我们被播撒了情欲的种子，
所以总听到善与恶、罪与罚的咒语。
我们只能束手无策徬徨踯躅，
因为神没有赐给我们力量和意志。
你在哪里徘徊？
你在对什么进行抨击、思索和忏悔？
是并不存在的幻觉，还是空虚的梦乡？
哎，忘了喝酒，那全都成了虚假的思量！
请遥望那漫无边际的天空，
我们乃是其中浮现的一个小点。
怎能知道这地球是凭着什么自转?!
自转，公转，反转，又与我们有何相干?!
到处都有至高无上的力量，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
无不具有相同的人性。
难道只有我是一个异端之徒？
人们都误读了《圣经》，
要不就是缺乏常识和智慧。
竟然忌讳肉体之乐，还禁止喝酒，
好啊，穆斯塔法，我最讨厌那种虚伪！

(摘自堀井梁步译《鲁拜集》)

那时，有一个处女劝我戒酒。她说道：

“那可不行啊，你每天一吃午饭就开始喝得个醉醺醺的。”

她就是酒吧对面那家香烟铺里的小女孩，年纪有十七八岁，名字叫良子。她白白的肤色，长着一颗虎牙。每当我去买香烟时，她总会笑着给我忠告。

“为什么不行呢？有什么不好呢？有多少酒就喝多少酒。‘人之子呀，用酒来消除憎恨吧！’这是古代波斯的一个诗人说的，哎呀，不用说这么复杂。他还说‘给我这悲哀疲惫的心灵带来希望的，正是那让我微醉的玉杯’呐。这你懂吗？”

“不懂。”

“你这小家伙，让我来亲一下你吧。”

“亲就亲呗。”

她毫不胆怯地翘起了下嘴唇。

“混蛋，居然没有一点贞操观念。”

但良子的表情中却分明漂漾着一种没有被任何人玷污过的处女的气息。

在开年后的一个严寒之夜，我喝得醉醺醺地出去买香烟。不料掉进了香烟铺前面那个下水道的出口里，我连声叫着：“良子，救救我救救我。”良子把我使劲拽了上来，还帮我治疗右手上的伤口。这时她一笑也不笑，恳切地说道：

“你喝得太多了。”

我对于死倒是满不在乎，但若是受伤出血以至于身体残废，那我是死活也不干的。就在良子给我护理手上的伤口时，我寻思着是不是真的该适当地戒酒了。

“我戒酒。从明天起一滴也不沾。”

“真的?!”

“我一定戒。如果我戒了，良子肯嫁给我吗?”

关于她嫁给我的事，其实只是一句玩笑话而已。

“当然啰。”

所谓“当然啰”，是“当然肯啰”的省略语。当时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的省略语，比如“时男”（时髦男子）呀，“时女”（时髦女子）等等。

“那好哇。我们就拉拉钩一言为定吧。我一定戒酒。”

可第二天我从吃午饭时起又开始喝酒了。

傍晚时分，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外面，站在良子的店铺前面，高喊道：

“良子，对不起，我又喝了。”

“哎呀，真讨厌，故意装出一副醉了的样子。”

我被她的话惊了一跳，仿佛觉得酒也醒了许多。

“不，是真的。我真喝了呐。我可不是故意装出醉了的样子。”

“别作弄我，你真坏。”

她一点也不怀疑我。

“不是看一眼就明白吗？我今天从中午起又喝酒了。原谅我吧。”

“你可真会演戏呐。”

“不是演戏，你这个傻瓜。让我亲亲你吧。”

“亲呀！”

“不，我可没有资格呀。娶你做媳妇的事也只有死心了。瞧我的脸，该是通红吧。我喝了酒呐。”

“那是因为夕阳照着脸上的缘故。你想要弄我可不行。昨天不是说定了的吗？你不可能去喝酒的。因为我们拉了钩的。你说你喝了酒，肯定是在撒谎，撒谎，撒谎！”

良子坐在昏暗的店铺里微笑着，她那白皙的脸庞，啊，还有她那不知污秽为何物的“童贞”，是多么宝贵的东西。迄今为止，我还从没有和比我年轻的处女一起睡过觉。和她结婚吧，即使再大的悲哀因此而降临吾身，我也在所不惜。我要体验那近于狂暴的巨大欢乐，哪

怕一生中仅有一次也行。尽管我曾经认为，童贞的美丽不过是愚蠢的诗人所抱有的天真而悲伤的幻觉罢了，可我现在发现，它确实真真切切地存在于这个世上。结婚吧，等到春天到来，我和她俩一起骑着自行车去看绿叶掩映的瀑布吧！我当即下定了决心，也就是抱着所谓的“一决胜负”的心理，毫不犹豫地决定：偷摘这朵美丽的鲜花。

不久我们便结婚了。由此而获得的快乐并不一定很大，但其后降临的悲哀却可以形容为凄烈之至，难以想象。对于我来说，“世间”的确是一个深不可测的可怕地方，也绝不是可以依靠“一决胜负”便可以轻易解决一切的场所。

堀木与我。

相互轻蔑却又彼此来往，并一起自我作践——倘若这就是世上所谓“朋友”的真实面目，那么，我和堀木之间的关系就无疑正好属于“朋友”的范畴。

仰仗着京桥那家酒吧老板娘的侠义之心（尽管所谓女人的侠义之心乃是语言的一种奇妙用法，但据我的经验来看，至少在都市的男女中，女人比男人更具有可以称之为侠义之心的东西。男人们大都心虚胆怯，只知道装点门面，其实吝啬无比），我得以和那香烟铺的良子同居在一起了。我们在筑地[1]靠近隅田川的一栋木结构的两层公寓处租借了楼下的一个房间住了下来。我把酒也戒掉了，开始拼命地从事那日渐成为我固定职业的漫画创作。晚饭后我们俩一起去看电影，在回家的路上或是双双踅进咖啡馆喝点什么，或是买下一个花钵，不，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我最大的乐趣乃是和由衷信赖自己的这个小新娘子待在一起，倾听她说出的每一句话，观赏她做出的每一个动作。我甚至觉得自己正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人了，用不着再悲惨地死去。就在我心中慢慢酝酿着这种天真的想法时，堀木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

① 东京的一个地名。

“哟，色魔！哎呀，从你的表情看来，像是多少变得通晓事理了。今天我是从高圆寺的那个女士那儿派来的使者呐。”他开口说道，又突然降低了嗓门，朝着正在厨房里沏茶的良子那边翘起下巴，问我道：“不要紧吧？”

“没事儿。说什么都无所谓。”我平静地回答道。

事实上，良子真是算得上信赖的天才。我和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之间的关系自不用说，就连我告诉她自己在镰仓所发生的那起事件时，她对我和常子之间的事也毫不怀疑。这倒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善于撒谎，有时候我甚至采取的是一种再明白不过的说法，可良子也只是当做笑话来听。

“你还是那么自命不凡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她让我转告你，偶尔也去高圆寺那边玩玩吧。”

就在我刚要忘却之际，一只怪鸟又扑打着翅膀飞了过来，用嘴喙啄破了我记忆的伤口。于是，转眼之间，过去那些耻辱与罪恶的记忆又在脑海里复苏了，使我感到一种禁不住高声呐喊的恐怖，再也不能平心而坐了。

“去喝一杯吧。”我说道。

“好的。”堀木回答道。

我和堀木。我们俩在外表上是那么相似，甚至被误认为是一模一样的人。当然这也仅仅局限于四处游荡着喝那种廉价酒的时候。总之，两个人一碰面，就顷刻间变成了外表相同、毛色相同的两条狗，一起在下着雪的小巷里来回窜动。

打那天以后，我们又开始重温起过去的交情，还结伴去了京桥的那家酒吧。最后，两条醉成烂泥的狗还造访了高圆寺静子的公寓，在那里过夜留宿。

那是一个无法遗忘的闷热的夏夜。黄昏时分，堀木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浴衣来到了我在筑地的公寓。他说他今天有急用当掉了夏天的衣服，但倘若这事被他的老母亲知道了，事情就会变得很糟糕，所以想

马上用钱赎回来，让我借点钱给他。不巧我手头也没有钱，所以就按照惯例，让良子拿着她的衣服去当铺换点现钱回来。可借给堀木后还剩了点钱，于是让良子去买来了烧酒。隅田川上不时吹来一阵夹杂着泥土味的凉风，我们来到屋顶上摆了一桌不干不净的纳凉晚宴。

这时，我们开始了喜剧名词和悲剧名词的字谜游戏。这是我发明的一种游戏。所有的名词都有阴性名词、阳性名词、中性名词之分，同样，也应该有喜剧名词与悲剧名词之分。比如说，轮船和火车就属于悲剧名词，而市营电车和公共汽车就属于喜剧名词。如果不懂得如此划分的缘由，是无权奢谈什么艺术的。作为一个剧作家，哪怕是在喜剧中只夹杂了一个悲剧名词，也会因此而丧失资格。当然，悲剧的场合亦然。

“准备好了没有？香烟是什么名词？”我问道。

“悲剧（悲剧名词的略称）。”堀木立即回答道。

“药品呢？”

“药粉还是药丸？”

“针剂。”

“悲剧。”

“是吗？可还有荷尔蒙针剂呐。”

“不，绝对是悲剧。你说，注射用的针首先不就是一个出色的悲剧吗？”

“好吧，先算我输给你了吧。不过你说，药品和医生不是都意外地属于喜剧（喜剧名词）吗？那么，死亡呢？”

“喜剧。牧师与和尚也一样。”

“棒极了！那么，生存就该是悲剧了吧。”

“不，生存也是喜剧。”

“这样一来，不是什么都变成了喜剧吗？我再问你一个，漫画家呢？不能再说是喜剧吧？”

“悲剧，悲剧，一个极大的悲剧名词。”

"你说的什么呀！你自己才是一个大悲剧呐。"

一旦变成了这样一种粗俗的谐谑，的确是有些无聊了，但我们却自命不凡地把这种游戏看做世界上的所有沙龙中都不曾有过的机智巧妙的东西。

当时我还发明了另一种与此类似的游戏。那就是反义词的字谜游戏。比如，黑色的反义（反义词的略称）是白色，白色的反义却是红色，而红色的反义则是黑色。

"花的反义词呢？"我问道。

堀木撇着嘴巴，想了想说道：

"哎，有一个餐馆的名字叫'花月'，这样说来，就该是月亮吧。"

"不，那可不能成其为反义词呐，勿宁说是同义词。星星和紫罗兰，不就是同义词吗？那绝对不是反义词。"

"我明白了。那就是蜜蜂。"

"蜜蜂?!"

"莫非牡丹是与蚂蚁相配？"

"什么呀，那是画题呐。你可别想蒙混过关。"

"我明白了。花儿是与云朵相对吧。"

"不，应该是月亮与云朵吧？"

"对，对，花与风呐。是风。花的反义词是风。"

"这可是太蹩脚了。那不是浪花节[1]中的句子吗？你这下真是泄露了老底儿呐。"

"要不，就是琵琶。"

"这就更不对了。关于花的反义词嘛，应该是举出这个世上最不像花的东西才对。"

"所以……等一等，什么呀，莫非是女人？"

"顺便问一句，女人的同义词是什么？"

---

① 一种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中国的评弹。

“是内脏呗。”

“你真是个对诗一窍不通的人。那么，内脏的反义词呢?”

“是牛奶。”

“这倒是有点精彩。按照这个样子再来一个。耻辱的反义词是什么?”

“是无耻。是流行漫画家上司几太。”

“那堀木正雄呢?”

说到这里，我们俩却再也笑不起来了。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住了我们，就仿佛喝醉了烧酒之后所特有的那种玻璃碎片扎着脑袋似的感觉。

“你别出言不逊！我还没像你那样蒙受过当罪犯的耻辱呐。”

这让我大吃一惊。原来在堀木心中，他并没有把我当做真正的人来看待，而只是把我视为一个自杀未遂的、不知廉耻的愚蠢怪物，即所谓“活着的僵尸”。他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在最大限度上利用我罢了。一想到我和他的交情仅止于此，我不禁耿耿于怀。但转念一想，堀木那样对待我也是在所难免的。打一开始我就像是一个没有做人资格的小男孩一样。遭到堀木的蔑视也是理所当然的。

“罪。罪的反义词是什么呢？这可是一道难题哟。”我装作若无其事的表情说道。

“法律。”堀木平静地回答道。

我不由得再一次审视着堀木的面孔。附近那栋大楼上的霓虹灯闪烁着照射在堀木身上，使他的脸看起来就像是魔鬼刑警一般威风凛凛。我煞是惊讶地说道：

“你说什么呀？罪的反义词该不会是那种东西吧。”

他竟然说罪的反义词是法律！或许世上的人们都是抱着那样一种简单的想法而装模作样地生活着。以为罪恶只是在没有警察的地方蠢蠢欲动。

“那么，你说是什么呢？是神吧？因为在你身上有一种恍若僧侣

似的东西，真让人讨厌。”

“别那么轻易下结论，让我们俩再想想看吧。不过，这不是一个有趣的题目吗？我觉得，单凭对这个题目的回答，就可以知晓那个人的全部秘密。”

“未必吧。……罪的反义词是善。善良的市民，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

“别再开那种玩笑了。不过，善是恶的反义词，而不是罪的反义词呐。”

“恶与罪难道有什么不同？”

“我想是不同的。善恶的概念是由人创造出来的，是人随随便便地创造出来的道德词语。”

“真讨厌呐。那么，还是神吧。神，神。把什么都归结为神，总不会有错吧。哎呀，我的肚子都饿了呐。”

“良子现在正在楼下煮蚕豆呐。”

“那太棒了。那可是好东西呀。”

他把两只手交叉着枕在脑袋后面，仰面躺在了地上。

“你好像对罪一点兴趣也没有。”

“说来也是，因为我不像你那样是一个罪人呀。即使我玩女人，也决不会让女人去死，或是卷走女人的钱财。”

并不是我让女人去死的，我也没有卷走女人的钱财。只听见我内心的某个角落里回荡着这低沉的、但却竭尽全力的抗议之声。随即我又转念想到，那一切都是自己的不是。而这正是我奇特的习性。

我怎么也无法与人当面抗辩。我拼命地克制着，不让自己的心情因烧酒阴郁的醉意而变得更加阴森可怕。我几乎是在自言自语似的嗫嚅道：

“不过，唯有被关进监狱这一点，不算是我的罪。我觉得，只要弄清了罪的反义词，那么也就把握住了罪的实体。神……拯救……爱……光明……但是，神本身有撒旦这个反义词，而拯救的反义词却是苦恼，

爱的反义词则是恨，光明的反义词则是黑暗，善的反义词则是恶。罪与祈祷，罪与忏悔，罪与告白，罪与……呜呼，全都是同义词。罪的反义词究竟是什么呢?”

“罪的反义词是蜜，如蜂蜜般甘甜。哎呀，我肚子都饿了，快去拿点吃的东西来吧。”

“你自己去拿来不就得了吗?”

我用生平从未有过的愤怒的声音说道。

“好吧，那我就到楼下去，和良子一起犯罪后再上来吧。与其空谈大论，还不如实地考察呐。罪的反义词是蜜豆，不，是蚕豆吗?”

他已经酩酊大醉得语无伦次了。

“随你的便，随你滚到哪儿去都行!”

“罪与饥饿，饥饿与蚕豆，不对，这是同义词吧?”

他一边信口雌黄，一边起身站了起来。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这念头倏然间掠过了我大脑的某个角落，使我大吃一惊。倘若那个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把罪与罚当做同义词，而是当做反义词排列在一起的话，那么……罪与罚，绝无相通之处的两样东西，水火不相容的两样东西。把罪与罚作为反义词的陀氏，他笔下的绿藻、腐烂的水池、一团乱麻的内心世界……啊，我开始明白了，不，还没有……这一个个念头如走马灯一般闪过我的脑海。这时，突然传来了堀木的叫声:

“喂，他妈的什么蚕豆呀!快来看!”

他的声音和脸色都恍若变了个人。他是刚才蹒跚着起身下楼去的，没想到马上就踅了回来。

“什么事?!”

周围的气氛蓦然变得紧张起来。我和他从楼顶上下到了二楼，又从二楼往下走。在中途的楼梯上堀木停下了脚步，用手指着说道:

“瞧!”

我自己那间屋子上方的小窗户正敞开着，从那儿可以看到房间

的里面。只见房间里亮着电灯，有两只“动物”正在干着什么。

我感到头晕目眩，呼吸急促。“这也不失为人间景象之一。这也是人类的面目之一。大可不必大惊小怪。”我在心里嘀咕着，以至于忘记了该去救出良子，而只是久久地呆立在楼梯上。

堀木大声地咳嗽着。我就像是一个人在逃命似的又跑回到了屋顶上，躺在地上仰望着夏夜布满水汽的天空。此时，席卷我心灵的情感既不是愤懑，也不是厌恶，更不是悲哀，而是剧烈的恐惧。它并非那种对墓地幽灵的恐惧，而是在神社的杉树林中撞上身着白衣的神体时所感到的那种不容你分说的来自远古的极端恐惧感。从那天夜里起，我的头发开始出现了少年白，对所有的一切越来越丧失了信心，对其他人越来越感到怀疑，从此永久地远离了对人世生活所抱有的全部期待、喜悦与共鸣等等。事实上，这在我的整个生涯中也是一件决定性的事件，仿佛有人迎面砍伤了我前额的中央，使得我无论与任何人接近时，都会感到那道伤口正隐隐作痛。

“尽管我很同情你，但你也该多少识点相吧。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这儿完全是一座地狱。……不过，关于良子嘛，你可得原谅她哟。因为你自己也不是一条好汉呐。我这就告辞了。”

堀木绝不是那种傻瓜蛋，会甘愿驻留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

我站起身来，兀自一人喝着烧酒，然后便“哇”地放声痛哭起来。哭啊，哭啊，我就那么一直痛哭着。

不知不觉之间，良子已怔怔地站在我身后，手里端着盛满蚕豆的盘子。

“要是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干……”

“好啦好啦，什么都别说了。你是一个不知道怀疑别人的人。坐下一起吃蚕豆吧。”

我们并排坐下吃着蚕豆。呜呼，难道信赖别人也算是罪过?！对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个子男人，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商人。他常常请我给他画一点漫画，然后煞有介事地留下些许报酬后便扬长而去。

打那以后，那个商人就再也没有来过。不知为什么，比起那个商人，我倒是更加痛恨堀木。是他第一个目睹了那幅场景，可他却什么都没有做——比如故意干咳一声等等——就径直折回到屋顶上诡秘地通知了我。对堀木的憎恶和愤怒会在不眠之夜油然而生，使我叹息呻吟。

不存在着什么原谅与不原谅的问题。良子是一个信赖的天才。她不知道怀疑他人。也正因为如此，才愈加悲惨。

我不禁问神灵：难道信赖他人也算是罪过吗？

在我看来，比起良子的身体遭到玷污，倒是良子对他人的信赖遭到玷污这件事，在以后漫长的岁月中埋下了我无法生活下去的苦恼的种子。我是一个畏畏缩缩、光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对他人的信赖之心已经裂纹丛生的人。对于这样的我来说，良子那种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就恰如绿叶掩映的瀑布一般赏心悦目。谁知它却在一夜之间蜕变为发黄的污水。这不，从那天夜里起，良子甚至对我的一颦一笑也开始大加注意了。

“喂，”我的一声叫喊便会让她心惊胆战。她似乎不知道该把视线投向哪里。无论我多么想逗她发笑而大肆进行滑稽表演，她都一直是那么战战兢兢、畏首畏尾的，甚至在和我说话时滥用敬语。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真的是罪恶之源吗？

我四处搜罗那些描写妻子被人奸污的故事书来看，但我认为，没有一个女人遭到像良子那样悲惨的奸污。她的遭遇是不能成其为故事的。在那个小个子商人与良子之间，倘若存在着哪怕是一丁点儿近似于恋爱的情感，那么，或许我的心境反而会获得拯救。然而，就是在夏天的那个夜晚，良子相信了那个家伙。事情不过仅此而已，却害得我被人迎面砍伤了额头，声音变得嘎哑，头发出现了少年白，而良子也不得不一辈子提心吊胆了。大部分的故事都把重点放在丈夫是否原谅妻子的那种“行为”之上，但这一点对我来说，却并不是那么令人苦恼的重大问题。原谅与不原谅，拥有这种权利的丈夫无疑是幸运

的，倘若认为自己无法原谅妻子，那么，也毋需大声喧哗，只要立刻与她分道扬镳，然后再娶一个新娘子不就一了百了了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好"原谅"对方，自我忍耐罢了。不管怎么说，单凭丈夫自己的心情就能够平息八方事态的吧。总之，在我看来，即使那种事件是对丈夫的一个巨大打击，但也仅限于"打击"而已。与那种永不休止地冲击海岸的波涛不同，它是一种可以借助拥有权利的丈夫的愤怒来加以处置和化解的纠葛。而我的情形又是如何呢？作为丈夫不具备任何权利，不用说发怒，甚至连一句怨言也不能吐露。而妻子恰恰是被她自己所具有的那种罕见的美好品质残酷地奸污了。并且，那种美好的品质正好是丈夫久已向往的、被称之为"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的这样一种可怜之物。

难道纯真无瑕的信赖之心也算是罪过吗?

我甚至对这种唯一值得倚傍的美好品质也产生了疑惑，一切的一切都变得越发不可理喻，以至于我的前方只剩下了酒精。我脸上的表情变得极度地卑微，一大早就喝开了烧酒，而牙齿也落得残缺不全了，手头画的漫画也只是一些近似于淫画的东西了。不，还是让我坦白地说吧。那时候我开始复制春画进行秘密贩卖了，因为我亟需喝酒的钱。每当我看到良子把视线从我身上挪开，一副惴惴不安的模样时，我甚至会胡思乱想到：她是一个完全不知道防备别人的女人，没准和那个商人之间并非只有一次吧？还有，和堀木呢？不，或许还有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人吧？——疑心生疑心，结果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可我却没有勇气去加以证实，以至于被那惯有的不安与恐惧所纠缠着，只能在喝得醉醺醺之后，才敢小心翼翼地试着进行卑屈的诱导性审讯。尽管内心深处是忽而高兴忽而沮丧，可表面上我却拼命地进行滑稽的表演，在对良子施以地狱般可憎的爱抚之后，如同一摊烂泥似的酣然大睡。

那一年的年末，到了夜深人静之时我才酩酊大醉地回到家里。当时我很想喝一杯白糖开水，可良子像是已经睡着了，所以我只好自个

儿去厨房找出白糖罐。打开盖子一看，里面却没有白糖，只有一个细长的黑色纸盒。我漫不经心地拿在手里一看，只见盒子上贴着一张标签，使我目瞪口呆。尽管那标签被人用指甲抠去了一大半，但标有洋文的部分却留了下来，上面一目了然地写着：DIAL。

巴比妥酸。那时我全是喝烧酒，并没有服用安眠药。不过，不眠症似乎成了我的宿痾，所以对大部分安眠药都相当了解。单凭这一盒巴比妥酸就足以致人于死地。盒子还尚未开封，想必她曾经涌起过轻生的念头，才会撕掉上面的标签把药盒子隐藏在这种地方吧。也真够可怜的，这孩子因为读不懂标签上的洋文，所以只用指甲抠掉了其中的一半，以为这样一来就无人知晓了。（你是无辜的。）

我没有发出声响，只是悄悄地倒满一杯水，然后慢慢地给盒子开了封，一口气把药全部塞进了嘴巴里，冷静地喝干杯中的水，随即关掉电灯就那么躺下睡了。

据说整整三个昼夜，我就像是死掉了一般。医生认为是过失所致，所以一直犹豫着没有报警。据说我苏醒过来时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家”。所谓的“家”，究竟是指的哪儿，就连我自己也不得而知。总之，听说我是那么说了，并且号啕大哭了一场。

渐渐地眼前的雾散开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比目鱼”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坐在我的枕边。

“上一次也是发生在年末的时候。这种时候谁不是忙得团团转呐。可他偏偏爱挑准年末来干这种事，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在一旁听“比目鱼”发牢骚的，是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

“夫人。”我叫道。

“嗯，有什么事？你醒过来了？”

老板娘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的那张笑脸贴在了我的脸上。

我不由得泪如泉涌。

“就让我和良子分手吧。”

脱口而出的竟然是这样一句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话。

老板娘欠起身，流露出轻声的叹息。

接下来我又失言了，而且这一次的失言是那么唐突，简直无法断言到底是滑稽还是愚蠢。

“我要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

“哈哈哈，”首先是“比目鱼”大声地笑了，然后老板娘也哧哧地笑出了声来。最后我自己也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红着脸苦笑了起来。

“唔，那样倒是好呀。”“比目鱼”一直在粗俗地笑着，他说道，“最好是到没有女人的地方去。要是有女人的话，怎么着都不行，去没有女人的地方，这倒是个好主意呐。”

没有女人的地方。但我这近于痴人说梦般的胡言乱语，不久居然悲惨地化作了现实。

良子似乎一直认定，我是作为她的替代物而吞下毒品的，因此在我面前比过去更加胆战心惊了。无论我说什么，她都不苟言笑，所以，待在公寓的房间中我会觉得胸闷气短，忍不住又跑到外面酗酒去了。但自从巴比妥酸事件以后，我的身体明显地消瘦了，手脚也变得软弱无力，画漫画稿时也时常偷懒怠工。那时，作为探望费，“比目鱼”留给了我一笔钱（“比目鱼”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随即递给了我那笔钱，就好像是他从自己的荷包里掏出来的一样。可事实上这也是老家的哥哥们寄来的钱。这时，我已经不同于当初逃离“比目鱼”家时的我了，能够隐隐约约地看穿“比目鱼”那种装腔作势的把戏了，所以我也就狡猾地装出不知内情的样子，向“比目鱼”道了谢。但是，“比目鱼”等人干吗要弃简从繁，不直截了当地说出真相呢？其中的缘由我似懂非懂，觉得十分蹊跷）。我打定主意用那笔钱独自到南伊豆温泉去看看。不过，我不属于那种能够长时间地绕着温泉悠闲旅行的人，一想到良子，我就感到无限的悲凉。而我自己与那种透过旅馆房间的窗户眺望山峦的平和心境更是相距甚远，在那里我既没有换穿棉和服，也没有泡温泉澡，只是跑进外面一家并不

干净的茶馆似的地方，拼命地喝酒，把身体糟蹋得更加孱弱之后才回到了东京。

那是在一场大雪降临于东京的某个夜晚。我醉醺醺地沿着银座的背街漫步走着，一边小声地反复哼唱着“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这儿离故乡有几百里”。我一边唱一边用鞋尖踹开街头的积雪，突然间我呕吐了，这是我第一次吐血。只见雪地上出现了一面硕大的太阳旗。好一阵子我都蹲在原地，然后用双手捧起那些没有弄脏的白雪，一面洗脸一面哭了起来。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这儿是何方的小道？

一个女孩哀婉的歌声恍若幻听一般隐隐约约地从远处传了过来。不幸。在这个世上不乏不幸之人，不，尽是些不幸之人。即使这么说也绝非过激之词。但是，他们的不幸却可以堂而皇之地向世间发出抗议，并且，“世间”也很容易理解和同情他们的抗议。可是，我的不幸却全部源于自己的罪恶，所以不可能向任何人进行抗议。假如我斗胆结巴着说出了某一句近似于抗议的话，不仅是“比目鱼”，甚至连世间的所有人都无疑会因我口出狂言而惊讶无比的。到底我是像俗话所说的那样“刚愎自用”呢？还是与此相反，显得过于怯懦畏缩呢？这一点连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总之，我是罪孽的凝固体，所以，我只能变得越来越不幸，而这是无法阻止和防范的。

我站起身来，琢磨着：应该先吃点什么对症的药。于是，我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药店。就在我与店里的老板双目交汇的那一瞬间，我看见她就像是被闪光灯照花了眼睛一样，抬起头瞪大了双眼，呆呆地伫立着。但那瞪大的眼睛里既没有惊愕的神色，也没有厌恶的感觉，而是流露出一副像是在求救、又像是充满了渴慕般的表情。啊，她也肯定是一个不幸的人，因为不幸的人总是对别人的不幸敏感万分。正当

我如此思忖着的时候，我发现那个女人是拄着拐杖、颤巍巍地站立着的。我遏制住了朝她飞奔过去的念头，在她和我面面相觑之时，我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于是，从她那双睁大的眼睛里也流出了泪水。

仅此而已。我一言不发地走出了那家药店，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公寓，让良子化了杯盐水给我喝，然后默默地睡下了。第二天我谎称是感冒，昏睡了一整天。晚上，我对自己的吐血（尽管谁也不知道）感到很是不安，于是起身去了那家药店。这一次我是笑着向老板娘坦诉了自己的身体状况，向她咨询治疗方法。

"你必须得戒酒。"

我们就像是亲骨肉一般。

"或许是酒精中毒吧。我现在都还想喝酒呐。"

"那可不行。我的丈夫得了肺结核，却偏要说酒可以杀菌，整天都泡在酒里，结果是自己缩短了自己的寿命。"

"我真是担心得很。我好害怕，我已经不行了。"

"我这就给你药。可唯独酒这一样东西，你必须得戒掉哟。"

老板娘（她是一个寡妇，膝下有一个男孩，考上了千叶或是什么地方的医科大学，但不久就患上了与父亲相同的病，现在正休学住院。家里还躺着一个中了风的公公，而她自己在五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有一只脚已经彻底不行了）拄着松树的拐杖，翻箱倒柜地找出各种药品来了。

这是造血剂。

这是维生素注射液，而这是注射器。

这是钙片。这是淀粉酶，可以治疗肠胃不好。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她满怀爱心地给我介绍了五六种药品。但这个不幸的夫人的爱情，对于我来说，是太过深厚了。最后她说道"这是你实在忍不住想喝酒时用的药"，说罢迅速地将那种药品包在了一个纸盒子里。

原来这是吗啡的注射液。

夫人说“这药至少比酒的危害要小”，我也就听信了她的话，再则那正好是在我自己也认为酗酒颇为丢人现眼的当口，所以，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摆脱酒精这个恶魔的纠缠了，于是毫不犹豫地将吗啡注射进了自己的手臂。不安、焦躁、腼腆等等，一下子全都被扫荡一空了，我甚至变成了一个神清气爽的雄辩家。而且每当注射吗啡以后，我就会忘却自己身体的虚弱，而拼命地从事工作，一边创作漫画，一边在脑子里构思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绝妙方案。

本打算一天注射一针的，没想到一天增加到了两针，最后在增加到一天四针的时候，一旦缺少了那玩意儿，我就简直无法工作了。

“那可不行哟。一旦中了毒，那就要命了。”

经药店的夫人一提醒，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相当严重的中毒患者（我这个人天性脆弱，动不动就听信别人的暗示。比如有人说，尽管这笔钱是用不得的，可既然是你嘛，那就……一听这话，我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错觉：仿佛不用掉那笔钱，反倒会辜负对方的期待似的，于是马上就把它花掉了）。出于对中毒的担忧，我反倒开始大肆需求那种药品了。

“拜托，再给我一盒。月底我一定会付钱的。”

“钱嘛，什么时候付都没关系，只是警察管起来就很讨厌了。”

啊，我的周围总是笼罩着某种浑浊而灰暗的、见不得人的可疑气氛。

“请你无论如何得搪塞过去，求求你了，夫人。让我吻你一下吧。”

夫人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我趁势央求道：

“如果没有药的话，工作就一点也进展不了。对于我来说，那就像是强精剂一样。”

“那样的话，还不如注射荷尔蒙吧。”

“你开什么玩笑呀。要么是借助酒，要么是用那种药，否则我是

没法工作的。”

“酒可不行。”

“对吧？自从我用那种药以后，就一直滴酒未沾呐。多亏了这样，我的身体状况真可谓好得很哩。我也不认为自己会永远画蹩脚的漫画，从今以后，我要把酒戒掉，调节好身体，努力地学习，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给你们瞧瞧。眼下正处在节骨眼上，所以我求求你啦。让我吻你吧。”

夫人扑哧笑了起来：

“这可为难啊，自个儿中毒了都还不知道呐。”

她“咯吱咯吱”地拄着拐杖，从药品架上取下那种药，说道：

“不能给你一整盒，你马上就会用完的。给你一半吧。”

“真小气，哎，没办法呀。”

回到家以后，我立刻注射了一针。

“不疼吗？”良子战战兢兢地问我。

“那当然疼啦。不过，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即使不愿意也得这样啊。这阵子我很精神吧？好，我这就开始工作。工作，工作。”我兴奋地嚷嚷道。

我甚至还在夜深人静之时叩打过药店的店门。夫人身上裹着睡衣，“咯吱咯吱”地拄着拐杖走了出来。我扑上去抱住她，一边吻她，一边作出一副痛哭流涕的样子。

夫人只是一声不吭地递给我一盒药品。

药品与烧酒一样，不，甚至是更讨厌更龌龊的东西——当我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中毒患者。那真可谓无耻的极致。为了得到药品，我又开始了复制春画，并且与那药店的残废女老板建立了一种彻头彻尾的丑恶关系。

我想死，索性死掉算了。事态已经不可挽回。无论干什么，都是徒劳一场，都只会丢人现眼，雪上加霜。骑自行车去观赏绿叶掩映的瀑布，这只是我难以企及的奢望罢了。只会在污秽的罪恶上增添可耻

的罪恶，让烦恼变得更多更强烈。我想死，我必须得死。活着便是罪恶的种子。尽管我如此这般地左思右想着，却依旧不改那种半疯狂的模样，只是往返穿梭于公寓与药店之间。

无论我多么拼命地工作，由于药品的用量随之递增，所以，欠下的药费也达到了令人恐惧的额度。夫人一看到我的脸，就会泪流满面，而我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地狱。

倘若为了逃出地狱的最后手段也归于失败了的话，那么，往后便只有勒颈自尽了。我决定不惜把神的存在与否作为赌注，斗胆给老家的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坦白地告诉了他关于我自己的一切实情（有关女人的事儿，最终还是没能忝书纸上）。

没想到结果更加糟糕。无论我怎么等待，都一直杳无音讯。等待的焦灼与不安反而使我加大了药量。

今夜，索性一口气注射十针，然后跳进大海里一死方休——就在我如此暗下决心的那天下午，“比目鱼”就像是用恶魔的直觉嗅到了什么似的，带着堀木出现在我面前。

“听说你咯血了。”

堀木说着，在我面前盘腿坐下。他脸上的微笑荡漾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温柔。那温柔的微笑使我感激涕零，兴奋不已，以至于我不由得背过身子潸然泪下。仅仅因为他那温柔的微笑，我便被彻底打碎了，被一下子埋葬了。

他们把我强行送上了汽车。无论如何我必须得住院治疗，而其他的事情全部由他们来解决，“比目鱼”就这样用平静的语气规劝着我(那是一种平静得甚至可以形容为大慈大悲的语调)。我就俨然是一个没有意志、没有判断力的人一般，只是抽抽搭搭地哭着，唯唯诺诺地服从于他们俩的指示。加上良子，我们一共四个人在汽车上颠簸了许久，直到周围变得有些昏暗的时辰，才抵达了森林中一所大医院的门口。

我以为这是一所结核病疗养院。

我接受了一个年轻医生温柔而周到的检查。然后他有些腼腆地笑着说道：

“那就在这里静养一阵子吧。”

“比目鱼”、堀木和良子撂下我一个人回去了。临走时良子递给我一个装有换洗衣服的包袱，接着一声不响地从腰带中间取出注射器和没有用完的药品给我。她还蒙在鼓里，以为那是强精剂吧。

“不，我不要那个。”

这可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在别人劝我的情况下，敢于加以拒绝，这在我迄今为止的生涯中，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样说一点也不夸张。我的不幸乃是一个缺乏拒绝能力的人的不幸。我时常陷入一种恐惧之中，以为如果别人劝我干什么而自己加以拒绝的话，就会在对方的心灵和自己的心灵中剜开一道永远无法修复的裂痕。可是，在良子递给我药品时，我却自然而然地拒绝了自己曾经几近疯狂地四处寻求的吗啡。或许是我被良子那种“神灵一般的无知”所打动了吧。在那一瞬间，难道我不是并没有中毒吗？

我被那个有些腼腆地微笑着的年轻医生带着，进入了某一栋病房。大门上“咔嚓”一声挂上了大锁。原来这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去一个没有女人的地方。”我在服用巴比妥酸时的胡言乱语竟然奇妙地化作了现实。在这栋病房里，全部是发疯的男人。甚至连护士也是男的，没有一个女人。

如今我已不再是罪人，而是狂人。不，我绝对没有发狂。哪怕是一瞬间，我也不曾疯狂过。但是，据说大部分狂人都是这么说的。换言之，被关进这所医院的人全都是狂人，而逍遥在外的全都是正常人。

我问神灵：难道不反抗也是一种罪过吗？

面对堀木那不可思议的美丽微笑，我曾经感激涕零，甚至忘记了判断和反抗便坐上了汽车，被他们带进这儿，变成了一个狂人。即使再从这里出去，我的额头上也会被打上“狂人”，不，是“废人”的烙印。

我已丧失了做人的资格。

我已彻底变得不是一个人了。

来到这儿时，还是在初夏时节。从镶有铁格子的窗户向外望去，能看见庭院内的小小池塘里盛开着红色的睡莲花。又是三个月过去了，庭院里开始绽放出波斯菊花了。这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老家的大哥带着“比目鱼”前来接我出院了。大哥用他惯有的那种一本正经而又不失紧张的语气说道：“父亲在上个月的月末因患胃溃疡去世了。我们对你既往不咎，也不想让你为生活操心费神，你什么都不用做。不过，有一个前提条件，尽管你肯定是依依不舍的，但必须得离开东京，回老家去过一种疗养生活。你在东京所闯下的祸，涩田先生已大体帮你了结了，你不必记挂在心。”

蓦然间故乡的山水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已完全变成了一个废人。

得知父亲病故以后，我越发变得萎靡颓废了。父亲已经去了。父亲作为片刻也不曾离开我心际的、一种又可亲又可怕的存在，已经消失而去了，我觉得自己那收容苦恼的器皿也陡然变得空空荡荡的。我甚至觉得，自己那苦恼的器皿之所以曾经那么沉重，也完全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于是我顷刻间变成了一只泄了气的气球，甚至丧失了苦恼的能力。

大哥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对我的诺言。在从我生长的城镇坐火车南下四五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处东北地区少有的温暖的海滨温泉。村边有五栋破旧的茅屋，里面的墙壁已经剥落，柱子也遭到了虫蛀，几乎再也无法修缮了。但大哥却为我买下了那些房子，并为我雇了一个年近六十、长着一头红发的丑陋女佣。

那以后又过去了三年的光阴。其间我多次奇妙地遭到那个名叫阿铁的老女佣的强暴。有时我和她甚至还像一对夫妻似的吵架顶嘴。我肺上的毛病时好时坏，忽而胖了，忽而又瘦了，甚至还咯出了血

痰。昨天我让阿铁去村里的药铺买点卡尔莫钦[1]，谁知她买回来的药和我平常服用的那种药，其药盒子在形状上就大为不同。对此我也没有特别留意，可睡觉前我连吃了十粒也无法入睡。正当我觉得蹊跷时，肚子开始七上八下的，于是急急忙忙地跑进厕所，结果腹泻得厉害。那以后又接连上了三次厕所。我觉得好生奇怪，这才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装药的盒子，原来是一种名叫“海诺莫钦”的泻药。

我仰面躺在床上，把热水袋放在腹部上，恨不得对阿铁发一通牢骚。

“你呀，这不是卡尔莫钦，而是海诺莫钦呐。”

我刚一开口，就哈哈地笑了。“废人”，这的确像是一个喜剧名词。本想入睡，却错吃了泻药，而那泻药的名字又正好叫海诺莫钦。

对于我来说，如今已不再存在什么幸福与不幸福了。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在迄今为止我一直痛苦不堪地生活过来的这个所谓“人”的世界里，唯一可以视为真理的东西，就只有这一样。

只是一切都将过去。

今年我才刚满二十七岁。因为白发明显增多的缘故，人们大都认为我已经四十有余了。

---

① 一种烈性的镇静安眠药。

后记

我与写下上述手记的狂人，其实并不直接相识，但我却与另一个人略有交情，她可能就是上述手记中所出现的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是一个个头不大的女人，脸色苍白，细细的眼睛向上挑着，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硬派的感觉，与其说是一个美人，不如说更像一个英俊青年。这三篇手记主要描写了昭和五至七年那段时间的东京风情。我曾在朋友的带领下顺道去京桥的酒吧喝过两三次加冰的威士忌酒，当时正是昭和十年前后，恰逢日本的“军部”越来越露骨地猖獗于世之时。所以，我不可能见到过写下这些手记的那个男人。

然而今年二月，我去拜访了疏散在千叶县船桥的一位朋友。他是我大学时代的所谓学友，现在是某女子大学的讲师。事实上，我曾拜托这个朋友给我的一个亲戚说媒，也因为有这层原因，再加上我打算顺道采购一些新鲜的海产品给家里的人吃，所以，我就背上帆布包往船桥出发了。

船桥是一个濒临泥海的大城镇。无论我怎样告诉当地人那个朋友家的门牌号数，因为是新搬过去的缘故，也没人知道。天气格外寒冷，我背着帆布包的肩膀也早已疼痛不已，这时我被唱机里发出的提琴声吸引住了，于是我推开了一家咖啡馆的大门。

那儿的老板娘似曾相识，一问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十年前京桥那家酒吧的老板娘。她似乎也马上想起了我似的。我们彼此都很吃惊，然后又相视而笑了。我们没有像当时的惯例那样彼此询问遭到空袭的经历，而是非常自豪地相互寒暄道：

“你呀，可真是一点也没变呐。”

“不，都成老太婆了。身子骨都快散架了。倒是你才年轻呐。”

“哪里哪里。小孩都有三个了。今天就是为了他们才出来买东西的。”

我们彼此寒暄着，说了一通久别重逢的人之间常说的那些话，然后相互打听着共同的朋友那以后的消息。过了一会儿，老板娘突然改变了语调问我道：“你认识阿叶吗？”我说：“不认识。”老板娘走到里面去，拿来了三本笔记和三张照片，交给我说道：

“或许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呐。”

我的天性如此，对于别人硬塞给我的材料是无法加工写成小说的，所以，我当场便打算还给她，但却被那些照片吸引住了（关于那三张照片的怪异，我在前言中已经提及），以至于决定暂且保管一下那些笔记本。我说：“我回来时还会顺道来的，不过，你认识××街××号的××人吗？他在女子大学当老师。”毕竟她也是新近搬来的，所以她倒认识。她还说，我的那个朋友也常常光顾这家咖啡馆，他的家就在附近。

那天夜里，我和那个朋友一起喝了点酒，决定留宿在他那里。直到早晨我都彻夜未眠，一直出神地阅读那三篇手记。

手记上所记述的都是些过去的事了，但即使现代的人们读起来，想必也会兴致勃勃的。我想，与其拙劣地加以添笔，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让哪家杂志社发表出来更有意义。

给孩子们买的海产品，尽是一些干货。背上帆布包，告别了朋友，我又折进了那家酒吧。

“昨天真是太感谢你了。不过……”我马上直奔主题，说道，“能不能把那些笔记本借给我一段时间？”

“行啊，你就拿去吧。”

“这个人还活着吗？”

“哎呀，这可就不知道了。大约十年前，一个装着笔记本和照片的邮包寄到了京桥的店里。寄件人肯定是阿叶，不过，邮包上却没有

写阿叶的住址和名字。在空袭期间，这些东西和别的东西混在了一起，竟然神奇地逃过了劫难，这阵子我才把它全部读完了……”

“你哭了?”

“不，与其说是哭，……不行啊，人一旦变成那个样子，就已经不行了。”

“如果是已经过了十年，那么，或许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吧。这是作为对你的感谢而寄给你的吧。尽管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但好像的确是蒙受了相当大的磨难呐。倘若这些全部都是事实，而且我也是他的朋友的话，那么，说不定我也会带他去精神病医院的。”

“都是他的父亲不好。”她漫不经心地说道，“我们所认识的阿叶，又诚实又乖巧，要是不喝酒的话，不，即使喝酒……也是一个神一样的好孩子呐。”

［General Information］
丛书名＝
书名＝斜阳
作者＝（日）太宰治著，杨伟，张嘉林译
出版社＝
出版日期＝２００８．１０
形态项＝ ２２５ ； 大３２开
页数＝２２５
原书定价＝ ２３．８０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６６１０９０９
ＳＳ号＝１２０４２５９４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３６６－９９８２－３ ／ Ｉ３１３．４５
分类号＝０９０４
主题词＝
参考文献格式＝（日）太宰治著，杨伟，张嘉林译．斜阳．重庆市：重庆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０．
简介＝本书收录太宰治最著名的三部作品：《斜阳》、《维庸之妻》和《人间失格》。太宰治韵文学以耀眼的光芒照射在日本战后的废墟上。他原先悲歌“人世恐怖”，而在１９４７年发表的《维庸之妻》中，那种悲歌进而发展为一种对虚无的叹息和幻灭感。小说借妻子之口，讲述了一个生来容易受到伤害的心灵为莫名的不安所攫住，以致终日借酒浇愁的诗人的故事。《斜阳》这部以没落贵族家庭为背景的长篇小．．．